

## 作者按语

亲爱的读者：

您也许不是通过传统方式得到本书的。您可能并没有来到书店四处翻阅，拿起这本书，买下它，然后把它放在书架上示人，或借给朋友。我选择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与您对话，是因为本书的内容有争议性，像您这样的中文读者是无法从普通途径看到本书的。

四年前，一家大型中国出版商向我提出购买本书中文简体版的版权。但他们也希望获得修改所有“敏感”内容的权利。

那时，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讨论已经非常普遍。很多人相信这已经不再是禁忌的话题了。但我仍然不确定我的这本书会不会被认为是涉及敏感话题，也许只有小部分是。于是，我决定暂不考虑他们的提议，待成书之后再做决定。

四年后，计划生育法规放宽，中国转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二胎政策。令人难过的是，出版界的状况已不再如前，对“禁书”的界定也越来越严格。过去想向我购买此书版权的中国公司，如今跟我说他们认为本书很难通过官方的审查。

路在何方？不久前，敢于出版大陆禁书的香港书商无故失踪，后又在电视上认罪，导致香港的出版业前景更加黯淡。没有香港和台湾出版商愿意出版我的书。

在这本书中，许多学者、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真实讲述了独生子女政策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坦诚有时甚至会给他们自身带来风

险。他们的观察和经历值得被写下来。我不愿让他们就这样被噤声。  
您手中的这本书，是一场实验，一种希望——希望思想的自由能够最终战胜一切，希望人类的智慧能够翻越重重障碍。请您读下去吧。  
下去吧。

# ONE CHILD 独生

"不容错过…  
(方) 把人物的故事与扎实而开阔的经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 《经济学人》

方凤美  
MEI FONG

## 中国最激进的实验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

"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 作者 方凤美

[www.meifong.org](http://www.meifong.org)

© 2015 方凤美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To view a copy of this license, visi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

本作品系根据「知识共享署名-禁止演绎 4.0 国际许可证」授权。要查看此许可证，请见：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

如欲使用许可，请联系：

[licenses@meifong.org](mailto:licenses@meifong.org)

ISBN: 978-0-9982896-2-5

# 独 生

作者： 方凤美 [马来西亚]

译者： 麦子

“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探索尖锐而重要，可读性极高。”

— 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 《纽约书评》

“不容错过……(方) 把人物的故事与扎实而开阔的经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 《经济学人》 / 1843

“一部及时而重要的作品，检视了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损害。《独生》一书与该政策的废止一样迟来恨晚。方小姐写此书，不作第二人想。”

— 《华尔街日报》

“过于相信科学和意识形态，又过于轻视人性的一小群人所作出的决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方氏这部佳作讲述的故事，娓娓动人、时而触目惊心。”

— 英国《卫报》

“方的文字流畅雄辩，令人折服地呈现着她对多种文化的理解……讲述了一个注定要在此后数十年间影响中国（与世界）的政策，感人至深。”

— 英国《独立报》

“方的书出版于绝佳的时机，是一本极好的概述。她的文字通俗易懂，在200页中带领我们走进了四川地震、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场、广场舞大妈、孤儿院、跨国领养中国女婴、出国生子和代孕的幕后。她用多年间进行的不同凡响的调查和采访，充实了这些熟悉话题的背景。”  
—《洛杉矶书评》

“方凤美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精彩的探索一定会改变我们谈论中国崛起的方式。《独生》深入浅出，富有人性，无所畏惧。对任何关注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其环境和政策的人都是必读之作。该书不仅澄清了事实，驱散了迷思，而且敢于直面最深刻的问题——为人父母的意义。”

— 欧逸文 (EVAN OSNOS)，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 《野心时代》  
作者

“耳目一新，充满力量而扣人心弦。《独生》从第一页起，便令我不能释卷。方凤美有着独到的眼光，能够抓住故事中那些我们多会忽视的、却又能让故事闪闪发光的细节。她的文字优美而生动，揭示着我从未曾想象到的中国侧影。”

— 蔡美儿，《虎妈战歌》作者

“《独生》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籍，讲述了一股缔造了当代中国的重要力量，对政策专家和所有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之作。然

而作品也十分引人入胜，文字有着小说的才调与悲悯，这一切都让我们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在家庭生活中都要面临的艰难选择，以及不期而至的喜悦。”

— 安妮—玛丽·斯劳特，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前院长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想要理解该政策是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整体，就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独生》一书对人物的描绘栩栩如生，故事不可思议，让人大开眼界。”

— 薛欣然，著有《中国好姑娘》、《给我买天空：中国独生一代不寻常的真相》



## 目录

序言 .....	9
一 地震之后 .....	1
二 08/08/08 时钟敲响 .....	15
三 卡珊德拉和火箭专家们 .....	28
四 人口警察 .....	41
五 小皇帝长大了 .....	53
六 欢迎来到玩偶之家 .....	66
七 好死不如偷生 .....	89
八 红线断了 .....	109
九 跨境婴儿 .....	122

# 序言

冷战期间，中国的火箭专家们想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这一计划与导弹、宇宙空间开发或是武器研制都没有关系。

它是关于婴儿的。

1980年9月25日，在共产党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一计划与大家见面了。公开信中要求党员们自愿限制家庭规模，只生一个孩子。这一要求实际上就是命令。

世界历史上最为激进的社会实验——长达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就此拉开了帷幕。世界上六分之一人口的生老病死，就这样被政策改变，且影响还在继续。

正如地狱式减肥法一样，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要实现帮助两亿农民脱贫这一艰巨的任务，独生子女政策势在必行。但是，也正如地狱式减肥法一样，这一政策采取的方式太过激进，太急于求成，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中的一些极端措施，例如强制性结扎、强制性堕胎等，最终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抨击。但是，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中国耀眼夺目甚至让人眼红的经济增长，这其中有一部分功劳被归于独生子女政策。

但人们未能理解的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其人口的规划和控制并没有太大联系。相反，政策正在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威胁：人口老龄化迅速加剧，男性人口过多，生育率过低。

实际上，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多，而不是人少。如果不是因为上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给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就无法崛起而成为世界工厂。这与计划生育政策毫无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生育确实提高了人均资源利用率，例如，教育资源的分配确实相对更集中。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增长，更多的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外资和私企的政策，而不仅仅是因为控制了生育指标。比如，国企私有化改革促进了私有产业的发展，到2005年，私有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GDP的70%。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经济学家葛艺豪（Arthur Kroeber）曾说过：“假如中国经济增长了10%，那么独生子女政策的贡献很可能连0.1%都不到。”

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已渐渐老去。到 2050 年，中国每四人当中就会有一个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独生子女政策让必须支持和援助中国老人的工作人口数量锐减。近年来，中国已经大踏步式地提高了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但是社会福利体系却依然捉襟见肘。中国领导层将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解决更多的问题。

自 2003 年起，我便作为《华尔街日报》通讯员开始对中国经济奇迹进行报道。我参观了一座又一座的工厂，报道着世界工厂的故事。珠三角地区的每一座南方小城都有自己的招牌产品。牛仔城、内衣城、一元店中心都是我常常访问的地方。我的报道中描述了世界最大的圣诞树工厂，还有生产出神奇胸罩的胸罩实验室。

那时，几乎无人预见到未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过，关于工厂被迫加薪的故事，我已渐渐有所耳闻。有的工厂为了吸引劳动力，想出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招数，比如给工人提供电视机、网球场和免费避孕套。很多经济学家都以为当时的劳动力短缺是暂时性的，会自行缓解。毕竟，中国人口如此之多，怎么可能没有工人了呢？

但后来，劳动力短缺提前到来，让人措手不及。独生子女政策使生育率锐减。自 2012 年起，中国 8 亿劳动力人口（这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要多）就开始收缩，且在未来几十年还将持续。劳力收缩导致工资攀升，加剧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生育率连续 20 年低于更替水平后，到 2015 年年末，中国正式转为实施二胎政策，以减轻人口压力。这一政策力量太小，也来得太迟。中国两年前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时，符合条件的夫妻里仅有十分之一的人申请了二胎许可，这一数字比最悲观的预计还要低。很多人只是单纯地觉得，在当今的中国要养几个孩子，实在是成本太高，压力太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生子女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很多中国人已经从根本上内化了独生家庭就是理想家庭的观念。

如果中国无法改变这一观念，那么在 2020 至 2030 年间，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并开始回落。到 2100 年，人口将锐减至 1950 年的水平，约 5 亿左右。对于一个现在仍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的国家，这一逆转令人咋舌。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未经战乱或瘟疫的情况下出现过如此大幅的人口锐减。与此同时，政策的实施有时也很严厉，个别情况下甚至近乎不人道，并且催生了一些恶性的负面影响：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几乎已经不可调和，还出现了实质上的儿童领养黑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由火箭专家打造出来的，他们相信这些负面影响是可以灵活规避的，相信女性生育率能够很容易地调整，而一些真正有智慧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因为文革的缘故而未能参与到决策过程里。文革使这些社会科学家失去了应有的资源与尊重。在一次次的大清洗中，只有国家的国防科学家未被殃及，而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人类行为的最佳评判者。

让人忧伤的事实是：独生子女政策从经济角度说是完全没必要的。到上世纪 70 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十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推行一种更为有效，也更自主

的计划生育政策“晚稀少”。“晚稀少”政策推行的十年间，生育率从每个妇女平均6个孩子降到3个。

很多人口学家相信，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干预，“晚稀少”政策带来的生育率下滑也将持续。很多亚洲国家也有过这样的趋势。毕竟，中国的很多邻国并未采取这类激进措施，就成功减慢了其人口的增长，而经济增长也未受损失。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里，新加坡、台湾、韩国、泰国的人口也出现了显著下降，平均每个妇女仅生育两个孩子，或者更少。

如果中国真的走了类似的道路，推行了正常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很可能和现在一样低。

那样中国人肯定会比现在更快乐。华盛顿大学一位专攻中国人口过渡问题的教授威廉姆·莱福利（William Lavelly）说道：“一亿人口再多五十个或少五十个也没什么差别。总体社会福利并不会减少很多，事实上还可能有所增加。因为很多家庭就可以生下自己需要的第二个孩子。而多一个孩子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心理慰藉都是更高的GDP无法取代的。”

中国真的能够像当初关闭婴儿生产开关那样，再把它成功地打开吗？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许多亚洲国家通过一些政策性措施来提高本国生育率，但大都失败了：新加坡不得不依靠移民政策来增加其本国劳动力。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来改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都会产生波及全球的后果。

尽管如此，独生子女政策的诸多代价和后果依然鲜为人知。很多人，特别是环境学家，依然在歌颂这一政策。很多年来，共产党都坚称，政策使中国少生了3—4亿人口，这几乎是美国人口的总和。（这一说法现在遭到了质疑。一些人口学家估计，实际少出生的人口数量也许仅有两亿。两亿虽然很多，但也仅是中国人口学家宣称的一半。）基于这一虚高的数字，权威杂志《经济学人》将独生子女政策列为了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居功至伟的政策，甚至比保护巴西热带雨林和美国提高其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标准还有效。

虽然从数字上看，中国的人口减少的确对二氧化碳排量减少有所贡献，但这毕竟有些以偏概全。要知道，美国虽然人口只占全球的5%，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占全球的15%；而中国尽管在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却仍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正是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下，北京才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也正是因为这一模式，中国设置的很多环保政策其实都徒有虚名。而后者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前者。

即使现在，全球依然有很多人支持独生子女政策。巴西人口学家查尔斯·克莱蒙特（Charles Clement）曾在其论述中说到，所有国家“都应在某种形式上采取独生子女政策……不应废除中国这一政策，或忽略其对全球的重要性。”加拿大作家戴安·弗朗西斯（Diane Francis）也支持“一种普世法则，例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伯克利大学学者马尔科姆·波茨（Malcolm Potts）认为，独生子女政

策虽带来了一些伤痛，却也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增长，因此依然是“目前为止推行过的最重要的社会政策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为之奔走呼号的这一体制允许强制流产和强制结扎。这让人质疑：我们拯救地球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很多不像独生子女政策这样残酷的方式也能够实现控制人口的目的。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力图探索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原因，以及它对普通人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尽管中国果断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二胎政策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在未来几十年间持续，很多人依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探寻政策背后民生故事的过程中，我到访了“光棍村”——整个村子里没有适婚年龄的妇女；我见到了现住在美国乡村的前计生委领导，据她回忆，她曾批准过 1500 起强制堕胎手术，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是孕晚期；我还发现了中国一个迅速崛起的产业：充气性爱娃娃行业——这一行业自认为能够弥补中国女性短缺的问题。我采访了收养了中国儿童的美国父母，以及请美国母亲代孕的中国父母：我亲自在北京接受了试管受精手术，探访了昆明的临终关怀中心，这些经历佐证着独生子女政策是如何影响了一代人最基本的体验——生存与死亡。

站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明暗交错的光影图像前，我不断思量着为人父母的代价。我们究竟为何生儿育女，我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场大地的震颤，成了我探索旅程的开端。

# 一 地震之后

最常见的错误有两种。第一就是愚蠢地认为地震是上天‘适时’发出的旨意。人们真的会努力揣测自己犯下了何种罪过，如何亵渎了神灵，才招来了地形构造板块对人类的裁决。

——克里斯托夫·希金斯

—

通向慧美学校的路是红色的。

我眨了眨眼睛，怀疑是否是由于过去的三天舟车劳顿，竟然出现了幻觉。但定睛再看，却仍是如此。道路上铺满了无数炸碎了的炮竹，不是令人舒适的土红色，而是腥红的血色，喷薄而出。炮竹是为死者送葬的。这条铺满炮竹的道路像一条红地毯，召唤着亡灵。

惠美的母亲踉跄着走上前去。四天前，唐淑秀正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突然，她感到建筑开始摇晃。在一千二百公里之外，一场大地震正将她的故乡撕裂和吞噬。四川盆地西部的多座主要城市均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二战中美国向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名为“胖子”），连泰国曼谷和孟加拉国都有明显震感。

地震的新闻播出后，唐疯狂地给家里打电话，试图联系自己十几岁的女儿，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第二天，唐淑秀和她的丈夫刘匆匆动身赶回家乡。我，一个他们遇到的陌生记者，一路跟随。除了路上搭把手外，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回家的漫漫长路上，这对夫妇拖着沉重的包袱坚强地前行。包袱里装满了泡面、蛋糕卷、园丁手套、卫生巾和花被子。大红色的保温瓶像毛泽东语录一样闪亮，还有成卷的卫生纸、一次性筷子和一大条烟。尽管丈夫反对，唐淑秀还是背上了一桶四斤装的食用油。可想而知，油渗了出来，粘得哪里都是：衣服上，包上，手上。快到站的时候，我们三人都沾了厚厚的一层油，虽然万般疲惫，却不协调地油光满面，像要拍照片的明星一样。

而此刻，唐淑秀却一把扔下她一路小心保护的行李，不顾一切地朝着这条血红色的土路奔去。

学校的现场凌乱不堪，好像是哪个半吊子的拆迁队只拆了一半就扔下摊子大歇特歇去了。铁杯和练习册杂乱地躺在废墟里，操场上的篮球框已经扭曲得无法辨识。墙上贴着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通知：

“政府为抢救学校的学生已做大量工作。希望家长协助政府辨认遗体。”

唐和刘走到废墟边上，有个男人手里正拿着塑料文件夹。

我清晰地记得唐淑秀问询时的尖叫。那是伤口撕裂的声音，让任何人都避而远之，就像狗闻到腐肉一样避之不及。那尖叫声意味着，一切都已经完了。

## 二

最初，发生在四川的这场中国数十年来伤亡最惨重的地震，是一场单纯的灾难。大地震颤，建筑倒塌，近 7 万人遇难。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由独生子女政策间接引发的悲剧赫然在目，泣血成殇。

很多人并不知道，震中附近的什邡，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试点地。在 80 年代大规模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中国的人口专家曾经在四川，特别是什邡县进行试点推行，使用强制性政策大规模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一政策收效显著。到 1979 年，什邡县的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90% 以上的已婚夫妇保证只生一个孩子。按照人口学者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的说法，四川的例子让中国的人口规划者们感受到“一种无限的可能”，让他们认为北京也能够“实现人口奇迹”。

28 年后的今天，强震席卷这座小城。据国有媒体新华社报道，约有 8000 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子女。在什邡，70% 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有地方媒体报道说，有些村子的整整一代人全部在地震中丧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使这场悲剧衍生出一个诡异的侧面。地震发生后仅几周时间，家长们就都争先恐后地来到医院进行结扎复通手术。此前，他们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下接受了结扎，而现在，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再次生育。

很快，这些父母们便在政府的压力下签署了保密协议，缄口不言。中国媒体被明确禁止撰写关于失独父母的报道，亦不允许报道因学校建筑质量不合格而导致学生死亡的相关内容。一些私下进行调查的市民身陷囹圄。生灵涂炭，家破人亡。但由于北京正紧锣密鼓地准备 8 月份的奥运会，所以抗议被压制了下去。

尽管共产中国理论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很多人依然相信征兆的存在。人们把自然灾害视为神明之旨，暗示中国统治者天命已尽。毕竟，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仅六周，毛泽东就死了。而他的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新的时代，成为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契机。在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正是这一政策造就了今日的中国。

2008 年地震之后，有人怀疑，这是否是自然在惩罚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一切有悖自然规律的行为。比如，有推测认为，地震很可能是由建设在地震活跃带上的三峡大坝所引发的。

这种种的推断犯了北京的大忌。共产党为确保 2008 年奥运会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付出了漫长而艰辛的努力。为此设计的一切征兆都是为了象征共和国前途一片光明。

2008 北京奥运是一场斥资几十亿美元的盛事，它象征着新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和文革之后，历尽苦难终于涅槃重生。事实上，领导层选择在 2008 年举办奥运绝非偶然；将开幕式定在 8 月 8 日更是意料之中。对于运动员来说，8 月正是北京酷暑难耐，雾霾最重的时候，并不利于运动员展现最佳潜质。但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数字“8”与发财的“发”谐音，因此被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而“8”如果横向放置，则喻意无穷无尽。这自然是一切政权所梦寐以求的。中国人对 8 如此执著，以至于任何有华人聚居的地方，“8”都要额外付费，无论是电话号码还是车牌号，甚至是房号。那一年，某个含有“18”的车牌号竟在香港某拍卖会上以 200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巧的是，我的生日正是 8 月 8 号，每次我的中国朋友发现这一点时，都会对其中的喻意评说一番。最常听到的就是：“呀，你一定特别幸运。”

那时，全国各地都设置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倒计时钟：2008 年 8 月 8 日，8 点 08 分。五月发生的大地震和它所带来的一切负面消息，自然不能坏了这件大事。

讽刺的是，在地震发生之前，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慢慢淡出了新闻报道和全国性讨论。

作为中国南方人在马来西亚的第二代移民，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中国。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还有四个姐姐。父母一直在努力尝试生个男孩，因此才有了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彼时已经相对很进步了，因此大家不再遗弃不想要的女孩。当然，我父母也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但我父亲仍终其一生都为膝下无子而倍感遗憾，他也让我们深深明白，女儿从来只是累赘。

人们都说，华侨——海外华人，比中国大陆人还要传统些。文革使人们不得不放弃或者隐藏很多传统的东西。我父亲家就是如此。亲戚们经常说，“你该庆幸我们在旧中国，不然根本就不会生你。”而这也恰是我对中国重男轻女观念以及独生子



女政策的最初认识。在我儿时童真的目光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我祖先的故土最神秘离奇的事情之一，就像英国作家赫胥黎和《新约》中的希律王一样让我着迷。

我从未料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在中国生活和工作。2003年，华尔街日报调我到大中华区工作。彼时，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了20多年，却并非像外界想象中一样滴水不漏。时间长了，总会有些例外。比如，农民、藏民、渔民或者矿工都有可能不只生一个孩子。残疾人或者愿意交超生罚款的人也可以。罚款的数额参差不齐，有时候只是象征性地少收一点，有时则高得离谱，往往取决于你住在哪个城市，认识什么人。也正因为这种种例外，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半子女政策”。只是这个叫法听起来实在太过拗口，没人愿意这么说。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把“独生子女政策”称之为“计划生育”，而不是直译为“一个孩政策”，这样听起来就委婉了许多。

在中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有人将其称为艺术形式。用中国话说，就是“想办法”——找到解决方案。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稀缺、政策严苛但却弹性较大的国情下，这也是司空见惯的做法。所以，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得入乡随俗，适应中国人的讲价彪悍、四处插队、开车完全不按套路。这一切都是“想办法”这一观念的产物。正是通过想办法，中国人想出了各种极具创造性的方法来钻政策的空子——为生双胞胎或三胞胎而接受生育治疗、去海外生子、假结婚、贿赂等等。我的一些中国朋友都生了几个孩子，当然通常不超过两个。我遇见过一个生活在二线城市的女人，她育有6个子女，全部生于政策执行期间。（如果政策真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那么她的第一个孩子早该被她杀死在襁褓之中了）

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二十年后，专家预测，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中国夫妇受到了该政策的直接影响。我的同事张彤禾（Leslie Chang）——一位颇有威望的中国观察员这样写到：到2013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一场地震，一次流产，一段见证了数千个新生儿的旅程。这一切最终让我意识到：中国人口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 三

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的现状休戚相关。它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并引发了中国未来几十年间都要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

50年后，如果你随便在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的任何一个城市扔一颗石子，这颗石头很可能砸中一个60岁以上的人，同时，这个人很可能是男性。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人口性别和年龄比大幅度失衡，不到十年，中国的光棍数量将超过沙特阿拉伯人口总和，退休人员数量超过欧洲人口总和。

在中国，一切都讲求规模和速度。中国不仅老龄化人口数量已是世界之最，其人口衰老的速度亦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少部分的青壮年劳动人口要供养数量庞大的退休人口，而这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这种过渡给中国并不健全的养老和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据德意志银行预估，到 2050 年，中国养老金资金缺口将高达 7.5 万亿美元，等同于其 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83%。

虽然前景十分暗淡，但是政策将带来的后果依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过去十年间，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已经接受了更小型的家庭，并且倾向于更小型的家庭。毕竟，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社会主义向成熟资本主义的飞跃，这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成本的相对提高。再加上近年出现的剧毒奶粉、含铅玩具和有毒雾霾，在城市里生儿育女的想法已让人望而却步。

另外，政府一直在努力传达正面信息。他们坚持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在经历了重大自然灾害和政治动荡后，短时间内就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即便政策有所偏颇，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是我父辈的祖国。

任何一个 60 岁以上的中国老人都讲得出当年艰辛的故事，但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中国记者薛欣然讲述的。她曾经采访过一家人，穷到四个孩子只有一套衣服穿。每天，需要出门的孩子才会穿上衣服，剩下三个则光着身子挤在毯子下面，等待下一次轮到自己穿衣服的时候。

中国像一条被历史的变迁蹂躏得遍体鳞伤的幼犬。看到她舔舐着伤口继续勇敢前行，人们不能不为之振奋。自 90 年代晚期起，中国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农民家里出了第一代大学生；初生婴儿死亡率下降；星巴克分店像奶油泡沫一样涌现在大街上；路上随处可见宾利、宝马、本田、现代等豪车；随着中国第一代跟团游客的诞生，新华书店也摆满了旅行类的书籍。

我的第一个普通话老师回忆起她的欧洲之行时非常兴奋。我问她最喜欢欧洲哪个国家，她不假思索地答，“德国。”我很吃惊，本以为她会说是法国或者意大利。她顿了顿，说道：“德国真的太有秩序了。”

2005 年，我遇到了一个负责给工厂工人建造宿舍的承包商。交谈中，他向我抱怨说现在的工程都要安装很多电源接口，因为工人们有很多电子产品需要充电。2007 年，北京的第一家 Hooters 开业了，中文叫“美国猫头鹰”。望着女服务员穿着紧身低领衬衫端上价格不菲的鸡翅，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似乎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过去，人们开玩笑说，在中国，人生的一年更像狗生的一年。（因狗的寿命只有人生的七分之一长，所以人生一年相当于狗生七年）中国一年之间的变化抵得上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七年的变迁。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年，其间，北京的地铁路线扩大到原来的五倍；宜家在这里开了全球第二大分店，为了满足较大客流量，过道都设计得比

以往宽很多；私家车数量涨到原来的四倍。尽管污染问题和贪腐问题日益严重，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中国人激动的心情，人人都在呼喊：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与主流认知相反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过去 30 年间持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反而将在未来的三十年减缓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所公布的因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而减少了 4 亿人口出生的数字，也是因计算方法失误且仅凭主观愿望而得出的夸大结论。换句话说，从整个结果来判断，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政策实施之前，一些早期的更为人性化的举措已经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了。

独生子女政策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则更耐人寻味：政策究竟会不会在未来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减缓经济发展？

答案是：可能性很大。当然，具体影响有多大还未可知。预测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并且，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下滑的预测也是基于有增必有降的理念。这种预测如果不能精确到具体时间和程度上，其实并没有太大价值。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大量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其生产力的下降。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手机和车辆消费市场，并且即将成为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而这一切都将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改变。中国制造业的鼎盛时期即将过去，目前国家正在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等措施努力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在这一过渡中，大量的退休人口很可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如中国的万里长城，成为大敌当前时的最后一道屏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中国没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总数仍然会大幅下降，当然，具体数字仍有待商榷。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中国曾实施过名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相对自愿的方式，这一政策已经将家庭规模缩小了一半。

2009 年，人口学家王峰、蔡勇和顾宝昌对共产党宣称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 3-4 亿人口的出生”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在此之前，这一数据一直被视为不争的事实。中央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坚持声明，独生子女政策为全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官方强调，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到 2006 年，全球人口将突破 70 亿大关，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一时刻的到来推迟了五年之久。上述专家则认为，中国实际减少的出生人口也许只有统计数据的一半。

这一巨大的鸿沟是如何出现的呢？王和蔡认为，最初的计算方式使用的是最简单的外推法，通过 1950-1970 年间出生率的下滑轨迹来推断 1998 年的出生率。当时得出的结论是 3.38 亿人，这被四舍五入成了 4 亿人。但是由于晚稀少政策的实施，70 年代期间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而独生子女政策 80 年代才开始，因此数据是不科学的。

尽管政策有所放宽，其消极影响依然十分广泛。杨支柱，北京一位法学教授，就因为生二胎而失去了工作。2010年，杨教授愤然卖身换取3万6千美金的超生罚款。在他的广告里，他半开玩笑地到：“凡愿出此价买我之人，我定做牛做马服侍他。我拒绝捐款，为了孩子，我不想当寄生虫。”杨最终还是继续在学校任职，但却被降职减薪，连原来学校分配给他的大房子也收了回去，换给他一套较小的。杨告诉我，“独生子女政策不过是种征税方式，巧妙之处就在于不需要给纳税人提供任何服务。连生孩子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都要征税，那干脆吃饭和呼吸都征税好了。”

我遇见一个叫李雪的女孩，为了至关重要的户口（也叫户籍注册）整日奔走求告却毫无结果。因为她是计划外二胎，且父母都是工人，交不起罚款，所以政府不给她上户口。没有户口，李雪不能上学，不能看病，连借书卡都办不了。没有户口，李雪就是个不存在的人，不能合法就业或者结婚。她以后所生的子女很可能也会和她面临一样的困境。据估计，中国目前约有1300万人口和她处境相同，这些孩子无档可查，叫做“黑孩子”。

2008年夏天，在全国都在筹备奥运会的时候，李雪勇敢地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手上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想上学”。

不到五分钟，李雪就会被警察带走。天安门广场是全球戒备最森严的地点之一。2008年，安保更为严格。但是，整个夏天，李雪依然勇敢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有时候，公安人员会在他家门口等着她。李雪和他母亲一出家门，公安人员就在后面穷追不舍。母女两人每天穿梭于北京狭窄的胡同里，只为能在天安门广场上站上几分钟。

她的举动让我钦佩，也让我愤懑。冒这么大风险，却一无所获。一切都显得如此无畏，却是徒劳一场，她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李雪说：“我就是想让别人注意到我。”

多年后，我遇见一个男人。他跟工厂里一个未成年的女同事有婚外情。女孩怀了孕，就跟他来到他家的村里待产。由于女孩尚未成年，他们没法结婚，孩子也就没有准生证。后来，计生委的官员以此为由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并将其卖给别人领养。过去五年里，男人一直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他觉得孩子说不定住在美国伊利诺伊的郊区。

这都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代价。

#### 四

昆明是距离缅甸最近的中国主要城市。此刻，我正坐在从昆明返回北京的飞机上。缅甸政府拒绝了我的入境申请，我心中有些酸涩。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席卷缅甸后，缅甸处于新闻封锁状态，外国救援人员均不得入境，更不用说外国记者。

大地震就发生在我从昆明回北京的路上，我却一无所知。

四川地震震级为里氏 8.0 级。这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地震释放出的能量比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加起来的能量都要大。

这是中国继唐山大地震之后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32 年前的唐山地震，震级为 7.6 级，被公认为全球最致命的灾难之一。唐山地震发生在文革即将结束时，其后的很多年，共产党都在掩盖地震的严重性。最终，新华社公布的伤亡人数为 25 万人。

唐山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地震中丧生。每年的大地震纪念日，燃烧的纸钱就像黑色的蝴蝶，飞舞在唐山的大街小巷。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默默的、安静的悼念，不再用语言来表达哀伤。

唐山大地震后，建筑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不难想象，四川依然伤亡惨重。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省，常住人口达 8000 万。与此同时，多山的地形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飞机降落在北京之后，我打开自己的黑莓手机，数十条信息立即涌进来。我不敢相信地震的消息。同事们已经启程飞往四川省的省会成都。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一路都在咒骂。我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要是在昆明多逗留一下该多好。昆明离成都仅 400 英里，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如果我在昆明，哪怕开车也能到成都，那我就能进行现场报道了。

与此同时，为了交差，我匆匆赶出了几篇报道，其中一篇介绍了中国人现在正在使用一种新的、类似于推特的网站微博来发布有关地震的消息。这是中国公众新闻报道最初的例子。如今看来，当时那些消息是如此久远而奇特。

我绞尽脑汁，思考着该如何写这篇报道。

四川籍的农民工遍布北京和中国各地。大多数西方人只知道四川是中国可爱的国宝大熊猫的故乡，却不知道，那里也是中国的阿巴拉契亚<sup>1</sup>，贫瘠而人口众多。

四川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流动工人，他们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是城市里的清洁工，他们做着普通城市人不再愿意做的工作。工厂厂长们和建筑队的包工头们为了留住这些卖力的工人，很快就学会了在食堂的菜单里加入辛辣的川菜。这些四川的工人们就像他们所钟爱的小辣椒，短小，火爆，特别能吃苦。

---

<sup>1</sup>北美洲东南部巨大山系。虽然早已兴起伐木业、开办煤矿，然而阿巴拉契山脉某些地区直至 20 世纪初仍很闭塞，尤其是南部地势崎岖难以修筑道路的山区。

地震发生后，很多人疯狂地想要赶回家。要穿过震后的废墟，历尽艰险回到遥远的家乡，这一路会是怎样的情景，而等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这样想着，我便朝火车站出发了。

## 五

唐淑秀首先进入了我的视线。她的脸由无数个圆形组成。椭圆的脸上有深深的黑眼圈。嘴半张着，显得有些痛苦。嘴唇干裂，还被她咬破了。她穿着自己最好的行头——绣着闪亮蝴蝶的牛仔裤和珊瑚绒外套。唐淑秀很少坐火车，因此，即便她已心急如焚，却仍打扮得十分正式。

唐淑秀一直没有 15 岁女儿惠美的消息。

她丈夫刘计树身材精瘦，身高大约一米六左右。他看起来就像荷兰娃娃：身材瘦小，头发黑亮，脸蛋浑圆。他一脸木然，眼圈通红，眼里闪着逼人的目光。

唐和刘都在北京的一个施工队工作，居无定所。现在，他们正和村子里的人一起，焦急地往家赶。

地震摧毁了前方的铁路和公路，谁也不知道火车能走多远。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坐不起飞机。刘大概跟我描述了一下，他的村子实在太偏远，要坐 20 个小时的大巴车，还要走上好几天山路，在野外睡几晚才能到达。

我迟疑了。这一路体力消耗巨大，我怎么能跟得上这些靠体力吃饭的工人呢？我打电话给我的编辑。

我试探性地问到：“我们不能雇一辆车送他们回去吗？”当然，我心里早已有数。这一路的颠簸才是最好的故事。

震后第二天，我们登上了火车。硬座车厢人满为患。很多人被挤得动弹不得，只能站着睡觉，或者倚在靠背的边上睡。春节期间，全国人口大流动，成人尿布的销量迅速增加。这也难怪，人这么多，根本挤不到洗手间去。在中国，只要你坐过火车，就一定知道，“the Middle Kingdom”确实是地球上人最多的。

我踩到了刘的脚，他冲我笑了笑，笑容一闪即逝。他嘴里咕哝着：“人太多”。中国人太多了。很多人都这么说。

尽管车上有禁烟标识，刘还是不停地抽着烟。

唐淑秀一言不发，水米不进，坚毅地坐在那儿，两行泪水从脸上落下。

到第三天的时候，她脱水太严重，已经哭不出来了。刘把水送到她嘴边，强迫她喝一点。洒出来的水沾湿了她的衣裳，如一片片墨迹，像特意设计的一样，有些好看。

他们的故事与千百万农民工一样。家里土地太少，无法靠种地维生，更交不起女儿的学费。因此，他们背井离乡，加入了流动人口大潮。流动人口是对中国农民工的一个富有诗意的称呼。他们从农村漂到城市，从事着各种不体面的工作。没有城市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城市里的社会服务，比如上学和就医。这也就是他们无法把女儿带到北京的原因。

户口作为一种经济隔离制度，固化了社会的分层，使中国原本就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不至于人满为患。可它同时也是一把屠刀，残忍地让唐淑秀这样的家庭骨肉分离，数月不能团聚。

刘和唐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女儿了。我问他们女儿长什么样，唐淑秀已经记不起女儿梳的是长发还是短发。她喜欢什么？她以前什么样子？唐淑秀含糊地回答说：“她爱看电视，不过她是个好孩子。”

北京距离他们的家乡铁葫芦乡，大概有 800 英里。距离上，并不难想象，具体来说，大概就是从纽约到芝加哥的距离。但经济和文化上却是天壤之别。

铁葫芦乡没有自来水，乡里的人都没坐过飞机。所有四十岁以下的人都长途跋涉去了城市，哪怕是很小的城市。有的是生计所迫，有的是百无聊赖。回乡则是为了吹嘘在外面的经历，或是为了娶妻生子，或者两者皆有。村里的人几乎都姓刘，或者嫁给了姓刘的。村民们不再杀死不想要的婴儿，也不再买媳妇，但这一切似乎并未远去。每年雨季，春雨都会把土路淹透，无法通行。

但是这里却风景秀丽，山野崎岖，碧水蓝天。每当唐淑秀在北京呼吸着满是烟尘的空气，咳出污秽的痰，她都会怀疑自己当初离家是否是对的。工地上的生活比家里更艰苦。因为没有洗衣机，所以人们总是穿脏了一件衣服就扔掉。这在唐淑秀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奢侈。他们做饭的电磁炉是偷着带去的，喝水的桶以前是装油漆用的。唐淑秀把她玫瑰色的外套保存在铺盖卷里面，这对于常常在各个工地间辗转的她来说，决非易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返乡的时候，能有些东西拿来炫耀，能证明他们在城里的努力。

火车轰隆轰隆地前进，唐淑秀不停地咒骂着当初驱使自己离家的好奇心。她沉思着说：“也不都是为了钱，我们就是想去看外面的世界。”

如今，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责骂自己为什么没有带上惠美。她不断地重复着，“我们都躲过去了，只有孩子没躲过去。”语气就像在念一段咒语。

我很难真正和他们交谈，也无法建立起感情的桥梁。车上人太多，而他们则满心忧虑，不愿多言。他们的四川口音也让我很难理解。

与此同时，为了躲避乘警，我也在各个车厢间转战。他们发现我是个记者之后，不允许我进行采访。唐和刘因此也更加拘谨。

我一直喜欢坐火车。铁轨的撞击声让人安心，窗外的风景飞驰而过，总让人有种无法逃离的宿命感。但这次不同，前路布满荆棘，人人都提心吊胆。大家都把手机放在身旁，像职业枪手一样，等待着新的消息，丝毫不敢松懈。

最初，预计的伤亡人数是两万人。接下来涨到3万人。位于震中的汶川在地震发生后仅三分钟，就有80%的建筑被夷为平地。

余震还在不断席卷着小城。许多城镇的人口已经全部撤离。

废墟中挖出的生还者寥寥无几。

上车24个小时后，刘和唐接到通知，惠美的学校已经挖出了183具遗体。

唐淑秀啜泣着说：“她死了。”

“还不能这么说，”刘说，“还不能这么说。”他的眼睛圆睁着。

只要还没听到确定的消息，就还有一线希望。旁边的一个男人脸色惨白，他刚刚接到电话，他的孩子已经在地震中丧生了。

车快到西安的时候，厕所里的水用完了。空气中弥漫着尿味，还夹杂着烟气。

我和刘跟一个叫丁万隆的人交谈起来。村里人都觉得他是外人，因为他不是生在这个村的。丁万隆原来的家因为修建水坝被夷为平地，他只好迁到了铁葫芦乡。说到自己的家，丁万隆很自豪。靠着在远方的城市里打工，他一点一点地攒下了钱，给自己盖了新房。

“我家是二层小楼，可舒服了。”他一边抽着钻石牌香烟一边说道。

停了停，他又说：“这下又得重新盖了”。

几个小时后，丁万隆接到电话。地震让他一夜间成了孤儿，无家可归。他的母亲已被深埋在瓦砾之下。



我们经过了西安，那里有著名的兵马俑。半路，我们得到消息，前方的铁路网已经修复。这是个好消息，村民们不用再下车转乘 10 个小时的汽车了。火车到站后，我们要去坐船，然后步行上山。

此时，几乎每个人都接到了噩耗，亲人丧生或残疾，家园被毁，还有人。

唐和刘依然没有惠美的消息。

接下来的路上，刘放松了一点。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向我讲述他一个亲戚买妻的故事。

铁葫芦乡的光棍们找不到老婆。乡里的女人们因为能够到城市里的工厂打工，几乎都不愿意再留在乡里艰难度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如果人们非得选择是生男还是生女，大家都会选生男孩，把女孩送给别人，或者默许自己的妻子这么做。如此一来，全村几乎没有适婚适龄的女性，即使有，也很可能是你的妹妹或表妹。

刘说，这个亲戚实在太寂寞了，加上家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他赶快给家里传宗接代，他最终招架不住，听信了乡里一个媒人的游说，省吃俭用，四处拼凑，买了个新娘。

“后来呢？”

“后来？人家跑了呗！”

他边说边笑，用牙齿咬开啤酒瓶的盖子。

我们笑了，这时候，有人电话响了。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又一个人死了。

火车穿越中国腹地的河北、河南和山西。由于粉尘污染严重，一切都灰蒙蒙的，一片混沌。对美国人来说，汽车是美国梦的象征。盖茨比开着他的车，带领美国走向了资本主义、个人自由和美好的生活。对中国来说，这个比喻则是火车。每个人都在车上，没人能决定列车前进的方向，大家只能一起驶向集体主义的梦想。多年之后，当我读到狄更斯的一段文字时，这一切又浮现在脑海：“一股力量迫使它在它的铁路——它自己的道路——上急驰，它藐视其他一切道路和小径，冲破每一个障碍，拉着各种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群和生物，向前奔驰；这股力量就是那耀武扬威的怪物——死亡！”

一下火车，眼前的一切就像电影里蒙太奇式的片段一样飞速地闪现，犹如一场噩梦。马路上睡着的一排排一夜之间无家可归的人们。我们在码头焦急地等待着轮船，大喇叭里喊着：“我们来帮你们了！我们来帮你们了！”

正在上船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她刚刚得知，她心爱的人在地震中去世了。人们把她抬上了船，她的身体如同尸体般僵硬。

船行驶在江面上，两岸是壮美的崇山峻岭，像阿尔卑斯山脉一样。

唐淑秀瞪着远方出神，脑海中闪过无数种可能，或是希望，或是绝望。最好的情况是，惠美毫发无伤，只是没办法打电话或者联系自己的家人。有可能她受伤了，失忆了，甚至残疾了，这对父母来说虽然痛苦，却还可以承受。又或者，惠美此刻正困在坍塌的瓦砾里，靠着喝尿维持生存，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自己的母亲。

“还有希望，”刘安慰她说，“我们到家之前，一切都说不准。”

船靠岸后，我们步行了几英里上山。这时，我才真正看到地震带来的伤害。我们吃力地爬过坍塌的山体、被压碎的车辆和建筑的废墟，一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扛着铁锹从我们身边经过。

看着唐和刘蹒跚地爬上山去寻找他们的孩子，我离开了。准确地说，我落荒而逃。我落荒而逃了，是因为我急着去交稿；我落荒而逃，是因为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帮助他们；我落荒而逃，是因为我不愿在那一刻留在他们身边。我落荒而逃，就这样把他们丢在了那条满目疮痍的路上。这狼狈的匆忙，让我永远心怀愧疚。

数周之后，我回到了铁葫芦乡，希望能弥补自己的亏欠。在一片风很大的墓地上，我见到了刘。惠美并没有埋在这里，她的遗体在震后和很多遗体一起，被匆忙掩埋在了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刘之所以选这个地方见我，是因为那里地形较高，他能很容易地看到有没有人来查探我们，有没有人来监视我们。

此时，官方已经开始全面掩盖真相。很多学生因校舍坍塌而死亡，这些校舍因此被指为豆腐渣工程。数十名家长呼吁政府对学校的施工过程进行调查。他们每天都站在废墟旁，手捧着孩子的遗像，有的还抬着孩子残损的遗体。他们呼吁政府引起重视，进行调查，有所作为，做什么都好。政府的确也行动了，他们镇压了这些抗议行为。

刘的脸色很不好，在我的记忆中，他清瘦的身躯曾毫不费力地扛起沉重的行李。而如今，他却形容枯槁，如惊弓之鸟。他不停地抽着烟。唐没有来，她几乎不出门，也不再见人。

刘问我说：“你们给我们照的那些照片，能销毁吗？”

我不情愿地告诉他，那篇报道已经发表了。

刘的脸色沉了下来。

“别担心，”我有些迟疑地说道，“大多数读者都不在中国。”

我没告诉他，我给他们俩照的照片，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的第一版。

我还记得拍那张照片时的情景。我努力地调整相机的角度，希望能捕捉到唐在船上远眺时的身影。她疲惫不堪，却满怀希望。那时，他们的路还没走到尽头。

刘说：“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了，我们无话可说。”

突然，远方传来爆炸的声音。我们惊得跳了起来。我凝视着墓碑周围，看到很多送葬的人在放鞭炮。中国的红白喜事总有一种相似性。生孩子、结婚、过年和葬礼都要放炮竹。不论是有人出生还是有人去世，我们都会给钱。生孩子包红包，死人包白包。这相同的礼俗让生死之事似乎有了些许相同，让人略感安慰，仿佛这是一种完结，一种归来。

刘给我看了一份他被迫签署的协议。上面写着，他因女儿的死接受一笔抚恤金，并不再追究官方的责任。

上面写到：我同意尽快回归正常生活，开始正常的生产和工作。

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耻辱感。

他耸了耸肩说：“你看，就这样。”

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朝山下走去。他的背影越来越小，直到被山野吞没。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然而我们的人生却开始有了一种奇异的对称。

当我跟随他们回乡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了。

## 二 08/08/08 时钟敲响

为人母必是世间最让人忧伤却又最让人满怀希冀的事情了，一旦爱了，便永不停息。

——李翊云《千年敬祈》

—

从四川归来后，我哀伤而疲倦。我曾报道过 9·11 事件，还有车祸、袭击、谋杀以及诸多人们蓄意或无心地强加于他人的兽行。人道已失，天道亦不存。我已厌倦了以窥探别人的生活为生。夜里，我辗转难眠，梦中每每浮现的都是唐淑秀、刘建树和其他我采访过的面孔。

我记得有个女人曾走过来对我说：“看看我的娃娃，我漂亮的娃娃。”说着便把她孩子的照片举到我眼前。一张是一个微笑的少年，另一张则是残损无法辨认的尸体。娃娃是四川方言中对孩子的昵称。在我的梦境里，我一遍遍地听到这位母亲的呼喊：看看我的娃娃，我的娃娃死了。帮我找找我的娃娃行吗？

梦醒后，在预感的驱使下，我拿出了一只家里备有的验孕棒。

红线出现的时候，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催促丈夫安德鲁又去买了一只。验完了又再去买，然后再验。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用了五只验孕棒，全部都是阳性。

起初，我甚至不敢让自己太过欢喜。在我 30 出头的时候，我被诊断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一种荷尔蒙紊乱症，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只知它是不孕症的常见病因之一。彼时，我读到关于此病的症状，心中十分苦涩：严重的症状包括体毛增多、脱发，还有波动式的体重增长。

以前，我对生孩子这件事一直拿不定主意，我流徙不定的生活似乎无处安放一个新的生命。从一个新加坡通俗小报的记者到全球最大新闻机构的通讯员，个中的辛酸无需多言。为了爬这道阶梯，六年内我住过四个城市、三个国家。作为华裔女性，我在北京常被人误认为是某个白人记者的秘书、翻译或女友。记得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采访中，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在采访后与我的白人同事一一握手，

却唯独越过了我。毫无疑问，他把我当成了别人的助理。

我热爱我的工作，但也深知其压力之大。每当我夜晚昏昏欲睡时，在另一个时区的上司们已从睡梦中醒来。为人父母需要付出时间、关怀和精力。我能应付得来吗？但我已经 36 岁了，年龄和身体状况都不允许我再继续犹疑。

正是这时，重磅炸弹出现了。在未经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我的生理缺陷问题竟然被克服了。我终于要有孩子了，尽管这一切发生在我纪录许多人死亡的过程中。于万千痛苦中生出这意外的快乐，竟显得齷齪。

地震之后一个月，一位叫朱建明的磷酸盐矿矿工接受了结扎复通手术。他十几岁的女儿还有三分之二的同班同学都在地震中丧生了。严格来说，新月并不是独生女。她有过一个天生智障的哥哥。父母因此得到了二胎批准，前提是生二胎之后要接受结扎。地震发生几年前，新月的哥哥溺水身亡，父母的希望和梦想因此全落到了新月身上。

新月在学校坍塌时被瓦砾砸死了。她死后十天，悲痛的父母开始寻思再生一个孩子。朱建明已经 50 岁了，他妻子也已 45 岁。虽然他们担心自己已经不能生育了，但是想到膝下无子的凄凉晚景，他们实在无法承受。三个星期之后，朱建明靠着东拼西凑的手术费走上了手术台。家里已经没有任何钱能让妻子再去看医生，咨询自己的生育机会了。

四川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以男性结扎为主要绝育方式的地点之一。虽然男性绝育手术更简便快捷，术后风险也更小，但由于很多地方男权文化盛行，所以接受绝育手术的大都是女性。（曾经有一位山西的村长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他是全村第一个接受结扎手术的。他说：“我就是要给全村做个榜样。”后来在我的询问中才发现，真正做了绝育的是他妻子。他妻子愤愤不平地说：“是我做的绝育！他才不会让大夫碰他的命根子呢！”）四川为什么是个特例呢？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位叫李顺强的重庆医生。1974 年，李医生开创了一项男性结扎技术——不开刀结扎术，这一技术目前仍在很多国家广泛应用。与传统的开刀结扎不同，这项技术只需用手术钳刺穿阴囊皮层即可操作，因而创口很小。一位在 1981 年目睹过这一结扎手术过程的美国人类学家这样向我描述：“大夫只需拿一个钩针在阴囊里左右扭动一下就可以了，手术很快，五分钟左右。”

由于手术过程简单便捷，有时四川一些地方会公开实施此类手术，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这一绝育方式的广泛使用，使四川成为了计划生育的模范省份。独具天赋的李医生后来成为了重庆计生研究所所长，退休时已是国家计生委高级领导。

朱建明是在很多年前做的结扎，他很幸运，复通手术很成功。通过给他做复通术的生育诊所，我联系到了他。我向诊所的一位工作人员询问结扎复通术是否是他们的专长，她爽快而果断地回答说“不是”。她们的主要客户都是雅皮士<sup>2</sup>，这些人不孕是因为一直推迟生育，比如我。其中，很多病例是因为多次流产导致输卵

---

<sup>2</sup> 雅皮士：是指西方国家中年轻能干有上进心的一类人，他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这里形容中国新一代拥有良好教育背景、收入不菲的年轻人。

管永久性损伤而难以怀孕。这实际上是独生子女政策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产品，因为大多数人都把堕胎当作一种节育方式。中国人对控制性行为的后果之一是如此地开放，但在青少年的性启蒙教育上却惊人地拘谨。在中国，提供性教育课程的学校还不到百分之一。

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管制的设想是所有生育行为都发生在已婚夫妇中间。对于未成年的孕妇或者未婚先孕者，以及没拿到指标就怀孕了的女性，这一政策毫无回旋余地。一旦违反了规定，那么解决方式只有两种：要么交罚款，要么堕胎。

我有个朋友，婚后不久就发现她丈夫出轨了。丈夫还是她大学时候的男友。我安慰她的时候她啜泣着说：“不敢相信我竟然为了他打了三次胎。”

生儿育女的时机关系重大。随着现代社会不孕率的上升，把握生育时机就显得更加重要。要想对抗生理机能的衰退，你要么得有钱，要么得有运气。朱建明当然不是有钱人，那么他运气如何呢？我决定启程去他的故乡双林看望他。双林有恢宏的乐山大佛，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像。佛像雕刻在悬崖峭壁上，俯瞰着奔流汹涌的大渡河。

乐山大佛建于公元8世纪，佛祖面容十分安详。在这场大地震中，佛像竟奇迹般地丝毫未损。反而是急速的经济增长让佛像的鼻尖蒙了一层灰色，也让佛像头顶的石制发卷都渐渐松脱。

在去往朱建明家的路上，我看到了很多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标语。其中一面墙壁上画着正在升空的火箭和英俊的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一个性别模棱两可的孩子，旁边的标语写着：“晚婚晚育，利国利民”。还有一幅写着“少生快富”。

我在朱建明的一个朋友家见到了他们。他们住的地方比朋友家还偏远些，要坐船才能到。朋友家里环境更好，也更近些。可惜当时停电了，所以我们只好在渐渐昏暗的夜色中交谈。

朱建明身材瘦小，颧骨奇高，宽大的外套罩在身上，显得很不合身。他妻子面色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绯红，但眼神却悲痛欲绝。

村子里的生活很痛苦。邻居和朋友都对他们避而不见。他妻子觉得，大家都害怕他们因为没了孩子会变得越来越依赖别人，向别人借钱或者求人帮忙，总而言之就是可怜的寄生虫，毕竟“我们现在没个孩子可以指望了。”

最开始，朱建明是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他自小饱尝饥饿之苦，对他来说，少养几个孩子这个想法显得很有吸引力。他说：“我们吃过草、吃过虫子，从来就没有吃饱过。”

当然，朱建明还有别的顾虑。在他们那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都要罚款1000元，这对当时刚刚成家的朱建明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作为出卖劳力的挑夫，朱建明当

时的报酬只有几分钱。在四川，挑夫们靠挑扁担（棒棒）替人运货谋生，人们因此称其为“棒棒军”。这是当地最辛苦、报酬最低的职业了。身为社会最底层的棒棒军，朱建明得罪不起计生委的领导。他说，计生委隔三差五就会派人到那些超生的人家去砸东西，就是“为了教训教训他们。”

而现在，夫妇俩虽然因为遵守了计生法规而万分懊悔，却也想不出当时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

“有时候，看到我以前的同学们现在都当爷爷奶奶了，我们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朱建明颤抖着声音说道。

新月的死不仅让他们遭受丧女之痛，失去了晚年的经济保障，更让他们失去了社会认同感和安全感。我不难想象这对夫妇每天如何度日：呆坐在昏暗的房间里，面对越来越冷漠的邻居们，惶惶不可终日。

走的时候，我十分懊恼忘了给他们带上一份小礼物。我想送给他们一个小纪念品，象征性地聊表祝福。我在车里摸索了良久，终于找到了一小包饼干。当我把饼干塞给朱太太的时候，她一脸茫然。我挥手告别的时候，她手里还紧握着那包饼干。夫妇俩向我挥手回应，像两个无畏的勇士。

朱建明的故事见报几周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国医生的邮件。这位女医生接受了生育治疗，有几个已经受精的胚胎可用。她说她愿意捐给朱建明一个或者几个。她写道，虽然她无从揣测在中国农村，养一个白人小孩究竟会怎么样，但是他想知道朱氏夫妇是否感兴趣。

这一奇特而慷慨的提议背后牵涉太多，注定无法实行。但我也不禁想象，如果这一切成真了究竟会怎样。医学的进步的确人为地提高了我们的生育年龄上限，但这一进步仍然很有限。而计划生育政策则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那年春节后不久，还未能怀上孩子的朱建明夫妇离开双林外出找工作。他们换了电话号码，自此再无音讯。

## 二

也许你会问，这一切虽然不幸，但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的确，无数逝去的生命，特别是那么多死去的独生子女们令我们心碎，但这一切不就是一场天灾吗？

这就联系到了奥运会。在我看来，地震和奥运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四川所涵盖的一切，包括独生子女政策试点、震后掩盖校舍坍塌的新闻等等，都是中国国家主义的阴暗面；而另一面是北京奥运会，它见证了一个自鸦片战争后忍受了百年凌辱的民族的重生的重生——即使这一成就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展模式而取得的。

作为一场体育竞技，奥运也体现了人口控制的一种形式，政府借此来为国争光。

的确,这种通过选择性生育来培养更优秀人才的观念(几乎接近于优生学的思维),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体育精英项目两者共同的核心。

中国官方对计划生育的目的一直毫不避讳:少生、优生。本着同样的精神,中国苏共式体育项目的领导者们也非正式地促成运动员的结合,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让他们的优秀运动基因得以传承。这一做法是否成功,将在2008奥运会的炼炉中接受考验。

全中国都进入了奥运倒计时的状态,但是,一场突发的地震让人们的眼光都聚集到了中国集体主义的阴暗面上,声势似乎要盖过北京精心编排的故事。中国的官方机制迅速启动了。

地震发生三天后,17名网民因“散布恶性谣言”被捕。悲痛中的父母被迫接受了封口费。当我报道一场校舍示威的时候,公安一路尾随,追着我的车,并把我截了下来。他们说担心我的安全,还说要护送我到“安全的地方。”我把他们骗走了。

我认识的其他记者,有的被抓了,有的不断受到骚扰,还有的摄像机被砸了。持不同政见的网民黄琦因批评共产党的救灾措施而入狱;教师刘绍坤因为拍摄坍塌校舍的照片并且在网上质疑这些学校的建筑质量而被劳改一年;环境学者谭作仁因首创“豆腐渣工程”一词来形容坍塌的校舍而被拘禁,后被劳改五年。

我开始陆续接到一些丧子家长的电话,告诉我他们遭到了威胁和粗暴对待。我很想深入调查,但是腹中的胎儿束缚着我的脚步。在得知自己有孕后,我便尽量不再出差,希望等过了前三个月的危险期再行动。

怀孕的最初几个月,因为荷尔蒙失调,我的情绪百般交杂:所见的一切让我伤心,未完成的故事让我牵挂,意外到来的小生命让我满心欢喜,而奥运机制的启动让我不禁愈加激动。

与四川的混乱相反,奥运大戏的重点是操纵。连天空都要听政府的。为减少污染,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听起来很像乔治·奥威尔的风格)不断向空中发射满载碘化银的火箭弹,通过人工降雨来洗去城市里无所不在的雾霾。

新奇的建筑如丛林般拔地而起,大都出自国外设计名师之手。在为奥运筹备的几年间,北京变成了巨大的建筑工地。一道道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奥运构造和谐社会”,而这些广告牌背后遮住的是数以万计如洪梅父母一样的农民工,他们屈居于工地上肮脏的角落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

自此,每每闻到空气中飞扬的水泥粉尘,我总会想起这座城市,想起这段时光。

如今,硕大的广告牌被一一揭去,一座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浮现在眼前:国家体育场犹如无数钢铁纠缠而成的龟甲;国家大剧院似一弯穹顶;CCTV广播大楼则形如一座竖立的方形甜甜圈。本地老百姓们将这些建筑戏称为“鸟巢”、“鸡



蛋”和“大裤衩”。尽管玩笑如此，它们依然是令人敬畏的纪念碑，镌刻着无数人民的勤劳智慧与血汗付出。

拿大裤衩来说吧，我平生从未见过类似的建筑。其本身的建筑理念是矛盾的：建筑是方形的，但却给人强烈的阳具暗示。这很可能是由于建筑物的上部，也就是大裤衩的裤裆部分凭空伸出了 250 英尺，颇有些一杆热枪的意思。

大裤衩确实是一个建筑奇迹。两侧酷似大腿的高塔部分首先完工，接着，两塔的塔顶如神话中的爱情故事一样，在破晓前结合在了一起。（建筑师给出的解释则相对无趣些，说这样做可以防止太阳的热量对建筑内部的钢筋造成扭曲，导致结构不稳的问题）。大裤衩的设计荣获了全球最佳高层建筑奖，并被一位评委称为最能代表当代中国“无畏而无所不能精神”的建筑。

但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大裤衩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宣传中心。普利策奖得主、建筑批评家英格·萨弗容 (Inga Saffron) 毫不留情地斥责大裤衩的设计者雷姆·库哈斯 (Rem Koolhaas) 为中国的电视垄断者“拱手奉上了一颗炸弹”，并称它的规模与结构“将永远震慑人们，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渺小与国家的强大”。

在大裤衩建造前，我曾采访过一些被强行迁走的居民。迁走前，他们居住在一片低矮的砖房里。等我去采访的时候，房子几乎已经空了。窗户已经被打碎，有的窗上还写着“要人权”之类的字样。很多居民对政府强行拆迁颇有抱怨，说政府给出的拆迁补偿款太少。一个女人告诉我，她出差回来就发现家门被锁上了，所有的家当都被人搬到了楼下。绝望之下，她差一点从四楼跳了下去，不过警察救下了她，然后就把她抓了起来。

很多给北京增添了一些奇特魅力的蹩脚翻译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标准而无趣的译文。比如，“Dongda Anus and Intestine Hospital”（东单肛门肠道医院）被改成了“Hospital of Proctology”（直肠病医院）。“Racist Park”（种族歧视公园）被迅速拆除，取而代之的是“Park of Racial Minorities”（少数民族公园）。残疾人再也不用四处寻找有“畸形人”标识的厕所了。大量车辆被限行，工厂被勒令停产，就连城市里枯黄的草地都被用喷漆喷成了翡翠色。

与此同时，我接受了第一次孕检。B超医生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在我依旧平坦的小腹上涂满了润滑剂。

“那是什么——呀！”我丈夫惊喜地盯着胎儿的心率。那心跳如此有力，让人不能不欢欣雀跃。我们握着彼此的手，像沙滩上的孩子一样开心。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思忖孩子的名字，对着这颗跳动的小心脏，挑选我要给她读的书和我想讲的故事。它的心跳让一切都变得无比真实。

“很快你们就能知道孩子的性别了！”医生愉快地说道。

我知道如果我是中国公民的话，医生是不会这样跟我说的。为了防止性别选择性流产，医院明令禁止医生透露胎儿性别。当然了，你可以走后门。比如，问一些

比较隐晦的问题，再给大夫包个红包表示一下，大夫就有可能给你一颗蓝色或者粉色的糖，或者假装咳嗽一下表示是个女孩，或点个头表示是个男孩。政策管束你的子宫，但百姓总有对策。

### 三

中国领导人想要的故事——中国的亮相派对、中国的全球崛起——逐渐占据了人们的视线。

北京城四处都拉起了无形的警戒线，严防闹事者给这场盛会捣乱，这其中就包括地震中痛失子女的父母们。他们前来首都请愿，希望政府还她们以公道，但不幸的是，很多父母还未能进京就已经被抓捕了。他们被护送下火车，或者直接被投进拘留所。有些人在关押期间甚至还要自负食宿费用。

有些父母本想到昆明散散心，却一路上都被公安局的人尾随。“他们连个假期都不让我们安心过。”一位父亲愤懑地说。还有位父亲说“我的孩子都没了。连老天爷也得容许我哭哭嚷嚷吧，可是这个政府觉得自己比天还大！”

倒计时越来越短了，30天，21天。

关于奥运吉祥物的谣言开始传得纷纷扬扬——五个天线宝宝一样的动物似乎预示了中国会经受的灾难：熊猫晶晶代表着四川地震，火焰欢欢和藏羚羊迎迎象征着奥运火炬的传递受到抗议中国镇压西藏的示威活动的干扰，而小燕子妮妮则被和内蒙古的蝗灾联系到了一起。

五个吉祥物被统称为福娃，但是网民却戏称他们为“巫娃”。

当然，审查机制很快便将这些消息删除了。

14天，10天。

我正在医院接受正式的孕初期检查。医生很让人安心，他高兴地说：“你已经过了危险期了”。他把超声波检查仪轻轻地滑过我腹部，皱了皱眉，又再检查了一次。

“没事，等做扫描的时候就能看的更清楚了”，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将我送到了放射科。

放射科的医生盯着显示仪看了很久，咬着牙惊叹了一声。

“你的医生是谁？”他问道，然后迅速离开了房间。

我紧握住安德鲁的手。

医生告诉我，胎儿的心跳已经停止了。就在几周前，我还看到它的心跳那么有力，而我竟然毫无感觉，一无所知。

一切都结束了。

后来，我听到卧房里听到了和唐淑秀一样撕心裂肺的抽泣声。良久，我才回过神来，原来哭的是我自己。

8 天倒计时。

我在医院做了刮宫手术。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了。我想装作一切都未发生过。毕竟，我的痛苦和那些四川父母的相比微不足道。一切只是黄粱一梦，梦醒无痕。

尽管我尽力不责怪自己，但负罪感还是越来越汹涌。是不是我去灾区的路上伤害到了孩子？是因为行李太重了？还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尸体？会不会是北京空气太差了，或是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不断告诉自己要理智。孕期前三个月流产很常见。但是，脑海中自责的声音依然挥之不去。是你的错，是你的错，是你把娃娃害死了。

0 天倒计时。

奥运会开幕式在鸟巢举行。它是世界最大的钢筋建筑，也极有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愚行。奥运之后，鸟巢很大程度上将一直闲置。为了减少支出，鸟巢省略了原设计中包含的可收缩屋顶，因此大部分时间要么太冷，要么太热。

开幕式这天，空气里弥漫着大雨的气息，我们都紧张地在自己的奥运便捷包里摸索着雨衣。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启用了 26 个控制站来进行人工降雨，力争把云团阻挡在鸟巢之外。

在高达 32 摄氏度的气温下，鸟巢已经变成了炒锅。鸟巢里的所有人，政治局领导、小布什和贝克汉姆，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举着望远镜向场上的运动员看去。镜头推进后，我看见了身高两米的姚明，他鲜红的运动衫上透着一片片汗渍。姚明入场时，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牵着一名 9 岁的孩子，林浩。林浩是汶川地震的幸存者，他从废墟中拉出了两名自己的同学。他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孩子都在地震中丧生了。

在这一大一小两人之间，姚明却更能代表计划生育政策和从前的种种可能。姚明生于 1980 年，是最早一批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人。他的父母都是身材健硕的篮球运动员，他出生时体重就有 11 磅。体委领导看中了他无量的前途，便努力游说计生委对他父母放宽生育限制，只是最终无果。他们希望中国能出更多姚

明这样的选手。

运动员招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抱怨中国父母不愿让自己的宝贝孩子吃苦，过去，国家队运动员自小就要与父母分离，接受艰苦的锤炼。望着入场的运动员队伍，想到独生子女政策竟终结了中国当前的运动员遴选体制，我感到有些滑稽。

一位体操运动员曾经跟我一个同事说过，她们每餐的供应量都非常少，“就跟喂猫一样，”她说，“等我出国之后才发现，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练体操都是练着玩的。”中国跳水女神郭晶晶，就因为在少年时期就开始进行跳水训练，巨大的冲击力影响了还未发育完全的视力，导致视力很差。很多其他的跳水运动员也是如此。

姚明认为独生子女政策让孩子自私、更缺乏自信，同时“也很可能导致了我们在团体运动方面的劣势。”中国在体育方面当然总有些自卑情结，因为尽管中国运动员在乒乓球、跳水等项目上频频摘金，但在其他商业化的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上，却表现不佳。

体育界人士将这称为大球小球理论，认为中国只能在注重精度和机械训练的项目上崭露头角，也就是“小球”。而在一些需要创造力和团队协作的项目，也就是“大球”上却差强人意。这一理论可以放射到中国的各个方面，从教育系统到经济实力上。

而今天晚上，中国显然是想改变自己在大球游戏中的地位。

我在开幕式的现场做博客直播，努力让自己不去想流产、孩子或者是地震的事情。这一切在我脑海中纠缠成了一团无法解开的痛苦。我以为在奥运会这庆祝中国荣耀与辉煌的滚滚洪流中，可以不去想起那些被匆匆掩埋的代价。

但即使在这里，那些代价依然无法被遗忘。

鸟巢本身便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提醒。艾未未，一位常被比作安迪·沃霍尔的持不同政见的中国著名艺术家，曾经是鸟巢设计的顾问，但他最后却拒绝承认鸟巢的建造与他有关，并指出，中国政府已经把奥运会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谎言。

艾未未在地震发生十天后就赶往四川拍摄现场的灾难实况，对政府掩盖坍塌学校伤亡情况的作行为更是直言指责。后来，他试图建立一个汶川地震死伤儿童的数据库。为此他遭到了殴打和拘禁，并被以逃税的名义处以 200 万美元的罚款。

晚上 8 点 08 分，演出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烟花燃放声中开始了，嫦娥飞舞，宇航员行走于空中，数千名太极表演者整齐划一。2008 名天真可爱的儿童代表着中国不同的民族。这一切，都是张艺谋斥巨资编排打造的一场盛大的表演。张艺谋早年曾经因为拍摄多部带有政治批判色彩的电影而不受政府欢迎，最近几年，他的风格相对和缓了很多，被视为已经成功改造的人。有些贬低者称他是中国的莱尼·里芬斯塔尔。

张艺谋的确使出了浑身解数。通过布景的调动，他迅速展现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从丝绸之路到万里长城。在表演过程中的一个场景中，和谐的“和”字显得分外耀眼夺目。

一个天使般的小姑娘唱响了家喻户晓的《歌唱祖国》：“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巨大的球体从舞台下缓缓升起，这就是中国期待已久的“大球”时刻吗？球体顶部的舞台上，站着卷发如同美杜莎般的歌星莎拉·布莱曼，她用甜腻的歌喉，唱响了奥运主题曲《我和你》：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歌词实在是很有趣。

一滴泪落了下来。被莎拉·布莱曼感动到流泪，实在是有些荒诞。

然后，我心碎了。

#### 四

一切都似是而非。

代表中国少数民族的 2008 个孩子，其实都是汉族。

唱歌的小女孩其实是在对着唇形假唱，真正的歌手因为长得不够漂亮，在最后一刻被替换了。

电视观众看到的礼花绽放，其实是电脑合成的。

而导典礼的演张艺谋，在网络上曝出其有多个私生子之后，名誉一落千丈。计生委最后对他课以 748 万人民币的罚款。这位一手缔造了中国最大一场演出的才子，突然成了中国历史上因超生被罚款最多的人。

中国的亮相派对的确标志着其作为全球强国的崛起。几个月之后，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的破产所带来的一系列震荡使美国的经济地位更加岌岌可危。但是，奥运并没有展现出一种无畏而无所不能的精神，相反却让人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惧怕失控的中国，她严格地钳制着媒体活动，且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越来越强硬。

奥运会几个月后，活动家们发表了倡导民主改革的宣言——《零八宪章》。中国的回应是将其起草人之一刘晓波投入监狱。2010 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由于他还在狱中服刑，未能参加颁奖仪式。

颇具影响的清华学者孙立平写道：“可以这样说，奥运会标志着中国政治维稳运动的开端。回过头来看，也许举办奥运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 五

六年后，我来到了地处成都西南的安仁。安仁是一个繁荣的小城，有一所昂贵的早教学学校和许多复古式的中国建筑，飞檐流瓦，像极了功夫电影里的布景。四星级的喜来登酒店马上就要入住了。

安仁是樊建川打造的一个项目。樊是一位地产大亨，爱好历史。在一个把集体式遗忘变成惯例的国度里，安仁就像一个幻象。樊建造了多所记录中国近现代史的博物馆。他建造的 15 座博物馆，涵盖了中国由抗战时期到文革时期的历史，收藏了众多饱含感人故事但却无缘进入正统博物馆的文物。（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博物馆，但是却并未收藏文革展品，仅以三行文字说明概括了这十年的时光。）

促使我来到安仁的是这里的两座四川地震博物馆。我很好奇，想看看它们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纪念这一切的。中国的博物馆经常令人十分沮丧，虽然收藏了很多历史悠久的文物，但却冠以单调而说教的文字，没有任何戏剧性或故事性。安仁的博物馆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最开始，我以为党的宣传又要胜利了。其中一个展厅里陈列的满是地形图、图表和照片，歌颂政府在地震救灾中响应迅速。的确，北京在救灾中的表现的确值得称赞，特别是跟布什政府面对飓风 Katrina 的时候的反应相比，但是这种政治宣传实在有些无趣。

眼前的数据如四川辣椒一样令人麻木。

确认死亡： 69226 人

受伤： 374643 人

失踪： 17923 人

损毁道路： 53295 千米

震后统计的被损毁管道和电缆的长度已经精确到千米，但地震中丧生儿童的数量和损毁的校舍却并无交代。

正当我在博物馆内来回踱步，有些倦怠的时候，一个猪圈映入眼帘，标志上写着：猪坚强。这里居住着地震中最著名的幸存猪：猪坚强。在断水断食的情况下，它在震后的瓦砾中顽强存活了 36 天。正当我在怀疑这究竟是不是被运输到博物馆的猪圈原物的时候，身后一串尖锐的猪嚎声打破了我的思绪。

猪坚强赫然站在我们面前。它身形硕大，脏兮兮的身体灰黑，昂首挺胸地在猪圈里四下巡视着。人站在它旁边显得非常渺小。当大家都兴趣盎然地举起相机给猪兄拍照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奥威尔的名言：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

的。我发誓，猪坚强绝对是我见过的展览里面最受欢迎的。

猪坚强在地震前就已经被阉割了，但是 2009 年，科学家用他的 DNA 克隆出了 6 只小猪，希望能够借此研究它“坚强”的基因。在四川，连猪英雄都难逃计划生育的巨掌。当然，和人相反的是，他的繁殖是被鼓励的。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

猪坚强的圈后面是一溜厢房。

我终于看到了地震最真实的纪念物，如庞贝废墟一样悲怆。钟表永远地定格在了 2: 28 分，半只鞋子和被撕碎的婚纱静静的躺在那里——这是一对灾难发生时丧生的新婚夫妇最后的见证。

这里中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车的主人就是用这台摩托拉带着亡妻回的家。他把死去两天的妻子捆在自己身上，带着她骑完了属于两人的最后一程。

展览中还有许多射箭台的壁画。射箭台村自中国宋朝起就以其年画而驰名。年画的内容多是手绘的面色红润、体型微胖的娃娃，在鲤鱼、桃子和凤凰周围嬉戏，一切都寓意着丰足。年画是中国乡村一种更为耐用的贺卡，人们在春节粘贴年画，辞旧迎新。射箭台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其后得到重建。

最让人心碎的莫过于坍塌校舍的文物展览，一件件物品定格了时间，无声地诉说着猝然而逝的生命。被砸烂的书桌、羽毛球拍、背包和乒乓球拍散落一地，中间还夹着一封一个 17 岁男孩写的日记，最后一篇日记写于地震的一周之前：“期中考试的成绩今天出来了，我考得很差很差。很难过，为什么我总是这么没用呢？为什么我不好好学习、好好复习呢？爸爸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展出中还有漩口中学的学生手写的菜单。周一吃辣爆猪头肉、土豆丝和火腿炒菜花，周二吃炸里脊和生菜。地震发生时，很多孩子都还在饭后午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地震中丧生。

眼前的一切让我强烈地忆起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展馆里摆放了数以千计的遇难者的鞋子，任何数字都不及这场景触目惊心。安仁的地震博物馆虽然文字寥寥（我猜测是为了避开审查），但那些声音却格外响亮。

核心的展品是一个由黑白照片组成的天井。照片中全是丧亲的父母，每个人都举着自己死去孩子的照片。这张内含照片的照片被放大、复制，粘贴在天井内部的四壁上，一路延伸向天。

我站在那里，被前来哀悼的人包围。我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去，这幅伤逝之画无尽地向前延展，如千斤重担，压得我无法呼吸。

我没有料到能在中国看到这样的纪念。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描绘过一座叫马贡多的城市，那里所有的人都被回忆桎梏着，而中国则是与马贡多对立的

另一极，现代历史上曾有过太多的灾难，国人完全被遗忘所桎梏。广播记者 Louisa Lim 在其关于 1989 年天安门运动的著作中提到，中国已经变成了“失忆人民共和国”。在六四事件 25 周年纪念日那天，连“怀旧”都成了网上审查的敏感词。

在安仁博物馆里，几乎随处可以体会到家庭有多么重要——看看那些年画你就会明白，孩子在中国农村代表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亲情，更是经济的保障、社会的认可，还有人生价值的肯定。

地震发生之初，社会还不知怎样称呼这些丧失唯一子女的父母。“失独”这一词汇当时还未流行，震后几年才渐渐被广泛使用。四川的父母们成为了失独现象最早的例子，这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副产物。

到 2014 年，失独父母的数量已经达到一百万左右，每年还新增约 7.6 万。他们成为了一个松散的组织，彼此安慰，并集体向北京请愿，争取更多的补偿款、优先领养权和更适应其特殊需要的养老、医疗和丧葬福利。

失独父母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失去唯一的孩子远比失去几个孩子的其中一个更让人痛不欲生。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一说法似乎有些让人不悦，毕竟，对于父母来说，不管是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失去孩子总应该是世间最让人绝望痛苦的事情。但是研究显示，没了后代的父母们确实面对很多问题：他们无法顺利进入养老院或购买墓地，与其他退休人员相比，他们的经济条件也更脆弱，且更容易产生抑郁倾向。中国社会的一切均以婚姻和家庭为动力，即使政府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你也还是个家长，跟其他人一样。那些没结婚的人和没孩子的人在社会上还是会被人瞧不起。

这就是为何朱建明在孩子死后三个星期就做了结扎复通手术，这就是为何当他想到自己无后的晚年时会声音颤抖。在中国，佛罗里达式的养老院是不存在的，以他的出身和收入，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沉浸在一门手工或一份工作中忘却自己的痛苦，或者吟诗抒情，聊以自慰。

我曾在网上读到过一个失独退休人士的帖子。他不愿住进养老院。他说，想到周末别人的亲人就都会来探望他们，他实在无法面对。

四川地震不止是天灾导致的悲剧。像北欧海底巨兽显现出的隐隐轮廓一般，它展现出了一场巨大的人为悲剧的侧影，这一悲剧就是独生子女政策。



### 三 卡珊德拉和火箭专家们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毛泽东

—

在坐了 15 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在汽车上颠簸一程之后，我迷迷糊糊地来到了翼城。

乍一看，我觉得自己不该来。翼城位于中国的内陆省份山西，地方又小又脏。山西是煤矿产地，其空气质量就算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重度污染。连肯德基和星巴克都不会在这种地方开分店。翼城虽有些风景秀丽的地方，但却被污浊的空气所笼罩。驱车来到城外的山上，我看到了很多居住在古老而低矮的窑洞中的人，窑洞外是一片片的向日葵。他们金色的花盘垂头丧气地低着，被灰霾夺去了生机。

翼城百姓有个笑话，说翼城之所以叫翼城，就是因为人们都想插翅离开这里，到更大更干净的地方去。但是对人口研究者来说，翼城还蕴含着另一重意思：它代表着一个未能展翅实现的中国远景。

25 年来，翼城和其他几个县城都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实验。在这些地方，居民几乎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就能生两个孩子。例如，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只有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才可以生育二胎，但在翼城，不论你第一胎是男是女，都可以生二胎。

这些秘密的二胎试点区域一共影响了大约 800 万人的命运。在中国，这一数字不过是九牛一毛。但不论如何，它们展现了一种诱人的可能，一条没有被计划生育政策所左右的道路。没有了政策的限制，这些地方的居民们不需要采用极端的方式杀死或打掉不想要的女孩。如今，翼城的性别比例已经接近世界正常水平。生育率也低于全国平均生育率。二胎许可更使得原本怨声载道的生育指标落实工作简单了很多。翼城的村长黄登高说：“我们不需要使用武力。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跟邻里和平共处。”

多年之后，力争推翻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学家们就以翼城为据来证明中国的未来。此举也将翼城计划生育实验背后的一个叫梁中堂的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梁是一位少有人知的经济学教授，他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 30 多年前那场引入计划生育政策的会议上，他是唯一一个大胆谏言的人。

在成都的那场举足轻重的人口会议上，梁中堂警告大家说，这一政策将是“一场惨痛的悲剧”，在这一政策下，“社会将失去喘息的机会，如一潭死水，没有未来。”

他预见到了老龄人口缺少依靠的局面，并创造了如今被广泛使用的“4: 2: 1”这一说法——两个成年子女需要供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学者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评论道：“这一数字虽然极为简单，但却是对现状的极有力的比喻。”

在一个狂风骤起的秋日，我在上海虹口大学区梁教授的家里见到了这位独生子女政策的卡珊德拉<sup>3</sup>。梁先生的家在顶楼，风围着他摆满书籍的房间呼啸，如泣如诉。对于中国人口运动的不被歌颂的英雄来说，以此为家不无贴切。梁先生已经退休，腰板挺直，银发苍苍，言语间总流露出一种犀利。

经过兜兜转转，中国一部分的当代人口学者最终认可了梁先生的想法，并因他的先见之明将他称为“英雄”或“国宝”。梁先生本人则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那么多，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力量相比，他的反抗微不足道。“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梁说道。在我们的对话中，梁频繁地将自己的努力评价为“无用”，“浪费时间”。

梁先生年复一年的游说并未能说服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二胎政策。但是，他的努力还是赢得了改革派的党内高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注意。在他们的支持下，一批二胎试点地确立了。可以说，许多出生在这些地方的孩子之所以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就是多亏了梁中堂。

梁中堂讥讽地说道：“这还是比我什么都不干要好点”，接着又说“当人口学者说话总比当农民管点用。”这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双重身份。

梁出生在农民家庭，有五个兄弟姐妹。1966 年他高中毕业，本想去北大攻读哲学。可惜这样的雄心壮志在当时不合时宜，因为 1966 年正是毛发动文革的那一年。伟大舵手毛泽东下令所有学校停课，让他的红卫兵们批斗知识分子，一斗就是十年。

梁中堂因此错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成了他毕生未能弥补的缺憾：在后来与中国人口规划者的抗争中，没上过大学这件事让他吃了很多亏。他当了兵，在部队里度过了数年光阴，期间自学了政治理论，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最终，他成了太原一所党校的教师。70 年代晚期，梁被要求承担人口学的教学任务，这既不是他的专长，也不是他的兴趣。

---

<sup>3</sup> 卡珊德拉：古希腊传说中卡珊德拉特洛伊国王布萊姆的一个女儿，具有预知未来的禀赋，但被阿波罗诅咒，命中注定不为人所相信。

自文革开始，人口学和其他所有社会科学就遭到质疑，被剔除出大学课程。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人口学才重新得到重视。而中国的人口研究所则直到 1981 年才成立——比计划生育的实施还晚一年。

梁中堂说，早年中国曾经照搬过苏联的一套系统：只注重生产力和经济统计数据，而不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相反）。而 80 年代早期以前，中国的人口学者甚至不知如何绘制最基本的人口寿命表。

1980 年，北京决定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但是当时领导们还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根据人口学者夏乐平（Thomas Scharping）的说法，中国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十五年前，且只“提供了粗略的统计数字”。仅基于如此不准确的基础就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计划，这令人难以置信。想到这里，我不禁问梁中堂，这是不是有点像我曾读到过的对批评家的定义：“没有双腿却在教人跑步的人？”

“是啊，”梁先生说，“但是你要记得，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们都觉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里了。好像如果不减少人口的话，大家就会永远贫穷下去。人太多。”

诸如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其实自古就人口众多。在公元 1200 年，繁华的湖畔之城杭州就已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有 150 万人口。意大利游人马可波罗当时对此惊叹不已，而他的家乡水城威尼斯，当时还是个相对偏僻的所在。

但是，20 世纪后半叶的人口增长率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显著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人口平均寿命。在中国，仅仅 20 年，人口就从 1949 年的 5 亿四千万增长到了 8 亿多。十年之后，蒙提·派森乐队就在歌词中唱到：“今天世界上有 9 亿人中国人，我们要和他们搞好关系”。<sup>4</sup>

中国自 1950 年起就开始断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措施是规定法定结婚年龄、发放免费避孕套和节育环。在 70 年代，中国将这些政策与“晚稀少”（晚稀少主要是鼓励夫妇完婚，拉开两胎之间的间隔并少生育）政策紧密结合。当时宣传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又多了”。

几乎所有人口学者都同意：晚稀少政策对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起了非常大的控制作用。在政策实施的十年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 6 胎降到了每人 3 胎。虽然这一惊人成果的背后必定少不了强制性措施的辅助，但是与独生子女政策所采取的措施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为什么政府没有继续沿用“晚稀少”，反而变本加厉？

政治因素是这一决策的关键。1976 年，毛泽东死后，党内纷争不断。在经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后，国家风雨飘摇。新一届领导人，包括华国锋，胡耀邦和邓

---

<sup>4</sup> Monty Python 乐队歌曲 “I like Chinese”。

小平等在内，需要巩固政权稳定，重振人民低落的信心。他们把振兴经济作为巩固政权的核⼼，⽽已经实施了十年的晚稀少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经济的要求。

决定控制生育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快速提高人均 GDP 水平，中国必须提升经济产量，减少人口增长。显然，控制人口数量比提升经济产量要容易。

邓小平确定了到 2000 年人均 GDP 翻两番，达到 1000 美元的目标。从这一目标一步步反推回来，人口学家发现如果继续实行二胎政策，则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因此，需要收紧政策，实施计划生育。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由来：一个关于经济目标的武断决策，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2000 年到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仅比预估的 12 亿人口多 6000 万左右。考虑到中国的人均 GDP 当时已经达到了预定目标 1000 美金的三倍多，成效不能算坏。但即便如此，官方还是进一步强调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说：“经济发展就像一个蛋糕，我们要控制吃蛋糕的人数量的增长。”

其实，梁中堂并不是唯一一个预见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人——人口老龄化，重男轻女，劳动力迅速减少，都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决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因此置之不理。一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的科学家，宋健，就公开表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1980 年，宋健发表公开文章，文中模糊地提及，科学的某些进步可以轻易地规避“长远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建议政府可以“调整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来保持人口稳定增长。

宋健对人口状况的预测之所以显得令人难以置信（认为老龄化和生育率都像机器上的杠杆一样可以随意调节），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的专业其实是机械，具体点说，是火箭。

那么，一个火箭工程师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妇女生育问题的决策过程中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看政策诞生之时，中国国内外的特定环境了。

## 二

仓促诞生，过期时却继续苟延残喘，独生子女政策本来就不是要永久存续的。当政策 1980 年出台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承诺，这一生育限制只是暂时之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宣布此政策时说：“在三十年后，当我们目前人口增长过快的严峻问题得到减轻后，我们会采用一种不同的人口政策。”

公平地说，很多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和中国领导人一样惧怕人口爆炸的威胁。这在上世纪 60-70 年代是个十分流行的想法，和喇叭裤和电休克疗法一样。二战之后，不光是中国，全球的人口都在增长。人们不再作战，转而做爱，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孩子。保守派和生态学者于是就开始敲响饥荒的警钟。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其意外畅销的书籍《人口爆炸》中发出了一个极端的声明。他宣称：“争取喂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且“数百万的人口将被饿死”，无论何种措施都无法避免“世界人口死亡率的显著上升。”

1969年，联合国启动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1987年被重命名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目的是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

1972年，由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组成的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与《人口爆炸》一样，该书认为，经济增长的生态性是不可持续的。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模拟，罗马俱乐部假设了几种能够代表全球未来人口资源分配的情况。其中，大多数预测都前景暗淡，有些甚至预测到在21世纪中后期将出现全球大崩溃。

于是，控制全球人口，特别是控制有色人口的活动进一步兴起，而其中，西方国家对人口控制活动提供了大量帮助。

曾经有短暂的时期，印度实施了强制性的绝育计划，这一违反民意的计划后来导致英迪拉·甘地被迫下台（不过偶来他又重新掌权了）；韩国启动了“两个孩太多”计划，而在我的近邻——国土面积极小的岛国新加坡（目前人口甚至还不如纽约多），也发起了“生两个就够了”活动。我小时候听过好多关于这些宣传的故事。其中有一副海报我至今都记得，画上有许多双手伸向一个面包。

在中国经历了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之后，这就是等待她的世界。此时，中国处在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虽然印度和印尼等国家也实施了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但是要大规模地强制推行这些措施，只有中国同时拥有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条件。当罗马俱乐部一类的西方科学家还在把人口控制的观点作为智力练习详细阐释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准备好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他们要在真正的人口上采取这些措施，而几乎完全不考虑失败的后果。

彼时，中国饱受十年文革的折磨，民心涣散，知识分子资源被文革肃清殆尽，以至于定量供给生育指标的观念和定量供给煤炭和粮食一样，都说得通。

与印度不同，当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全盘推行的时候，人民也没有合适的政治途径来表达愤怒。同时，中国也没有关于节育和堕胎的宗教信仰禁忌，因此这一方面也不是障碍。

现在看来，中国当时是减少生育的沃土。

有证据表明，中国计划生育理念的萌芽有可能来源于西方。1975年，宋健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在那儿，他遇见了年轻的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多年后，奥尔斯德对他无意中影响了中国人口运动这件事依然百思不

得其解。奥尔斯德回忆到，“宋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很友好。”那天，在饭后小酌时，奥尔斯德与宋健谈到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虚构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的问题。奥尔斯德和他的同事想出了一个“优雅的数学解法”，他把这一解法告诉了宋健。

“回想起来，他当时好像突然振奋了起来，眼神都亮了。”奥尔斯德说。

奥尔斯德以为这只是同行学者之间的对话。他不知道，宋健是中国超级科学家团队的成员。这些人凭借在部队服过役的背景，得以在文革中全身而退，而其他所有知识分子都饱受磨难。文革结束后，宋健和这些超级科学家是文革中为数不多的智力和社会资源都未受打击的人。

留苏归来的宋健是弹道技术学专家，是钱学森的门生。钱是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共同创办者之一，后因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中几次遭到羞辱，愤然辞去了美国的职务。中国对钱学森的归来自然非常欢迎。钱学森后来领导了中国的火箭项目，并带领了包括宋健在内的几名学生，而宋健后来在独生子女政策的酝酿过程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在钱学森的引荐下，宋健有机会接触到了最上层的政军届领导。其后几年间，他和他的同事李广元、于景元和田雪原使用了包括奥尔斯德在内的一批欧洲学者的观点，作为中国人口生育率控制计划的基础。但是，与奥尔斯德不同的是，他们并未把这当成单纯的学术问题对待，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了应用。

在 1979 年的成都人口论坛上，宋健和他的数学公式与梁中堂以人为本的建议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 三

成都的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在此次会议上，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方案。目前，这次会议是如何影响了后续的事件还并不清楚。部分史学家相信，此次会议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会上集体通过了火箭专家们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在会议召开之前，党的领导其实已经内定了这个方案，而成都的会议只是学者间的喧哗与争论罢了。不过，成都的会议至少说明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案存在的，而独生子女政策只是这些方案中最极端的一个。

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数学家团队在会上发表论文指出，政府到 2000 年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对这一说法十分不快，因此这篇文章很快便销声匿迹。后来，梁中堂因为公开发声质疑独生子女政策，遭遇更加不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席李秀珍则公开驳斥了梁的说法，并称“问题不可能有他说得那么严重。”

梁教授说：“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一言堂。忽然听到一个不同的、批判性

的声音，就好像滚油炸了锅一样。”

梁中堂的直率谏言展现了莫大的勇气。当时，很多学者都因发表与共产党观点对立的言论而承受沉重后果。此前 20 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就因此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 1959 年提出控制人口学说的马寅初现在竟被誉为独生子女政策之父。当时，马提出的主意与毛泽东的想法完全相反。毛自己的观念本就是摇摆不定的。他曾说过人口“越多越好”，也曾说过“以少胜多”，不幸的是，马寅初的厄运在于，当他提出要控制人口的时候，正赶上毛泽东觉得人口“越多越好”的时候。马寅初因此被草革职，直到二十年后才得到平反。

而梁中堂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对人口控制的反对意见。

在成都的会议上，梁中堂与火箭专家们产生了激烈的分歧。在火箭专家们复杂运算的对比下，梁中堂的预测就像洞穴人的涂鸦一样原始和混乱。

李广元在会上代表宋健的团队发言。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广元口才极佳，又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中国科技大学。他谈论到自己的团队是如何使用控制论——复杂机械系统中的控制和沟通科学——来计算中国未来的人口的。彼时，很多与会学者甚至都没有见过计算机，李广元所提出的“鲜为人知而又极其神秘的理论”，将整个会场的气氛都煽动起来。

火箭专家们认为，即使继续实施目前的二胎三胎政策，中国人口依然会继续膨胀。苏珊·格林哈尔希写到，根据他们的预测，“即时采用最为激进的措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人口在未来二十五年依然会增加。

会议后，梁中堂记得李广元曾询问过他如何计算未来 20 年人口数量的。

梁中堂回答说：“用笔算的。”

“那得多慢啊！如果用电脑就容易多了，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计算出未来一个世纪的人口数据，而且是绝对正确的。”李广元对梁中堂惊呼道。

几个月后，宋健团队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被解读为唯一能够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办法。

同年 9 月 25 日，共产党发表了一封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们自愿只生一个孩子。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进、为时最长的一场社会实验，就此拉开了帷幕。

从成都归来的梁中堂此时失望至极，万分沮丧。他痛苦地怨怼自己所见的傲慢的科学家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用 7 亿人民的生命来实验他们不精确的计算。”他斥责学者们“利用科学作为伪装，煽风点火”，为政府的计划摇旗呐喊。

直到二十年后，才出现了新的改革者和学者，试图通过逻辑和调查，解开当年独



生子女政策的戈尔迪之结。<sup>5</sup>

#### 四

回头看来，中国火箭专家们当时对于未来人口增长的预测是如此确信，让人吃惊。他们拒绝考虑人为因素和科技对这一预测的影响，对他们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十分笃定。

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宋健和于景元 1988 年发布的著作里一览无余<sup>6</sup>：

“自从人类数十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以后，就一直在与自然斗争。现在，人类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社会力量征服了自然，取得了光荣的胜利。

我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整个蔬菜王国，我们已经成为了动物世界的统治者，我们征服了所有曾经杀死或伤害我们祖先的凶残猛兽，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对他们的报复，让他们用生命偿还了对我们的亏欠。

我们已经驯服了江河与闪电，畅游于太空之中，登陆了月球，并向金星、火星和其他星球发送了信息……

简而言之，我们是历史的胜利者，我们已经掌控了世界，我们已经征服了外太空，赢得了自由。”

火箭专家计算出，中国的最理想人口数量约为 7 亿，但是，他们的计算是基于一系列可疑的假设。比如，他们所预设的中国人的理想饮食与西方人摄入蛋白质的情况相同。在当时的农业中国，生产力是无论如何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大量减少人口。苏珊·格林哈尔希说，整个计划本身包括了“无数大胆的设想”，这些设想的基础，都“仅仅是内行者的推断而已”

火箭专家们的计算并未考虑到随着中国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率会迅速下降。到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只有十年前的一半。

---

<sup>5</sup> 戈尔迪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的国王，他在自己以前用过的一辆牛车上打了个分辨不出头尾的复杂结子，并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示说能解开此结的人将能统治亚洲。这就是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戈尔迪死结”。然而，多少个世纪过去了，无数聪明智慧的人面对“戈尔迪死结”都无可奈何，直到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有人请他看了看这个古老的“戈尔迪死结”。经过一番尝试后，亚历山大挥剑将此死结劈成两半，“戈尔迪死结”也就被破解了。“戈尔迪之结”常被喻作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问题。

<sup>6</sup> 原文节选自宋健、于景元合著的《人口控制论》，中国学术出版社和 Springer-Verlag 出版社联合出版，原著为英文。如译文与中文原文有出入，请参考中文原文。



在与很多人口学者的对话中，我了解到，要预测人口的增长其实难度很大。预测只能合理地体现未来 20-30 年的人口增长，主要基于三个因素：出生人口数量，人口寿命和人口迁移状态。

在这三个因素中，只有人口寿命这一因素是目前能够准确推断的。而人口迁移模式和生育模式则很难预测，因为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个人选择。人口学者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评论说：“目前还没有哪个理论能够科学地解释生育率为何会出现变化，就更不用说预测了。”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总量可能会有 80 亿，也可能有 130 亿，完全取决于你相信哪种预测方法。而这两者的差异之大相当于 50 年代时全球人口的总和。学者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olas Eberstadt）说，人口学家知道 2030 年人口的数量，至于 2050 年的预测，则是“未知水域”，而对 2100 年的预测则已经是“科幻小说”了。

现已退休的奥尔斯德教授在谈及自己当年的数学问题时说，“这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练习。”其中并未涉及任何社会和经济因素。

“大概是因为住在大学里的缘故吧，我是学校的终身教授，当时我只是在努力让自己在数学方面不断创新。设计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和其他同事互相竞争，炫耀一下自己的成果，让别人知道你一直在做科研。我真的没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连环效应。”

罗马俱乐部的末日预言最终并未实现，但是，奥尔斯德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觉醒。它提醒人们要爱护地球，节约资源。在同等条件下，我们都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出于好奇，我询问奥尔斯德他生育了几个孩子。不出所料，他有三个女儿，五个外孙。在多次的采访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所有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只要不生活在中国，就都生了不只一个孩子。

相比之下，像学者王峰这样的人，虽然公开指责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策失误——比大跃进和文革所犯错误还要严重，且身在美国，但却只生了一个孩子。少了政府的限制，很多人所谓的支持独生子女政策，大都言行不一。

奥尔斯德后来与宋健有过几次碰面。2004 年，宋健再次来到代尔夫特看望奥尔斯德，此时的他已配有私人秘书，还携带了两名保镖。

那时，宋健已经晋升为中国最大的国家管理机构——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同时，他也参与了另一项备受争议的项目——三峡大坝建设项目委员会副主席。只不过，区别在于，这次，他所参与建设的不再是一条阻挡人类生育的大坝，而是一条阻挡长江滚滚洪流的大坝。

与独生子女政策类似，三峡大坝的建设也因其造成的计划外的负面影响备受批评。大坝建成后，洪水、山体滑坡及地壳运动频发，誉有“长江女神”之称的珍稀物种白鱀豚的灭绝速度进一步加快。讽刺的是，宋健当时还是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带

头人。

宋健将他 1988 年的英文著作《人口控制论》赠送了一册给奥尔斯德。在该书的其中一节，宋健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环境保护的观点，其中描述道：三峡在一千年前曾经是“猿类的天堂”，而后，由于人口增加，导致森林退化。“亲爱的动物们，你们要理解，人类的恩慈是有限的，我们会在动物园或者保护地给你们留下一片生存的空间，防止你们的灭绝。你们应该感谢人类的慷慨与仁慈。”

## 五

要理解独生子女政策的起源，不仅要问政策是如何产生的，还要问政策为何持续了这么久。

2000 年，一个由中国的顶尖人口学者和前政府官员组成的特设小组集结在一起，讨论如何改变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大人口学带头人顾宝昌就是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作为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任高级顾问，顾宝昌在计划生育的圈子里举足轻重，并且与共产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

另一个背景颇深的成员是张二利，曾担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高级领导，现已退休。其他改革派人士包括中国第一批留洋人口学者，比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王峰。他们的目的是收集和校对充分的证据，证明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智囊团聚集了中国最优秀、也最聪明的社会科学家。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接近三十年，小组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政策已经接近了尾声。

改革派人士希望能够对中国人心中长久的疑问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是多少？人口增长是否依然迅猛，或是已经出现了回落？如果有回落，具体回落了多少？还有，最让人好奇的是，如果政府放宽或解除政策限制，是否会导致一次大规模的婴儿潮，导致三十年的努力前功尽弃呢？

为了寻找答案，科学家们来到了 15 年前在梁中堂力主下建立的二胎秘密试点区。这些群体证明，放宽政策限制并不会导致婴儿潮。翼城和其他试点城市目前生育率均低于平均水平，性别比例更趋紧于平衡，且杀婴率和性别谋杀率都低于平均。

2004 年，改革小组将其调查结果以报告形式公布给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机构。改革小组指出，是时候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了。除了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加剧社会老龄化以外，小组还用充分的证据证明，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他们请求政府扩大二胎试点区的范围，允许中国更多地区的居民能够自由选择家庭成员数量和家庭规模。

但是政府并未被说服。很多人依然相信，中国的人口可能出现一次大规模婴儿潮

反弹。对改革小组持批评态度的人表示，翼城和其他二胎试点区并不真的代表中国。这不无道理。试点之一的酒泉位于新疆和内蒙之间，有游牧传统，且家族观念淡泊。恩施则是山区，当地传统一直强调男女平等。

一切因此又回到了原点。2006年，改革者们来到上海北部的江苏省，那里是最先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的地方。然而，只有约10%符合条件的夫妇生育了二胎。

2008年，改革者们再次向中国政府机构提交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报告。这一次，他们的语气更为迫切：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显著。证据中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老龄化情况。但是，用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教授蔡邕的话来说，“政府的反应依然如故。”

那之后，改革者决定将这场争论公之于众，而不再依靠内部的游说。他们开始将调查结果和评论公开发表在国内各大新闻媒体上。

此时，本来以荣誉教授身份为改革小组工作的梁中堂开始逐渐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当改革小组开始高调宣传翼城成功的事例时，梁中堂主动陪同学者和记者来到翼城，并利用他的个人关系帮助安排领导采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通讯员彼得·福特（Peter Ford）回忆到梁中堂时说：“当地人对他毕恭毕敬。如果没有他的陪同，我显然不可能有采访的机会。”

改革者同时也决定要取得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一直强调，独生子女政策可能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影响。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中就有背景显赫的网络企业家，携程网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梁建章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写过一本名为《中国人太多了吗》的书，书中指出，政策将阻碍企业发展和创新。

然而，改革小组依然屡屡碰壁。政府多次重申，独生子女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梁中堂愤怒地说：中国已经“成了一辆装甲车”，司机“完全看不到外面世界的变化”。

2012年，争论再度升温。22岁的工厂工人冯建梅怀有二胎，因为第一胎是女儿，所以她认为自己应该符合生二胎的标准。当地领导则不这么认为，要求冯和她丈夫交四万元罚款。

冯建梅觉得，即使合法性存疑，自己应该也能让孩子足月生产。只不过，在孩子生下来之前，她都有被强制堕胎的风险。因此，冯建梅开始了为了生孩子东躲西藏的日子，常常在亲戚家避风头。

有一次，为了躲避计生办领导，冯建梅在漆黑的雨夜在山里躲了几个小时。即使这样，她也未能逃出计生委的追踪。胎儿七个月的时候，计生委领导抓住了她，用枕套罩住她的头，强行把她拖到了医院。他们要求她丈夫邓吉元交十万元的罚款。多次协商后，领导同意他只交三万元。邓吉元从工友那里东拼西凑借到了一部分钱，火速赶往医院。他希望领导能先收下一部分罚款，剩下的打欠条慢慢还

清。但是领导给他回复了一条短信：“一分都不能少。”

与此同时，冯建梅被迫签署了一份《自愿同意堕胎》的声明。6月2号，冯建梅被注射了可致死胎儿的针剂。后来，她说：“我一直能感觉到腹中的胎儿在我身体里活动，可是打完针之后，它就再也不动了。”

冯建梅的遭遇让人出离愤怒，但也并非闻所未闻。自80年代早期后，有关孕晚期强制性流产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便屡屡出现。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学生史蒂夫·莫什（Steve Mosher）就曾在中国南方进行田野调查时亲眼见过几次。莫什后来将他的调查结果出版成书，却因此被斯坦福大学开除，理由是他在书中公开了一些图片和堕胎受害者的真实姓名，违反了该学科的基本原则（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讥讽地说：这些孕妇的权利被侵犯的程度不是更厉害）。也许是斯坦福大学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开除莫什。

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迅速好转，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交得起超生罚款，因此，这样的故事也渐渐淡出了视野。但是，冯建梅的遭遇再次引发了针对孕晚期强制堕胎问题的热议，并在网上广为流传。冯建梅的弟妹用手机拍了一张萎靡不振的姐姐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并排躺着的还有她七个月大已经成型的胎儿的尸体。这一图片在网上备受关注，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讨论。数万网民在网上评论计生委官员野蛮粗暴，谋财害命，尽管网监机构很快便删除了这些评论。连本来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城市居民都对此感到震惊。

改革小组抓住这一机会，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已迫在眉睫。此前不久，中央政治局下属的一个智囊团也提出了相似的申请。

改革小组中的前计生委领导张二利被冯建梅的例子触动极深。他在电视上含泪向所有曾经被政策强制堕胎的妇女表示道歉。他说：“我感到很罪恶。中国的妇女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给她们以弥补。”对于曾经的政府官员来说，作出这样的公开承认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何况，张二利本人就曾经是下令实施这些堕胎的人。

我在北京采访了张二利，他刚刚经历了化疗，但是却精神矍铄。在加入计生委之前，他曾经是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学教授。

“政策确实有欠缺，”他说道，“我现在可以这么讲，但是已经没有意义了。”

经过近10年的幕后游说，北京终于在2013年宣布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到卫生部之下。这一举措从制度上直接制约了计生委，被广泛认为是逐渐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步。

同年，政府宣布将继续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所有“单独”夫妇均可生育二胎。

这是近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商业分析人士预测，新的婴儿

潮即将到来，而相应的尿布、奶粉和车辆甚至钢琴的销量都会增加，好像两个孩子不能共用一架钢琴一样。

日本尤妮佳纸尿裤的股票在“单独”政策出台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涨了 4.2 个百分点，全年上涨了 44 个百分点。（后来证明这些分析家的预测是非常失误的。实际申请“单独”二胎的人数比预期低了很多）

“单独”政策出台后不久，我再次采访了梁中堂。这次，他显得很暴躁。

“政策出台的那天，我接到了很多电话。有些是国外媒体的。她们都觉得这个消息很令人振奋。我反问她们：‘如果这个政策是在你们国家实施的，你会因为政策放宽了就欢欣鼓舞吗？’”他说，“这看似是一种进步，实则是倒退。”

梁中堂说，“单独”政策只会影响到一小部分人。这对解决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问题其实只是杯水车薪。很多中国城市的夫妇都是独生子女，按照要求她们早就符合生二胎的条件了。

“文革期间，中国的价值观是家庭决定未来。三十年后，我们不再这样说，而是提倡平等和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在单独政策下，我们又倒退到了原来的样子：父母的决定影响你的一切。你现在不能生两个孩子，是因为你父母当时决定要生两个孩子。这依然不是你的选择。”

我们相对无言。

我瞥了一眼梁教授的书架，上面摆着他几个孙子孙女的照片。他在英国的女儿和在上海的儿子都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梁中堂说，在这件事上，他并未干预孩子。我望着他和孙儿在公园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白汗衫，满面春风，与眼前这个愤怒而尖刻的人判若两人。我问他，要如何向孩子解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如何向孩子们解释他的作为呢？

梁中堂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如果她们想听的话，我会跟她们讲真话。讲政策是如何确立的，如何实施的。我还会告诉他们，正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存在，说明中国的地位其实依然很低。这才是这一荒谬政策的真正根源。”

原本一直主张二胎政策的梁中堂如今已经不再相信计划生育的理念。“在我多年的研究中，我逐渐意识到，这并不是关乎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的问题，而是关乎人们自主决定的问题。”

一年后，官方数据表明，符合条件的夫妇里只有 35% 的人申请了二胎指标。比官方预测数字低很多。目前为止，婴儿潮并未出现。很多夫妇表示，养孩子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事实再次证明：卡珊德拉是对的。他还有另外一个预测：独生子女政策将在不到十年内废除。

## 四 人口警察

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

——赵紫阳

文明就是绝育。

——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

马青菊过去总在墙上挂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她的朋友中有哪些人怀孕了，大家都使用了何种避孕方式，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两个，是不是接受了结扎，是怀孕、已婚还是单身。“了解你的邻居”这句话在马青菊这里，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青菊 45 岁，性情爽朗，在翼城县黄家铺村经营一家小卖部。直到最近，青菊作为“小组组长”，每年还能多赚 400 块津贴，她的工作就是记录 10 个家庭的生殖习惯，并将这些细节报告给村里的计生委。

“这工作不难，大家互相都很熟嘛，”马青菊说。她自豪地告诉我，她的小组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了二胎限额。

黄家铺村总共有 500 口人，除了像青菊这样的小组组长外，还有 15 个全职负责计生工作的人员。

这些村级计生办公室是中国计划生育体制的最基本构成单位，而这一体制是个庞然大物：下至基层，有 8500 万兼职员工，上至国家计生委，有 50 万全职员工。同时，计生委还有下属的档案部、统计部和宣传部，还有附属的药理学研究中心、电影制作和发行单位，以及负责展览和会议的咨询中心。而其他诸如部队和公安这样的国家机构还拥有自己内部的计生部门，国有企业内部同样也有。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之所以没有迅速结束独生子女政策，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计生机制的复杂性和影响范围。计划生育与政府的日常工作结合如此紧密，其带来的收入也已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导致政策的终结之路举步维艰。

我到翼城去就是为了了解这一庞大体制在基层的运作方式。由于翼城生育指标相对宽裕，我得以联系到一些退休的计生委官员现身说法。很多官员在 80 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之前就已经在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了，1985 年翼城推行二胎试点之

后也还在岗位上。他们向我解释了政策的种种摇摆不定，这让他们自己都觉得晕头转向。

例如，青菊向我解释说，现在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养育孩子的开销太大，所以她负责的小组里面的年轻人根本不想生二胎。

“大家都只想生一个，”青菊说。自 1985 年来，黄家铺只有一户人家生了第三胎。这对夫妇是做汽车部件生意的，相对比较富裕。

但是，即便二胎指标相对宽松，有些规定依然让人觉得很麻烦。比如，90 年代时就有规定要求，已经生育二胎的女性必须接受绝育，还有规定说两个孩子之间必须有五年以上的间隔。

如果有的妇女虽然不想再生育，但是不想做绝育呢？如果一对夫妻生了第一胎之后三年就又怀孕了，而不是五年呢？根据黄家铺前任村长黄登高的说法，这时，即使翼城这样温和的计划生育体制也会展现出丑陋的一面。

最常见的惩罚措施是罚款：超生儿童的父母要承担数额约是他们可支配年收入五到十倍不等的罚款。“如果他们太穷，交不起罚款，我们就去他们家里搬东西，不过这样的事只发生过几次，”黄村长说道。电视是最受欢迎的，基本上抵得上一个村民一年的收入。还有桌子、自行车、洗衣机。这些东西通常由一组兼职计生执法人员（通常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收走然后卖掉，所得收入归镇政府。对黄村长来说，这些做法并不算强制行为。他把这些称之为“劝说”。

黄村长说，他做过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劝说妇女绝育。很多妇女都害怕做绝育手术。有些术后并发症，比如过量出血，并不罕见，加之有些手术的过程就像流水线一样简单粗暴，的确容易出问题。黄说，村里的妇女曾经试图与计生委讨价还价。有些人问是否可以使用避孕器具作为替代，有些人则承诺不会再生孩子。“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做绝育手术，不然我就达不到目标了，”黄说，“空口无凭，我实在没法保证她们就真的不会再生孩子了。”

靠绝育来降低生育率是一种万无一失的做法，所以中国对其情有独钟。而其他非永久性的屏障避孕法，如避孕套、口服避孕药和节育环等，都是个人可以选择和控制的，因此可靠性没有那么强。尽管节育环（无尼龙线的不锈钢环）已是经过特殊改造的，确保女性无法自行把环取下来。1983 年这一年，中国就有 2000 多万人做了绝育手术，这比美国三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的人口加起来还要多。

如今，黄家铺已经不再强制进行绝育。小镇的人口在 1983 年达到顶峰（将近 600 人），之后就开始回落，因此，这一措施已经不再必要。上世纪 80 年代时，黄家铺小学还有 50 名学生，但到 2008 年却只剩 7 名学生，因而该校被迫与另一所小学合并。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农民工流向城市，但主要还是因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



在我采访翼城计生委干部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说，他们常安慰自己说这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执行重要的国家方针。我觉得，这些话有的只是充门面，为自己做的这份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工作辩解罢了。大部分人似乎都言不由衷。在我采访车月莲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车月莲是翼城另一个村子西河水的医生兼计生委官员。

车月莲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最早的时候，她的工作主要是传授生育控制技巧，鼓励人们少生孩子。一个 23 岁的小姑娘冒冒失失地给大家讲授绝育和堕胎的事情，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说：‘你如果可以帮我们接生，那我们会很感激。但是你一个小姑娘来告诉我们不要生孩子，这哪行。你还是少管闲事吧。’”车月莲说道。

如今，年近古稀的车月莲还在村里的诊所工作。诊所是个小四合院，椽子上挂满了晒干的玉米。在给一个老人输完液后，月莲，这个身形圆滚、肤色黝黑、眼神锐利的女人，坐下来点燃了一根烟。在后来艰难的对话中，月莲手中的烟没有断过。她回避我的问题，面色十分不悦。

如黄村长一样，她不断地称自己的工作为“劝说”。我问她是否曾经劝说过大月份的孕妇流产。月莲起初说这是非法的。后来又说自己没有这样做过。再后来却回忆起自己曾经劝说过一个已经怀孕 6 个月的孕妇堕胎。“她自己都不知道已经怀孕 6 个月了，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一脸胜利地说道。

第一个成功地被她劝说流产的人，是一个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的 27 岁的妈妈。这个女人想做流产，但是害怕公婆不同意。月莲陪着她偷偷去做了手术，然后用自行车载着她回了家。可是，尽管费尽力气，月莲却被这个女人的家人咒骂。“她婆婆诅咒我说：‘你自己家里没有儿子就算了，我还想要个孙子传宗接代呢。’”甚至连月莲自己的父母也骂她。“但是我说，尽管这工作麻烦，但总要有人来做。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很严重，大家都说如果谁没有儿子，死了都没人埋。”

面对计划生育的律令，即使是亲戚也不能网开一面。月莲外甥的媳妇 22 岁就怀孕了，比法定的生育年龄还早两年。月莲叫她去做流产。“我跟她说，她要给别的妇女做个榜样。大家都看着我们呢。”

在跟月莲的交谈中，我吃惊地得知她竟然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当然，她的儿子（也是她最小的孩子）是 1978 年出生的，那时计划生育政策还没开始。但是，月莲多年来的工作就是鼓励大家少生孩子，生男生女都一样。她又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和她所鼓吹的理论之间的差别呢？

最初，她无视我这个问题。“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最终开口了，边说边摁灭了她的第五根烟。“我的养父母身体不好，我也是。他们没有生过孩子。所以我想生个儿子，以后儿子好照顾我和我的父母。我也曾经试过上环，但是出血太厉害。”

儿子出生后，月莲终于做了她毕生都在劝说别人做的事情。她做了输卵管结扎。



## 二

对人口警察的运作方式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是一趟浑水。

1980 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时候，大家就都知道政策如此不受欢迎，推行起来会很艰难。起初，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宽严不一。在有些地方，没有准生证的孕妇被带上手铐强制接受流产，而其他地方，官员却对中央政府的这些禁令视而不见，或者仅仅是嘴上管管，并未采取实际行动。

而其他的国家规定也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相悖离。同样出台于 1980 年的新婚姻法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为女性 20 岁，男性 22 岁。这本来是为了减少非法婚姻和性犯罪，但同时也鼓励了早婚，进而带来了更多新生儿。农业去集体化的改革同样也削弱了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努力。在集体管理下，不论是工资、定量供给产品还是其他福利都是由村干部分配的，而像超生这种不良行为可以直接由村干部进行处罚。可是新的规定则放松了官员对农民生活的控制。

到 1984 年时，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已经人心尽失，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将政策的一大部分决定权下放到各地。通过人口学者所称的“七号文件”，政府确立了新的规定，各省份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主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这一规定给后来大量的特殊条款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国内人民（国外就不说了）只能极其模糊大略地理解计生政策，因为各地的状况实在大不相同。举个例子，很多农村居民如果第一胎是女儿，就都可以生二胎，这实际上是默认了农村盛行的重男轻女思想。而在西藏和云南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政策要比在四川和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宽松很多。

七号文件的目的是减轻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难度，而不是让普通百姓的生活更轻松。政府把这一措施叫做“开小洞补大沟”，用小的让步保证整体的服从。

七号文件并未解决体制内部整体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问题。地方官员在决定罚款数额时有极大的自由度。罚款数额可能是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两倍到十倍不等。人们无法提前计算应缴罚款的数额，违反了政策的情况相似的两家人，要缴的罚款数量可能有天壤之别。2010 年，计生委官员对一个超生人员征收了 500 万人民币的罚款，约合 80 多万美金。当地媒体报道说，当事人提出抗议时，计生委据称还增加了他的罚款，扬言：“你就是菜板上的一块肉。”

实质上，中央政府传达给各省的信息是：“完成预定的生育指标，不管你们采取什么方式不重要。”他们希望各省能够自行筹集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资金。这就让体制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虽然冯建梅被强制引产的故事 2012 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且这种行

径触犯了多条法律，但是，没有一位计生委官员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向前国家计生委官员张二利询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他向我解释说，国家计生委无权处置地方计生委官员。“我们只能调查他们，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给省级领导。他们才有权力惩罚或开除涉事的官员，我们不行。”

大多数基层计生官员都告诉我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不论自己做了什么，都不需要负担刑事责任，因为完成计生指标控制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只要能控制住指标，我们做什么都行：毁坏房子和财产、抓人，甚至吓唬说要把孩子没收都，都不会挨批评。”四川一个前任县级干部告诉我（后来我得知，另外一个省的官员真的没收了孩子，在第八章我会详细谈到）。

中国领导层内部贯穿整个 80 年代的激烈争斗也加剧了这种混乱的局面。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倾向于实行更为入道的二胎政策，而强硬派则坚持要继续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两派争论不休。

1988 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份通告指出：“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危机”。通告指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工作过量的计生工作人员遭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等。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很多省份在报告中做假。人们逐渐发现，要在 2000 年将人口数量控制在 12 亿之内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 1988 年，80% 省份的人口数量就已经超越了控制指标。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和后来的无情镇压，标志着中国强硬派的胜利。赵紫阳等支持二胎试点的官员遭到清肃。生育指标控制依然要严格执行。

1990 年，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名为“一票否决制”的问责机制，将控制生育指标确立为省领导的主要工作之一。所有干部，不光是计生专家，还有一切行政人员，只要未能完成所管辖区域的生育指标控制，就要面临减薪、降职甚至是开除的处分。即使干部完成了其他方面的工作指标，也于事无补。只要在计生工作上有一个黑点，就能抹去其他所有的成绩。

“一票否决”成了悬在省领导头上的一条鞭子，刺激着他们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有些省份为了保险起见，把生育指标定得更紧。一位干部告诉我说，他们有时会收到一些荒谬得命令，比如“接下来一百天不许有新生儿”。而这样的命令他们也必须执行。

罚款的数额涨了，且不再仅是对超生。女性非婚同居要罚款；不采取避孕措施，即使没有怀孕也要罚款；甚至不参加常规孕检也要罚款。在江苏，妇女每个月就要排队接受两次孕检，且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杯子里排尿。人口警察执行任务时毫不手软，他们的方法行之有效。

真正给我解释人口警察具体工作的，是一位 15 年前出逃到美国的计生委中层领导。

1989 年，高某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提供了大量有关她所负责的中国福建省永和镇计生工作的内部材料，包括文件、录像、图片等。从拘捕不服从的人员及其亲属，到毁坏他人财产、强制实施大月份堕胎，这一强迫性体制被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眼前。

高向我描述，她曾经告发过一个已有九个月身孕但没有准生证的妇女。“在手术室里，我看见孩子的嘴唇在动，手和脚也都还在动。医生给它脑部注射了毒素，孩子就死了，被扔进了垃圾箱。”

高现在住在美国西海岸的城郊。在我保证不泄露她住址的前提下，她答应与我见面，因为邻居们并不了解她的过往。

高说，在听证会之后，她的一些同事和亲戚遭到了殴打和逮捕。据她所称，有一个同事被打死，另一个遭到强暴。我无法独立验证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在听证会之后，新华社发布报道称，高和她的丈夫拖欠贷款，因涉嫌诈骗而被通缉。

高坚称这些罪名都是罗织出来的。“如果我那么有钱，为什么现在要过这么苦的日子？我现在当家政工人，手都抬不起重物了。”

我见到她的时候，万圣节刚刚过去。这个曾经说自己是“恶魔”的女人正告诉我她要给邻居的孩子们发糖吃。她和气地说道：“孩子们一晚上都不停地按门铃呢。”

高现在住着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房间里贴满了卡通人物的海报，墙上挂着中国结。大厅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把巨大的人造革按摩椅，彰显着主人的身份，旁边悬挂着狮子王的海报，写着“Hakuna Matata”<sup>7</sup>——无忧无虑，地久天长。

这与当年她关押别人的荒僻牢房相去甚远。被她关押的人大多是超生孕妇的亲戚。高会把他们关起来，逼这些妇女去自首。她说，关押他们年迈的父母是最管用的，“很少有人想到老母亲因为自己而蹲监狱，还能不为所动。”这些人会被关押在计生办公室旁边的“黑监狱”里，一天要收取 6 块钱的伙食费。他们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有时候一关就是几个月。

高还讲述了计生委干部的一种工资奖励机制，这一机制和他们实现的结扎和堕胎手术的数量直接挂钩。这些奖金加起来最多时有他们并不丰厚的基本工资的一半，从数量上讲并不算多。“所以大家才特别愿意抓人。你抓的人越多，拿的奖金就越多。”高说道（我采访过的其他地方的官员也曾描述过类似的奖金系统）。连医生都愿意多做堕胎手术，手术做得越多，奖金就越多。她还宣称：“有的女孩子

---

<sup>7</sup>古老而神奇的非洲谚语：“HAKUNA MATATA”，来自于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是东非地区如肯尼亚，坦桑尼亚等所使用的语言，是“从此以后无忧无虑”的意思。

本来没有怀孕，也被强迫做了手术。”

这样的体制肯定很容易滋生贿赂行为吧？高说是的，但宣称自己从未接受过贿赂。常见的贿赂形式就是花钱请干部开一张证明，说明某人没有怀孕。离开永和去外地工作或者旅游的人都需要这个证明。由于干部有权自行决定罚款的数额，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私吞一部分罚款，或者收了罚款却不开收据。高记得她有个同事，把整整一本收据都“弄丢了”。

在高长篇累牍地讲述这些恐怖故事的时候，她反复强调，自己别无选择，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时，她尽力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在工作上，“我白天是个恶魔”，而在个人生活上，她是母亲和妻子。但即便在家里，她也不能完全躲开工作，因为她自己就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女儿出生后，她背着别人收养了一个儿子。那之后很多年，她都把儿子藏在亲戚家里，从来不让他当面叫自己妈妈。

现在，高的家人和她一起住在美国。离开中国后，她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样就能够在美国长期合法居留。但她依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并且她的居住权前景仍不明朗。在一批反堕胎人士的帮助下，高得以来到美国，而她的证词恰恰可以帮助敦促美国政府取消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赞助。在作证之后，高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但遭到了拒绝，因为美国只向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提供政治庇护。在赞助人的帮助下，她获得了在美国境内工作的权利，但却未能取得绿卡或美国护照。由于不会讲英语，她只能做些卑微的工作，也无法离开美国。她说，她甚至无法探望自己年迈病重的母亲。

“最后，我努力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一定要永远被惩罚吗？”她的眼神游移着。

作为赎罪，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如何救了三个婴儿的故事。在母亲被注射了会导致孕晚期流产的化学溶液之后，这三个婴儿出生时都还活着。“我偷偷把他们包了起来，交给了孩子的父亲。我告诉他把孩子放在包里，假装包里装着东西，而不是孩子。告诉他们走之前不要打开包，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了。”高啜泣着说。

除了救了这几个孩子外，高自己估计，她批准了约 1500 次堕胎手术，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孕晚期。

#### 四

高描述的这些强迫性手段令人痛心，但是这是否只是一个不合常规的极端例子呢？这种策略的使用有多广泛，又实施了多久呢？

直到 21 世纪初，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政策的强迫性，但是很多国际人士都选择相信遵守独生子女政策是基于自愿原则的。1983 年，历史上第一个联合国人口奖被颁发给了对人口问题有“突出贡献”的个人：英迪拉·甘地（为奖励她实施强制性结扎），还有中国人口计划部部长钱信忠。

作为奖项，这和诺贝尔和平奖给亚西尔·阿拉法特颁奖的性质是一样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至今还为这段历史感到汗颜，但是，这并未影响前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席那菲思·萨迪克在 2002 年接受中国政府颁发给他的奖项。萨迪克博士说，她相信独生子女政策的这种强制执行是罕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北京的合作。也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美国政府在要不要继续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赞助的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

曾与我私下交谈过的前任联合国官员和其他非政府机构官员都说，他们一直在背后致力于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朝着服务性的方向引导。在我与他们交谈的时候，北京正在谨慎地尝试这些方法，其中一个试点项目试图将计生执法者转换为育儿咨询师。但是，这样的做法毕竟很有限。

从逻辑上讲，只要独生子女政策继续存在，且生育指标和控制继续实行，那么强迫性手段就会一直存在。就在 2010 年，广东普宁还开展了一场涉及近万人的绝育运动。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消息，约有 1400 名未绝育夫妇的亲属被拘禁，目的就是迫使这些夫妇同意接受绝育。

然而，我相信，这些权力滥用的本质已经不再是强制性流产和结扎了，而是越来越以收罚款为目的。一部分原因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了很多县乡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那些贫困地区。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推行了土地税改革，要求各省份上交其收入，由国家财务部统一进行再分配。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就意味着低收入县乡政府和村政府失去了几乎所有的独立收入来源。唯一的特例就是超生罚款，这一项不需上缴国家。记者庞某说：“人们常说，提到钱的问题，‘大城市靠土地，小城市靠计划生育。’”身为记者，庞详细地纪录了湖南某小城计生委干部的此类滥用罚款的行为。

2013 年，律师吴有水利用中国法律中类似于美国信息自由法案的一个条款，要求各省份上报其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数目。总额达到了 27 亿美金，但是吴有水说，这一数字很可能低于真实数字。

“这些数字肯定是假的。很少有真的。”吴有水说。吴有水还曾多次要求各省份解释其社会抚养费的具体用途，但是遭到了拒绝。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省提供了这些信息。这让他的判断显得更加可信。

社会抚养费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2000 年才被采用。在那之前，罚款被称为“超生罚款”或者“计划外生育费”，而社会抚养费这个新名词则暗示这笔费用将用于支付社会要负担的超生儿童的开销。但是，我采访过的所有领导都说，不管叫什么名称，超生罚款最终都会花在办公室维护和人手上，有时会花在娱乐开销上，或者流入其他部门。要想有具体的记录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在吴有水位于杭州市郊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杭州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如今，这里有众多的科技公司，其中就包括电商巨擘阿里巴巴。但是，吴有水的生意似乎并未跟着繁荣起来。他狭小的办公室和许多小型地产公

司挤在一层，其中一部分还挂着歇业的牌子。

吴有水个子很小，腰杆挺直，留着淡淡的八字胡。他的个人历史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很深的渊源。他记得小时候回家的路上，看到很多妇女被计生委围堵并被抓去做绝育。有的人奋力反抗，把当地官员的裤子都扒了，“她们说：‘你要让我们绝育，我们就让你绝育。’”吴有水回忆到，“不过最后，她们还是都被强制绝育了。”

吴有水是家里的老幺。他有七个兄弟姐妹，有三个都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死了。吴有水的哥哥生了三个孩子，第四个被强制堕胎了。有个姐姐在计生部门工作，“她帮忙掩埋那些死了的孩子。”

吴有水是基督教徒。他说，自己最开始对社会抚养费这件事产生兴趣，是在去邻省出差的时候。他发现当地很多人都有三四个孩子。当地人跟他说，政府实际上鼓励大家多生孩子，这样才能征收更多的罚款。

2013年，随着北京决定将计生委并入卫生部，吴有水相信计生委的权力已经开始衰退。于是，他向各省提交了要求公开信息的申请。之后，他便开始为想要挑战这一政策的客户提供无偿服务。

吴有水承认，他的这一要求其实在本质上有些像乔装攻入敌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行动。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挑战社会抚养费这一问题，让人们都注意到独生子女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合法行为。吴说，他的行为是为了“开创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空间。”“我通过这个请求，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开端。”

比如，人口警察使用暴力或提倡孕晚期堕胎，从理论上讲是违法的。官方不给超生的孩子上户口也是违法的。但是，官员们说，没有这样的惩罚措施，就无法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在过去三年里，出现了很多在法律上挑战独生子女政策的诉讼。这在之前是闻所未闻的。这些案例中有大约三分之一都是因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过大而起诉，而其余案件则涉及超生儿童无法上户口的问题，还有就是人们因为超生而失业的问题。

大多数此类案件还未开庭就已经被驳回。但是，2013年的一个案件让申诉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山东和江西两省都作出了判决：不论是否支付社会抚养费，都必须给孩子上户口（这其实是重申了原有的国家规定，只是此前显然并未被一致遵守）。对北京上海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来说，这一问题则颇有争议性，因为大城市通常希望限制居民数量，防止现有的社会服务和资源被进一步消耗（举个例子，让人眼红的北京户口目前黑市价已高达65万人民币）。中国目前约有1300万人口没有户口，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违反独生子女政策所致。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中国政府未来几十年的大难题。

吴有水说，他并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政治后果。我向他提起了活动家陈光诚的命运。2005年，陈光诚针对他所在城市的计生委强迫本省妇女流产的问题发起了集体诉讼。失明的陈光诚曾经坐过牢，又在家中软禁数年，2012年戏剧性地逃到了美国大使馆。陈现在居于美国，但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家人仍受到政府的骚扰。

吴有水认为，只要他谨慎地选择一些“安全”的话题，就可以避免和陈光诚一样的命运。比如，社会抚养费这种不得人心的问题在他看来比堕胎问题的政治风险要小得多。他说独生子女政策称是“违背人性、非法而且不合理的。”但是，他补充说，面对当时仍然权力巨大的计划生育体制，“我要想出一些办法，以不敏感的方式谈论这个问题，但是仍然造成影响。”

2015年七月，北京开始打压人权律师，并以利用敏感问题破坏社会稳定为由拘禁了大约两百名律师及其助理。在我撰写本书时，吴有水仍是自由身。但是他说，他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自己依法挑战的尖锐程度。现在他说，所有“追求法治的人”都面临风险。“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永远也无法断定政府的底线在哪里。而且，这一底线本身也在不断变化。”

## 五

关于人口警察的工作，我记忆最深的一次交谈是和一个我打算称为李叔的人。

李叔是一个朋友的亲戚，是个生意人。知道我们要去相邻的镇上，他主动要求送我们一程。他开着一辆黑色奥迪来接我们，身上的衣服是中国城市相对富裕的男性的清一色着装：Polo衫，领子时髦地翻起，又大又沉的手表上有很多复杂的转盘，男款皮包。我发现他的车保养得很好，小袋里面配备着墨镜，车上有纸巾盒，还有矿泉水和小巧的弓形头枕。我一边欣赏，一边就和他聊了起来。

原来，1994年，李叔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县级行政人员。说起这段往事，李叔的话多了起来。由于“一票否决”，完成人口控制指标成了他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交不起罚款，我们就没他们家里值钱的东西。不过，村民们都很穷，所以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不过是些粮食和粗布，”李叔回忆说，“有时候，我们会爬到人家房顶上打个洞，或者砸碎人家的窗户，证明我们是认真的。”在他们这个省，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很严格，罚款也很重。

我们停车吃午饭，李叔还在兴高采烈地跟我们讲有关财产损失、没收和罚款的事情。我不想打断他的思绪，但心里却按捺不住地想问他：你天天这样横行霸道，自己怎么受得了？

最终，我鼓起勇气问道：“这工作肯定不好做吧，人们都不愿意照你说的做。”

他突然沉默了。然后说：“有一件事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年我 24 岁，我们听说有个妇女指标外怀孕了，躲进了邻村。我们便计划晚上抓捕她。我找来六七个人组成了一个中队，包围了她住的地方。我们当时动作很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肯定被这个女听见了，也许是我们说话的声音吧，反正她开始逃跑。”

“她怀孕几个月了？”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她肚子已经很大了。她跑呀跑，一直跑到池塘旁边。然后就朝水里跑去，直到水没到脖子，”李叔用手在喉结处比划着，“她就站在那儿，开始大哭。”

他描述的画面把我震住了。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在黑暗中哀嚎，岸上的计生办干部们像捕猎者一样团团围了上来。

“后来怎么样了？”

他别过脸去。“等一下，好吗。”他的声音再也不像刚才那样轻松愉快。

“她说了很多话。她说她必须要生这个孩子。如果不生下来，她永远也得不到安宁。如果她不生个儿子，她的丈夫和婆婆永远都不会好好对她。”

他点起一支烟，清了清嗓子。

“最后，两个女干部下水把她拖走了。”

我们都沉默下来。

“你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为什么单单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我问道。

“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吧。”他缓缓地说道。“我觉得我们这么做是错的，可是我别无选择。后来，我就被升职，离开了那里。”

那一晚，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就把它讲给了我晚上要见的一位之前的学生听。她就是在那片地区长大的，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震撼，但类似的故事，她应该也听过很多。

她边听边瞪大了眼睛望着我。

“可是你肯定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呀。你的同学呢？他们肯定有人是农村来的，也该跟你说过这种事吧？”我惊讶地问她。



她当然也对独生子女政策有大致的了解。可是这个故事太过残酷和鲜活，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你要知道，我上的是人民大学。要进那样的学校，你必须上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初中。那些学校不是农村的孩子想进去就能进去的。我的朋友和同学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中产阶级，是城市里的孩子。

我又一次意识到，虽然网络已经非常发达，世界也越来越全球化，但是中国人对历史上的近事依然所知无几。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林慕莲在撰写关于 1989 年天安门学生抗议的著作时，走访了中国四所顶尖大学，并向学生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的照片——一个人独自挡住了前行中的一队坦克。在西方，这张照片让人一望就知是六四事件。但是，林发现，一百个学生中只有十五个认出了这张图片。

让我觉得十分意外的是，我的学生这一代人，对于这个决定他们出生并将持续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知之甚少。对他们来说，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

## 五 小皇帝长大了

80年代出生的人到现在最大的28岁，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势，所以权利滥用造成的后果再推卸到这代人身上是无辜的。自己的屁股没擦干净是不能用下一代的胎毛来做草纸的。

——韩寒，《这一代人》

如果你从小就把孩子奉若神明，那么他们成年后就会行如魔鬼。

——P. D. 詹姆斯，《人类之子》

—

中国的任何公共场所都常常能见到这样的一幕：一个蹒跚的婴儿被一群乱哄哄的大人围作一团。这就是中国的小皇帝，一群比熊猫还珍贵的存在，尽管在繁殖上他们并不像熊猫一样稀少。

我很好奇，这种现象如果反转过来，会是何种情形？当小皇帝长大了，要把这些关注六倍归还，由金字塔的塔顶变成塔底，会如何呢？

在独生子女政策发生调整时，中国有90%以上的城市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这意味着一亿以上的独生子女最终将不得不赡养年迈的父母、祖父母，并承担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情感负担。他们要面对老年痴呆、癌症、脆骨症、股骨头坏死，而中国刚刚起步的社会保障体系能为他们提供的帮助则非常有限。

2007年，我开始寻找报道这一问题的角度。这并非易事。当时，最早的一代独生子女刚满30岁，父母也才五十多岁，大部分都还健朗。我想写的故事，那时还没有发生。

我开始寻找一个有着不寻常境遇的人，他/她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却要照顾一位病中的父母。就这样，我遇到了在国内小有名气的刘霆。他出名的原因有些奇特：他带着母亲上了大学。

当然，我所说的“带着母亲上大学”，并不是说他真的带着他妈妈去上课了。刘霆的母亲患有肾病，需要人悉心照料。父亲是个赌徒，由于不堪忍受婚后多年的积怨，丢下妻儿一走了之。刘霆要去另一个城市读大学，母亲陆永敏无人照顾。

刘于是带着母亲和自己一起住进了校园，这一需要决心和毅力的反哺行为，一时间令举国为之动容。

在其他国家，这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中国自古就有孝敬父母的传统。“孝顺”这个词翻译成英语就是“儿女的尊敬”，但这远不能完整诠释孝顺的真正含义。至今仍被用来教育孩子的系列古老故事《二十四孝》，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自我牺牲来展示孝心。“孝子”仲由百里负米以孝敬双亲；吴猛恣蚊饱血让父母安眠；黔娄尝父粪便以查其病况。就连对配偶的父母也要操心若此；贤德的唐夫人乳姑不怠——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年迈的婆婆。孝道的极致，在于把父母放在比孩子更高的位置上，因为古人的想法是：孩子可以再生，母亲却不可复得。

文革期间，孝道与其他家庭生活的基石都深受打击。毛泽东领导的政府鼓动孩子以破四“旧”（旧习俗、旧文化、旧习惯、旧思想）的名义，反抗他们的父母，打倒权威。在一个事例中，16岁的张红兵告发自己的母亲污损毛主席像。两个月后，其母被枪决。数十年后，满心愧罪的张红兵发表了长篇的公开忏悔，称自己作为儿子“禽兽不如”。

2007年，面对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改变以及自身一手造成的家庭结构瓦解，共产党领导层开始有所警惕，试图复兴传统价值观。在一系列的相关举措中，有一项就是设立一系列的全国道德模范奖，类似于给高尚的价值观（如诚实、爱国、孝敬长辈等）颁发的诺贝尔奖。刘霆是第一批获奖人，也是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

奖项给这个孤独的年轻人带来了他始料未及的名誉。书刊、报纸文章和连环画都传播着他的故事。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首为他专门创作的名为《母亲》的歌曲。一位当地开发商免费配给刘霆一间豪华公寓。他的母亲也因他全国道德模范的地位而获赠一个肾。人们为他母亲的手术募捐手术费；广州孝道文化广场甚至还树立起了他的雕塑，不过他自己从未见过。

这位当代孝子到底是谁？他代表独生子女的一代发出了怎样的声音？他的艰难困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将要到来的压力？

为了见他，我来到了上海西部距上海约4小时车程的小城临安。刘霆身材瘦弱，下巴尖细，皮肤细腻白皙，安静而谦和。见到我，他马上握住我的手，亲切地称我“凤姐”。我注意到他指甲剪得很短，只有拇指指甲留得很长。在中国，岁数略大的男人常有这个癖好，但是在他这个年龄的人当中却很少见。单指留长的指甲代就像劳力士或者名牌手机，代表着富足和闲适，因为农民肯定是保养不出这么好的指甲的。当我问起他的指甲时，刘霆红着脸把手背到了后面。

刘霆收到的大量关注让他十分吃惊。

他的生活在兼顾学业和护理中度过。因为需要照顾母亲，他所做的一切都受到限制。母亲患有尿毒症，常会感到疲劳和恶心。他早上六点起床，准备热绿豆粥作早餐。每天下课后，还要去菜市场买新鲜食材，确保母亲能吃得有营养。我和他同去过一次，看着他轻车熟路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去买小葱和豆腐。卖豆腐

的人娴熟地从桌子大小的一整块豆腐上切了一小块给他。当时，沃尔玛超市和它的中国模仿版——物美超市已经在临安这样的小地方开设了分店，但是，精打细算的刘霆很少去这些冷气开放的舒适堡垒里购物。

“菜市场虽然有时候让人不舒服，但却能买到最新鲜最便宜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绕过满满一桶活青蛙。墙角有一只颤抖的狗，腿和嘴都被捆住，难逃盘中餐的宿命。刘霆转过脸去，不愿看它。

中国的菜市场跟西方文雅的农贸市场有着天壤之别。西方的农贸市场有免费试吃的奶酪和有机橄榄油，而中国的市场则充斥着随意的残忍：卖鱼的从桶里挑出一条滑溜溜的鳊鱼，当着你的面用大棍子把它的脑袋砸碎。刚宰杀的鸡的鲜血和内脏泼洒在地上。小贩们穿着雨靴踏来踏去，像舞者一样欢快，胳膊上带着花花绿绿的套袖。市场上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蹄子肉、鲜花、手擀面条、香火、印着Hello Kitty图案的内裤，还有用来教训孩子或者宠物的小藤条。

在市场里，我一路都看到人们对刘霆侧目，这就是小城市名人的命运。临安的人口只有5万，按中国的标准算人少的（即使到2013年，临安依然如此无足轻重，连中国的北斗卫星上都找不到它）。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刘霆的名望让他备受瞩目。他不能走错一步。买东西的时候，他频频点头致意，礼貌地回答着问题：妈妈身体怎样？学习怎样？有没有女朋友？挤上公交后，刘说：“我有时候当然也不想应酬，但是我不能不客气，人人都看着我。”回到家，刘匆忙地做起了晚餐：蒸鱼、熬汤、煮饭。饭后要洗碗，要给母亲按背揉脚，最后才有时间写作业。

刘霆最欢乐的记忆是大学的前六个月，那时他还没有家庭的负担。他住在宿舍里，参加各种聚会，纵情于自己喜爱的摄影、艺术和戏剧。接着，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必须给她换肾才能活命，而他们家又付不起手术费。刘霆于是搬出了宿舍，住进了一间破落的公寓。他靠自己的学生贷款支付着母亲的医疗费，还在学校里找了一份做门卫的兼职。

当地一位记者听说了刘霆的困境，以一篇报道改变了他的生活。第二天，学校的电话就被读者打爆了，大家纷纷为他捐款。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 二

中国80年代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曾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被称作“小皇帝”的独生子女一代，会不会是一群被过分纵容，过分宠溺的孩子。如果是，那中国的未来会如何呢？

1992年，这个国家最大的隐忧似乎在一项著名而备受争议的研究里成真了。由中国青年和儿童调研中心副主任孙云主持的研究，调查了一群在内蒙古露营的中日两国儿童。研究将中国儿童描述为爱发牢骚、爱抱怨。与日本儿童不同，中国的孩子不知道节约粮食，也不会做饭，总是想要大人来帮忙。孙云霄说，中国父母也难辞其咎，他们不论孩子何时需要帮助，都会立刻上前，而日本父母则更冷静克制，让孩子学会独立。

此研究虽被指为不科学，但是却留下了长久的阴影。我在全美中国学生最多的南加州大学教书的时候，我的中国学生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实验，当然，他们对此也争议颇多。虽然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更自私或者自恋，但是他们承认，没有兄弟姐妹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好处：如果家里有别的孩子，父母肯定负担不起南加州大学的高昂的学费。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针对中国的独生子女现象又出现了很多更为严谨的研究，而结果参差不一

尽管有些研究支持小皇帝假说，发现中国的独生一代确实更自我中心、生存能力较差、自控能力也较差，但是，也有许多研究指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并没有显著的差别。有的研究表明，这些社交方面的弱势随着独生子女在学校和其他社会机制中完成其社会化而逐渐消失。还有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在学术能力和社交能力上都更有优势。2007年，国家科学院（NSI）开展了一个有8万5千名儿童参加的大型研究，最终也只得出了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体重更重、身高更高、视力较差的结论。

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中国的小皇帝们初看起来并无大异。但是和其他年龄段的孩子相比，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却有明显的差别。

2012年，丽莎·卡梅隆带领一组经济学家从两个不同群组录取了400多名受试者：第一组生于独生子女政策启动前的1975-1978年，第二组生于1980年后。第一组的被调查者中，半数以上有兄弟姐妹，而所谓的“小皇帝”一组则仅有15%的人有兄弟姐妹。

受试者通过参与设计好的考试和游戏来测量各种性格特征，包括外向程度、社会融洽性和消极性。两组受试人之间的对比很惊人。在一个分割财产的游戏里，小皇帝组没有另一组那么慷慨。在另一个测验受试者对他人信赖和依靠程度的游戏中，小皇帝们更不愿相信别人，也不如另一组受试者那么值得信赖。在测试冒险能力的游戏中，他们也更倾向于选择风险低的赌注，而不是高风险高收益的。

小皇帝们也更悲观。当被问及第二天的晴天概率时，小皇帝一组更倾向于认为第二天会阴天。在另一个测试受试者竞争意愿的游戏里，小皇帝组在面对竞争时更容易退缩。

虽然421人的样本容量相对较小，但是，这一研究在其他对小皇帝群体的研究中依然脱颖而出，因为它并不是基于行为调查，也没有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相反，它使用了相对较新的博弈理论的概念来观察行为模式的不同。由于卡梅隆等人所比较的不同受试组的年龄差只有几岁，从而保持了社会经济条件的相对稳定，因此，研究结果能够表明，小皇帝群体的行为差异是由家庭结构造成的。

在发布研究结果时，卡梅隆承认，“将一个群体描绘为较不愿信任和较神经质，这种如此负面的色彩，确实让我感到不安。”

中国小皇帝们虽然自己认为自己不幸运、压力大，但这消息可能会让其他人很吃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的一代。与他们的祖父辈和父辈不同，他们不需经受文革的动荡和1950年代的大饥荒。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的三十年里，人们的理想已经从简单的“三圆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蜕变成了私有房产、汽车和大学文凭。与父辈们不同，小皇帝们的世界里只有飞速的经济增长，而对其他一切都没有经历过。

我跟刘和他的母亲永敏在公寓里同住了两日。凭着道德模范的奖项，刘霆在这套免房租的两卧室公寓中可以住到大学毕业。小区配有保安和景观，有一条漂亮的人造小溪，梅树上花开正盛。我们翻看着老照片：他的母亲风华正茂，朱唇轻启，一脸天真无邪；他远走高飞的父亲当年穿着显眼的格子运动上衣，留着保守版的爆炸头；还有很多刘霆上学时的照片。每一年，男孩子的数量都比女孩子多很多。孩子们穿着肥大的运动制服，几乎男女莫辨。翻到一张刘霆穿着皇帝黄袍的照片时，我们停了下来。“我从来都不是小皇帝，”刘霆强调道。

永敏虚弱的病体让刘霆对她呵护备至。刘霆记得他十岁的时候，他记得曾和母亲有过一场极少有的争执，具体的原因他已经不再记得。永敏当时说：“我养了你十年，你敢不听我的话？”刘霆顶嘴说：“父母养孩子十年很正常。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你。”

### 三

2005年，学者钟玫对一系列独生子女书写的信件进行了研究。这些信件都是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陈丹燕收到的来信，其后被她出版成书，名为《独生子女宣言》。钟玫分析了这些信件，将其分为不同类别，揭示出独生子女大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压力中、受到父母过度的关爱并且十分孤独。“这些书信整体上都有一种忧郁的基调。压力和焦虑是一个主题。”钟玫说道。

孩子们对父母为他们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表示尴尬和愧疚。一位父亲为了给孩子筹集大学学费，提出要去卖血。另一对父母每个周末都会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孩子回家，接下来一周都只吃剩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描述说，自己的母亲每天上班之前都会穿过整座城市到他的宿舍去，只为给他带早餐和整理床铺。“没过多久，我的室友都很不乐意，因为他们不习惯早上起床的时候房间里有个女人。还有，我的室友们，甚至后来我所有的同学们都开始叫我‘宝贝儿——’，而且还像我妈叫我的时候一样，把后面的音拖得很长。”

这样的牺牲背后伴随着父母巨大的期待。钟玫说，很多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因文革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教育因此中断。“他们觉得自己的梦想破碎了，

而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就是通过自己唯一的孩子。因此，他们有一种紧迫感，觉得一定要督促孩子走向成功，而且各方面都要成功。”

一个孩子写到：“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自我意识都很强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必须承担父母所有的目标和他们越来越大的梦想。与上一代人相比，我们没有独立的未来，而只能重新走上父母没走完的路；我们为了完成他们的梦想而生存和奋斗。”小皇帝一代将自己称为“三明治一代”，还有“苦逼”。

“苦逼”是用来自嘲的网络用语。年轻人用它来表示英语中“糟透了”的意思：“我要赶期末论文，我的日子太苦逼了。”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说，小皇帝这一代之所以觉得苦逼，是因为跟70后和90后比起来，他们没能充分享受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却要承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

私营经济扩张、房地产市场私有化的时候，他们年龄还太小，没有从中获益；长大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中国主要房地产市场飞涨的房价。

他们还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扩招导致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数量激增，失业率极高。在1977年文革结束时，中国只有27万大学毕业生。而现在，每年就有700万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

百度上有一段典型的苦逼悲叹：“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能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虽然独生子女们的生活比以前任何一代都要好，但是他们却要在市场经济下进行残酷的竞争。可他们的期待都是由父母养成的，在父母的世界里，一毕业就有铁饭碗。我怀疑，这种期待上的分歧，正是独生子女们压抑不安的根源。

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流动性的限制越来越多。90年代末期，当我刚开始撰写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时，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成为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英雄：只要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就都能出人头地。家电零售业亿万富翁黄光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从农民一路奋斗成中国首富。

十年之后，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黄光裕因为受贿和内幕交易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目前还在监狱服刑。其他一些新晋的亿万富豪也因跟错了政治靠山而锒铛入狱。贫富差距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一度多年都不再公布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13年，中国开始再度公布基尼系数，但是官方的数据却遭到诸多质疑。）仅仅过了十年，那种机遇无限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就已不复存在。

独生子女一代中，对此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那些未能幸运地出生在大城市的孩子。毕业之后，他们被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吸引，却因没有父母的房子和大城市的人脉而无法扎根。他们不得不暂住在狭窄的出租屋里，连自来水或者供暖设施都没有。200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廉思创造了“蚁族”这一说法，描述这些加班又低薪的毕业生们。

但是，在光谱的另一端，雇主们也在抱怨小皇帝们成长过程中期望值过高，因此不是好的员工。在招聘广告中，雇主们明确表示，更倾向于雇佣非独生子女。中国铁路建设局是全国第二大的国有建设企业，就在招聘中声明：“农村户口的非独生子女大学毕业生优先”。

南京金陵晚报曾经援引一位人力资源经理的话说：“我们不要两种人，有钱的和独生子女”。河南一家地质勘查公司的员工说，他们雇佣的独生子女很容易抱怨工作太艰苦，随即跳槽。而且，独生子女的父母对这种工作的出差需求也通常更容易反对。

另一个与小皇帝一代有关，且专门用来指代他们当中男性的一个词，叫做屌丝——一个用男性生殖器代指“失败者”的词。华尔街日报记者李肇华指出，这一用语被低薪的办公室上班族“用来自嘲其暗淡无光的前途”。屌丝一词在全社会不胫而走，以至于互联网门户搜狐网播出了一部叫做《屌丝男士》的在线喜剧节目。自2012年播出后，该剧的点击总量已经超过15亿次。共产党对这一称谓的愈发流行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警觉，便在旗帜性刊物《人民日报》上最近的社论中呼吁人们摒弃这个词。这篇名为《自我矮化 可以休矣》的文章指出：“它对青年精神的破坏力不可不察”。

最终，我并未给华尔街日报撰写刘霆的故事。谦和忍耐的故事达不到头版消息要求的戏剧效果，而被其他新闻所取代。然而，2008年，我又在鸟巢开幕式上遇见了刘霆。他戴着全国道德模范的奖牌，四处拍照。“凤姐，见到你真好！”他笑容满面。我们一起合了影。在当晚出现的所有建设国家的象征中，刘霆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了，我暗暗想到。

“你应该代表中国上场，”我开玩笑说。

他咯咯地笑起来：“我觉得国家还没准备好。”

#### 四

奥运会结束一年后，我离开北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生活。在那儿，我遇见了游戏开发者陈星汉。三十出头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在游戏业界，他是个传奇。

陈凭借其创作的颇有深意且设计繁美的游戏而成名。他的游戏一改典型网络游戏打打杀杀的套路，更像电影，意在激起复杂的情感，如怀旧与敬畏，而不是简单地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常有人把陈和日本漫画师宫崎骏相比。他设计的一款游戏在史密森尼博物馆永久性展出，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将他提名为全世界最顶尖的青年革新者之一。



尽管少年得志，身为独生子女的陈星汉还是说，他为了达到父母期望一直都承受着压力。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儿女们各有分工，每人角色不同。“作为独生子女，我不得不承担所有的角色。我不能失败，因为我家就靠我了。”

陈的父亲是公务员，虽然出身贫寒，但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考入了中国象牙塔的塔尖——北京大学。他第一次带孩子去北京旅游的时候，没有去像长城这样的热门观光景点，而是去了北大和清华。这就好比带一个美国孩子去看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陈星汉回忆说：“我们只去了这两个地方。”

陈14岁那年，父亲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计算机革命，于是给孩子买了一台电脑。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这是一大笔投资，等同于给一个初学小提琴的孩子买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当时没人有电脑。”陈说道。他的父母希望鼓励他发展对电脑程序的兴趣，但是十几岁的陈当时只想打电脑游戏。

对陈来说，打游戏是一个逃避学习生活的良方。在他口中，读书就像学术版的《饥饿游戏》一样激烈。当时，他不仅进了上海最好的高中，而且还进了天才班。他说，上海市“每一个冠军和奖牌得主”都在那个班里。每个学期，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都会被淘汰，送到普通班里。他们被视为“失败者”。每到学期末，陈星汉就会仔细地计算他的同学考了多少分，计算自己离被淘汰有多远，是不是安全。他几乎没有朋友。

他的父母希望引导他走上更安全、更有前景的事业道路，为像微软之类的著名公司工作。但是，陈却渴望能够创作出如仙剑奇侠传一样的游戏——这是第一个让他流泪的游戏。“没人会想到电子游戏还能让你学会关心，能谈论牺牲与爱。”但是他说，跟父母说他想成为游戏设计者，就“好像告诉他们我要当色情片导演”一样。

毕业后，陈星汉到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他是全校第一批就读于游戏设计专业的学生之一。在一场学生竞赛中，他设计了一款名为《云》的游戏，其中，玩家可以模拟一个生病住院的孩子，正如当年患有哮喘而长期卧床的他自己一样，望着窗外，幻想着插翅飞翔。这款游戏引来人们争相下载，以至于南加州大学的网站都瘫痪了，还上了当地的新闻。

“大多数游戏都是关于很原始的情绪，比如暴力和竞争，”他说。成长过程中，他之所以喜欢这些游戏，是因为在他面对父母和学业的压力感到无助的时候，游戏给了他力量。“但是现在我成熟了，想要一些更益智、也更有生活气息的内容。”

陈后来在加州圣莫尼卡成立了一个小工作室，并和索尼签订了三款游戏的发行协议。他用几年时间设计了《风之旅人》，游戏描述了一个无名旅人独自穿越荒芜风景的朝圣之旅。索尼执行官以为该游戏的设计只需一年时间，而完美主义的陈星汉花了整整三年。期间，他的公司资金用完了。陈不得不大幅裁员，而留下来的员工的薪水也被迫减半。《风之旅人》最终名利双收，在游戏业界的奥斯卡——D. I. C. E游戏峰会上摘得了诸多奖项，也成为了索尼游戏站销量最好的游戏之一。

即便如此，陈依然觉得他违背主流的选择让父母担忧。和某些同龄人不同，陈星汉没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市场分到一杯羹，而是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娱乐世界。

“对于亚洲孩子来说，只有三种职业选择：律师、医生和工程师，”陈星汉用手在空中逐个打着勾，讥讽地说道。不过，这种狭隘的观念在中国情有可原。在中国，“你的养老保险就是孩子。当你是独生子的时候，父母就想确保他们的投资能够有稳定的回报。”陈说。

几年后，陈的母亲在上海接受了青光眼治疗手术。手术没有成功，所以陈把母亲带到了美国接受矫正治疗。陈母的医疗保险不覆盖在国外的医疗，所以手术最终花去了陈一半的积蓄。

2014年年底，陈星汉结婚了。他的新娘生在中国，但是长在美国夏威夷长大，而且也是独生子女。虽然对独生子女所要承受的负担也有顾虑，但是陈星汉夫妇还是很可能成为第二代独生子女家庭。“我觉得我不敢生两个孩子，我连父母都还照顾不来。”陈星汉说。

第一次见到陈星汉的时候，我还在南加州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教课，课程主要是为研究生在亚洲的暑期工作做准备。尽管课程名为“全球新闻报道”，但是半数的学生都是公共关系专业的硕士生。

开始上课之前，我会让每个人都准备一个有关自己事业目标的演讲：“五年后，我希望能够从事……”我的中国学生——大都是女生且学习公共关系专业——回答都如出一辙：五年之后，她们希望成为企业内部的公关人员。这些近乎清一色的答案让我感到迷惑。为什么一定是企业内部公关呢？为什么不是在代理公司？为什么不自己创业？我习惯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无限的自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瓶颈，锐气还未被苛刻的上司、不可能完成的截止日期和如山的房贷磨蚀。

她们告诉我说：五年之内，她们很可能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公司内部的公关上班时间和工作常规都更稳定，会更容易些。

这些回答让我开始思索关于小皇帝的成见是否有一定道理。我并不相信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与其他时代的人相比更加被宠坏，但我的确怀疑，过高的期望让他们不堪重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是独生子女，还因为中国的飞速变革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在本该大胆尝试新事物的年龄，视野却过早地狭窄化。普遍认为与独生子女有关的一些问题，在这一代人身上似乎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单纯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孩子，更因为他们是唯一要面对中国特有的期待和机制的孩子。

首先是高考，中国所有青少年最痛苦、最摧残灵魂的经历。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恢复了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延续了自宋唐时期就已存在的悠久的考试传统（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最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虽然科举并非高考，但是这一悠久的考试传统让中国人坚信，考试是贤才晋身的必由之路。

考试在中国文化里扎根深厚，以至于在云南省，有一道叫过桥米线的当地小吃相传就是专门为备考的士子准备的。故事说，古时有一位妻子，常常过桥给深夜苦读的丈夫送面食作夜宵。但是，每次还未过桥，面就已经凉了。妻子因此想出了一种保温的方法：在面上封一层隔热的油。不管故事是真是假，中国人对于考试的痴迷都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再想想英国人对世界饮食的贡献——三明治，竟是为了让赌博不受中断而发明的。

作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阶层流动形式——以考试定成败，高考让所有的中国学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一考定终生。

我在中国生活时，总会知道高考季的到来。同事们会请两周甚至一个月的假，只为了在家帮助孩子们渡过这一关。路上的车少了。考点周围的大型建筑工地停工了。北京充满灰霾的天空也神奇地变得湛蓝。我曾经听说有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在高考期间因为痛经而影响注意力，甚至会给孩子吃短效避孕药。家长会替孩子把牙膏都挤到牙刷上，只为能帮孩子节省几秒钟宝贵的学习时间。

在高考前的最后一两年，我的中国学生每天要在学校呆上十二个小时，周末要补课，每天平均只睡四到六个小时。中国的独生子女也许不需要和自己的亲兄妹竞争，但是与同龄人的竞争却更加激烈。

虽然中国年轻人和大学生的自杀率位居日本、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但是考试压力的确会造成生命的殒灭。2014年，中国政府的一项报告研究了79起学生自杀的案例，得出结论：90%以上的自杀是因为中国应试教育体制的压力所致。这些自杀案件中63%发生在二月到七月，正是高考和其他重要考试举行的时间。

我那些说希望能在企业内部做公关的学生，并不一定是懒惰或者胸无大志，只是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可供他们探索人生的时间与美国同龄人相比少了太多。

就拿约会来说吧。青少年时期，孩子们一直处在高考的巨大压力之下，与异性交往这种让人分神的事情是不被鼓励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之间不会有撩拨和失恋。2007年，中国南方一所学校竟然禁止男女生互相拉手。南方小城宜州的重点中学发布规定，男生和女生“须在教室、走廊等灯光明亮的地方交谈”，而且“无其他人在场时，不能进行一对一交谈。”

在中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20岁（男性22岁）。在此之后，女性约有五至七年的时间寻找伴侣，之后，就会被公认为年龄太大嫁不出去——这个信息见于全国妇联（共产党设立的保护妇女权益的组织）实际发布的指南。一旦达到这一年龄，女性就会难觅婆家，背上情何以堪的“剩女”之名。要在短短几年里做出一个影响终生选择，难怪中国现在的离婚率已经高达20%，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颇受欢迎的博客撰写人韩寒，也是他那一代人的麦田守望者，这样写道：“中国的情况是，很多家长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甚至在读大学了还有很多家长反对恋爱，

但等到大学一毕业,所有家长都希望马上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而且最好有一套房子的人和自己儿女恋爱,而且要结婚。想的很美啊。”

## 五

2012年,陈汉斌卖掉了父母送给他的在北京的公寓,用卖房的钱买了两辆房车,开始环游世界。三年后,他还在路上,像现实版的杰克·凯鲁亚克,用短片和博客记录着自己的旅途。

陈汉斌的历险包括:在泰国学拳击,在澳洲潜水,在伊拉克摘西瓜,在印度抱着眼镜蛇共舞。他的名为“永不回头”的驴友团,在古巴遗失了护照,在挪威险些被雪崩埋葬,在智利地震中九死一生。最初的团队成员后来渐渐离去,但又不断有新的梦想者加入。

当汉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宣布他的计划时,中国网民们的反应都在意料之中:打气、渴望,还有艳羡。但是,很多评论者对他的“不孝”之举以及不顾对父母责任的行为颇有微词。一位网民说:“如果你有钱照顾父母,还能剩下钱来追求自己的梦想,那固然很好,我全力支持。但如果你自私地卖掉家人的房子,伤害父母的感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一个三十几岁的美国年轻人决定要做相同的事,我无法想象周围的人会是这种反应。

我在洛杉矶见到了汉斌,当时他刚刚结束了一段从迈阿密开始的跨国行程。他成功说服了对他的旅程始终不甚热情的父母,跟他在路上同行一个月。结果,父亲在环球影城门口的停车场崩溃了。汉斌说,父亲哭着祈求他跟自己回家。“他说,‘你的生活太危险了,求你别再这样了行吗?’”

汉斌做不到。他引用田纳西·威廉斯的“即使身处牢笼,内心依然狂野”,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但中国尤其是个大牢笼。每个人都走同一条路,每个人都在比较着你的房子有多昂贵、你上了什么学校,每个人都想着如何达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我想定义我自己的生活。”

是汉斌太自私,还是他的父母对自己唯一的孩子投入太多呢?

2012年,人民大学学者杜本峰创造了“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这一说法。他写道:“独生子女家庭有严重的结构缺陷: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受伤或遭遇事故都意味着灾难,甚至会导致家庭破碎,因此,这类家庭格外脆弱。”(杜本峰对家庭结构脆弱的定义与西方研究形成了对比,在西方研究中,家庭脆弱性通常是通过单亲家庭和未婚家庭来体现的。在中国,这些不同形式的家庭很少见,一部分就是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

杜说,两个独生子女在婚姻中的结合加剧了中国家庭的脆弱性。同时,独生子女们为了让父母满意,也承受了诸多压力,在就业流动性、事业选择和移居等方面都作出了牺牲。为改善这种情况,杜建议,应该采取包括提高政府失独补偿金和

设置独生子女意外身故保险在内的一些措施。（目前为止，还未出现任何此种性质的商业保险。）

这些想法都很合理。但是，除了建议实施更严格的交通法规、加强学校安全标准以保护儿童，杜还建议禁止暴力性网络游戏“伤害儿童身心健康”，并呼吁一切政府机构都应采取措施，“进行有利于独生子女安全的活动”。杜似乎支持对独生子女更加溺爱，令人吃惊。

## 六

2013年，我对刘霆的近况做了回访。他还住在家里，还留在同一个小城。在我认识的中国人里，这种一成不变的稳定很少见。当然，他的生活有些小的变化：他已经不再生活在名人的光环里了。原先的免费公寓没有了；他和母亲搬到租金低廉的住所——一间不到50平方的公寓里。他们在公寓里做了许多小间隔，以充分利用空间，看起来就像一个错综复杂的上下铺系统。

刘霆2009年就大学毕业了。他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资微薄的工作。过了几年，又在杭州找到了一个平面设计的工作，但是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他说，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他入不敷出，而且每周末频繁地回家看望母亲也太耗费时间。当时他靠着积蓄生活，正在写自传。

我发现他没什么变化，像中国版的道林·格雷。他依然很瘦，穿着松垮的大T恤和牛仔裤，还是留着长长的指甲，还是一样温和腼腆。母亲永敏看起来则比五年前年轻了些。脸上的皱纹少了，头发有了光泽，还剪了流行的波波头。她正满心想着要仿照韩国的设计做当时流行的防雾霾口罩。她说，这些东西在中国雾霾弥漫的城市越来越受欢迎了。

相比之下，刘霆却显得漂浮无着。在很多方面，他的情况似乎证实了我的推测：在为母亲尽孝的重压之下，他无法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他狭窄的世界最终给了他一种无奈的绝望。

当刘霆告诉我他参加了浙江电视台的一档真人秀节目的试镜时，我的怀疑加深了。这一叫做《中国梦》的节目借镜于BBC的一档叫做《就在今夜》的节目。在这档节目里，普通人会被分配一位导师，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创业或出演一部伦敦西区的电影。靠着此前的名气，刘霆获得了一个试镜的机会。

在试镜时，他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母亲》，那首专门为他创作的歌。但是他没有入选。“我告诉他们，我的梦想是和母亲快乐而平静地生活，也许会写一本书，”他说，“但他们说我的梦想不够大。”

刘霆送我到汽车站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匡威样式的球鞋，上面印着“Bu Xiang”的字样。这是个很便宜的品牌，在农村的年轻人和工厂工人中很受欢迎。我不确定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可能是积极向上的意思，但是拼音“Bu Xiang”也

可能是“不想”的意思。我看着他走远，他的鞋子随着步子起起落落。不想，不想，不想。

我有些伤感。

不过我错了。2014年，刘霆写完了他的书《我们会好的》。接下来，他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他是跨性别。

在他被荣誉包围，戴着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这些年里，刘霆一直在为这个秘密而挣扎。他在南方周末这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发布了一组出柜的跨页照片，照片惊人地私密：刘霆化着妆、试穿胸罩、思考自己要进男厕还是女厕。

“大家一直告诉我，不要女里女气的，要有担当，要对得起我道德模范的称号，”他说，“但是我内心深处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被困在了男性的身体里。”

在我一直替他担心他的世界太狭小的时候，他却一直在小心地维护着一个要脱胎换骨的梦想。

刘母起初悲痛欲绝。她抱孙子的前景似乎更加渺茫了。“人们都希望我能生个孩子，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心里很矛盾。”刘霆说。

最终，他慢慢相信：“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是对父母的孝顺。我想，孝顺的定义应该改一改了。”

很快，中国最著名的一位小皇帝就要化身成小公主了。

## 六 欢迎来到玩偶之家

乃生男子，

载寝之床。

载衣之裳，

载弄之璋。

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

载弄之瓦。

——《诗经》

中国即将有一大批性饥渴的年轻男性。

——保罗·埃尔利希

—

2009年，我正翻着报纸想找个可报道的题材，一则名为“中国中部出现大量逃跑新娘”的新闻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条新闻只是个小消息，讲的是陕西省一个叫新和平的小村子里出现大批逃跑新娘的事情。这些女人在婚礼结束不久后就弃夫而去，留下那些付了大量彩礼、如今却已破产的新郎们。这让我想起了前一年，刘在火车上跟我说的买新娘的故事。

尽管在中国住了有些年头，“彩礼”这个词我也还是头一次听说。彩礼，就是男方给女方的一种嫁妆的回礼。在中国农村，婚姻双方通常都会互赠聘金和聘礼：女方陪嫁妆，男方给彩礼。通常男方赠的彩礼价值要高一些，这反映了农村女性婚后作为厨师、床伴以及育儿者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交换的价值都比较低，也就是一套衣服或者几个搪瓷脸盆。富有些的家庭送的礼可能档次高一些，会送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或者一套红木家具。但是从 2001 年起，随着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步入适婚年龄，彩礼的价值便急剧上涨。

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前，中国就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但在此种文化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无疑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男女比例失调最严重的国家。到 2020 年，中国男性总体超出女性总体的人口数将有 3000 万至 4000 万。中国单身男性的数量将等同或超过加拿大或沙特阿拉伯的人口总数。十年之后，中国每四个男性中就会有一个是低技能单身汉。

其他文化中也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这么严重。迫于生育数量的限制，许多中国夫妇不惜弑婴、遗弃女婴，或者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性别选择性堕胎，以确保至少有一个男孩能够延续家族香火。印度也有重男轻女的现象，但没有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男女出生比例为 108:100。中国转为实施二胎政策之际，男女出生比例为 119:100，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全球平均男女出生比例为 105:100，这种自然偏差被视为是大自然在弥补高风险的男性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男孩更可能早夭。）

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像中国这么多的单身汉。除非中国对大量移民敞开大门（但这不太可能发生），否则这些男性将无法找到伴侣。他们被称为“光棍”，也就是不会开枝散叶的人。

新和平似乎有可能是个“光棍村”。村子位于陕西省，而陕西据说是中国性别比例最不平衡的十大省份之一。在中国地图上，新和平村几乎位于整个国家的正中间，地理上位居中央，但文化上却处于边缘。离它最近的主要城市汉中，远在汉朝时曾因被誉为纸的发源地而盛极一时。但自那以后，汉中这个拥有 300 万人口的城市便逐渐没落，甚至至今都没有从首都北京直飞的航班。

我很好奇“光棍村”是什么样的。我仿佛看到一群群欲火中烧、郁郁寡欢的男性流连在村里的广场上和网吧里，欲望和暴力就如北京被雾霾污染的天空一样，一望便知。



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带着办公室里唯一一位男研究员一起去新和平。事实证明这种防备是多此一举，这种防备是多此一举并没有什么必要。新和平村和中国大多数村子一样，到处都是老年妇女和孩子。所有介于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包括光棍，都外出到城市里赚钱去了。村里的稻田太过狭小，除了务农自给外，实在无事可做。由于男性可以继承家里的土地，所以很多人都保留了农村户籍。而新和平村的年轻女性没什么可继承的，则选择尽早离开村子，逃往繁华城市和大工厂。几乎没有人再回来扎根。

在新和平村，一个被骗新郎的母亲淑芬将我迎进了家中。她的家很舒服，有着传统的坡斜屋顶，大木门敞着透光，也随时欢迎偶尔来串门的邻居。唯一格格不入的就是一辆停在客厅的鲜红色摩托车，车把手上低垂着红色礼花。摩托车原本是给逃跑新娘的礼物。

淑芬一边向我展示婚礼照片，一边讲述了她儿子婚姻夭折的伤心史。她儿子周品十几岁时就离开村子去中国南方的工厂打工。由于流水线上工作时间长，管理又严格，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结识女性。年复一年，周都会风雨无阻地赶回家过春节，但得到的却是父母越来越焦灼的质问。淑芬说，在新和平村，有个快25岁还单身的儿子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淑芬家的一个朋友告诉她说，自己的侄子娶了个四川姑娘。还说这个新娘有三个四川朋友正好过来看她，她们可能有结婚的意向。

在昔日的新和平村，与外乡人结婚会被村里闭塞保守的村民瞧不起。为什么？因为四川人讲的方言都和当地人不一样，淑芬说道。然而在一万四千居民的新和平村，登记在册的单身汉就有30个，而适婚年龄的女性数量则为零。显然，他们必须要适应时代的变迁。淑芬于是自己做主安排了一个相亲会，把儿子叫回了家。

周的追求过程迅速而务实。在与三个姑娘第一次见面后，他就向最年轻漂亮的一位求婚了。女孩同意了，条件是周要给出三万多人民币的彩礼，这相当于周家务农十年的收入。

三天后，他们登记结婚了。他们在摄影棚里拍摄婚纱照，照片中新娘的双颊被处理成了与婚纱相配的象牙白色。在另一张照片中，夫妻俩穿着传统的红色唐装和裙褂，刺绣镶金，格外华美，新娘摆出要点鞭炮的姿势，而周双手捂耳，扮着鬼脸。

在一周后的婚宴上，淑芬正式将彩礼交给了一个她以为是新娘堂姐的女人，彩礼钱中有一半都是跟亲戚借来的。

结婚这件事颇有吸引力。不久，两个邻居都找到这位新娘，让她帮忙给他们的儿子介绍女朋友。很快，另外两场婚礼也接连举办，新郎家付的彩礼钱和周家差不多。

一个月之内，所有的新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像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情节。我仿佛看到那几个女人在稻田里狂奔，婚衣提到膝盖上，面纱在风中荡起涟漪。但事实却没有那么如诗如画。周的妻子假装突然拉肚子，从屋外的旱厕爬出去逃跑了。

我来到新和平村时已是四个月之后，大多数被骗的新郎都已离开村子去别处找工作了。只有周还留在村里。

原来，这场讲求实际的速配婚姻竟让周品动了真心。他说，他早就怀疑新娘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是个涉世未深的农村姑娘。他提到自己在工厂的工作时，女孩显出懂不少，还会问一些问题让他怀疑她可能在城市里工作过。即便如此，周还是希望她能适应新和平村那种平静的节奏。女孩看起来很温柔，对她在细小处得到的关照十分感激。周本来还打算在离家近点的地方找工作，这样大宴亲朋时就可以经常回家。他还给她买了那辆摩托车，这样她就可以骑着摩托去汉中，调剂一下无聊的农村生活。他们还打算坐五个小时的长途车去西安看兵马俑。

在我看来，新和平村能吸引并留住年轻女性的地方寥寥无几。这里有一家小商店，是个一站式卖场，卖的都是洗衣粉和杀虫剂之类的东西。（杀虫剂是农村自杀案的常用药物，《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罗森塔尔（Elisabeth Rosenthal）将它称为“家家洗手间橱子里都有的中国式安定药”）农耕仍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田地太小，无法用机器耕作，因此大量农活依然是以百年前的古老耕作方式

完成的。许多住宅没有自来水。在新和平村，已婚的年轻女性不仅要下地辛苦劳作，还要在家照顾孩子和公婆，而丈夫们却可以连续数月在外面闯荡。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迄 21 世纪最初十年的中段，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而其中自杀率最高的就是年轻农村妇女。近年随着农村女性数量的减少，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现在是自杀的农村男性越来越多了。

周的家人怕他绝望轻生，父母不准他离开村子。淑芬说，其实他们所有人都很绝望，都在担心如何偿还因为彩礼钱而欠下的沉重债务。新和平村的其他家庭情况更糟。其中一个被骗新郎还有个弟弟，也是单身，家里人都不知如何能给他凑够彩礼钱。他父亲抱怨说：“生的是女儿多好。”

我最初被新和平村逃跑新娘的故事吸引，是因为这个故事又伤惨又滑稽。我喜欢的是，这一小拨女性以她们的方式打击了中国的父权体系。我自己是女性，又是个被父母轻视的女儿，新和平村和其他无数小村子遇到这样的问题，难免让我觉得仿佛是罪有应得，千百年来对女性的全面歧视，终于付出了代价。

但周的风度让我感动。即使这段失败的婚姻让他负债累累，法律上也处境暧昧，但他仍不愿责怪妻子。他说，他并不怨恨她的不辞而别。“她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实际上，她逃跑后和他联系过几次——他说她给他打过电话。“她说她很抱歉，说自己是不得已的。”

并非所有的中国单身男性在面对相同的境遇时都能像周品一样豁达，但他们却都因为别人的错误而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黯淡的未来。

## 二

关于年轻男性数量过多将如何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已有不少的理论。不可否认，大量年轻男性的存在为社会分歧和暴力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阿拉伯之春”与印度攀升的强奸率就都与此相关。那么，中国面对其遥居世界之首的人口性别鸿沟，又将何去何从？

2004年，学者瓦莱丽·哈得逊（Valerie Hudson）与安德烈·邓波儿（Andrea den Boer）在其合著的《光棍》一书中提出，中国数量庞大的单身男性人口可能会使之变得更好战。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时期出现了男性人口过剩，其中在清朝就发生过两次叛乱，地点都是在单身男性数量极多的地区。一场是185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土匪叛乱，史称“捻军起义”，当时，由于饥荒和弑婴，男女比例上升至大约129:100。哈得逊与邓波儿指出，当时每四个男性中就有一个娶不到老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专家张翼的说法，目前中国的一些省份男性比女性多26%至38%。）他们还指出，大量单身男性人口本身未必会引发暴力现象。“仅有干柴并不足以引起火灾，但当火星开始飞舞，这些干柴就能变为引火物，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哈得逊和邓波儿的理论虽然有趣，但很多社会科学家认为这些理论只是臆测，不一定具有预见性。十年后，随着中国在与邻国的领土纷争中越来越强势和自信，他们的理论才渐渐得到更多的认可。2012年，中国与日本就几个贫瘠而无人居住的岛屿（日本人称之为尖阁列岛，中国人称之为钓鱼岛）争吵不休，程度如此激烈，以至于《经济学人》杂志都在其封面故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亚洲真的会因岛屿争端而开战吗？”

2014年，《光棍》一书出版十年后，哈得逊和邓波儿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外交辞令中开始悄然出现一种“男性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这是政府故意煽动起来的，以确保“年轻光棍”始终效忠于国家。

至少就国内而言，男性越多、冲突越多的说法有一定道理。2008年，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性别比例每增加1%，暴力及财产犯罪率就会上升5%至6%。研究者估计，在所有的新增犯罪中，有三分之一都是由中国青年成年人口中“不断增加的男性”造成的。浙江大学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单身男性与已婚男性相比更加自卑，且更容易抑郁、更具有攻击性。

虽然与中东或印度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并未受到同样程度的公开侵犯和骚扰，但她们却要承受大量的家庭暴力。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指出，中国每四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会遭受家庭暴力，且她们几乎不受法律保护。2011年，中国某著名企业家的美籍妻子李金向警方提交了一份关于丈夫殴打她的报告，但最终无

果。在警方拒绝承认丈夫对她的殴打构成犯罪后，李金开始在微博上张贴自己瘀伤的照片，引来媒体沸议。之后，法院以家庭暴力为由裁定准予其离婚。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李金也因此成为了女权的发声支持者。中国政府晚至2014年才起草了第一部针对家庭暴力的国家法。

从经济上看，中国性别比例失衡的影响似乎好坏参半。经济学家魏尚进和张晓波认为，性别比例失衡可能会引发更多创业行为，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他们发现，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区GDP增长越快，且私有企业的发展势头也越强劲。不过，魏和张也认为，这种失衡也会导致过度储蓄，因为有儿子的父母们为了提高孩子在婚姻市场中的身价会大量储存资金。据研究人员计算，过去25年里中国上升的储蓄总额中，有一半都可以归因于性别比例的上升。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光棍问题将使北京很难通过刺激内需来实现其出口型经济的转型。魏和张的理论并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储蓄率高有很多种解释），但是他们的确进一步证实：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方面造成了将会抑制未来发展的人口结构问题。

2014年，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储蓄过度、犯罪率上升。遗憾的是，试图重新平衡性别比例的政策要几十年才能见效，而且会减缓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不过，该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犯罪率下降所带来的收益将能够弥补经济增长减缓所带来的损失。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确定中国过剩的男性人口是否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或使国家更加好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在后代婚姻中投入极大的社会里，大量的剩余男性极大地加剧了婚姻焦虑感。

2009年，高额彩礼对于中国很多城市居民来说仍是个陌生的概念。虽然彩礼在农村十分盛行，但是“在中国城镇却仍然很少见”，加拿大学者斯万·安德森写道。不到六年后，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公布了一张中国各地彩礼价格的地图。根据该集团的数据，彩礼价格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和天津，分别是人民币十万元和六万元。这些彩礼价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如意郎君还应该有自己的房产。

万科的计算方法受到了很多批评。一些人说这一调查对彩礼的价值估计过低——为什么在中国第二大城市北京，彩礼只要一万块人民币和两瓶高度茅台，而在高速发展的重庆则根本就不用付彩礼？尽管如此，一个令人不快的观念却几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彩礼这一曾经仅限于农村的古怪习俗，如今已是全国的惯例。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婚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乎金钱、估值与投资。

西方人可能很难理解，婚姻是如何成为这样一种赤裸的经济交易的。但是在中国，父母肯定会参与孩子的婚姻。婚姻不仅仅是新郎和新娘的结合，双方所交出的不仅是自己，还可能是双方父母共同积攒下的一切。

由于郎君众多而闺女有限，父母们就会帮忙出钱给儿子买房子，提高他们的身价。这叫“筑巢引凤”。而这其中身价增长最大赚钱赚得最多的莫过于房地产经纪（一些经济学家估计，性别比例失衡导致中国的房价在 2003 年至 2009 年间上涨了 30% 至 48%）。中国飞速上涨的房价也必然创造了一大群房奴，这些可怜的人们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受害者一样，背负着天价的债务。

2013 年，我认识了一个叫田秦耿的房奴。田当时 25 岁，是个性情温和的机床操作员。他住在宁海，一个离上海几小时车程的宜人小城。田在一个工厂里上班，每个月赚 2500 块人民币。即便以宁海的标准来看（人均年收入约合人民币 1.9 万元），这工资也不算多。为了提高儿子的身价，他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积蓄——一共 30 万人民币，然后又向亲戚另外借了 20 万，才帮他在宁海市的中心区买了一套两卧室卧室一厅的公寓。

每个月，田和他父母都要花掉总收入的 80% 来偿还房贷。这让他们在生活中不得不处处都精打细算。暖气？太贵了。家具？能免则免。蔬菜？老家的田地里能种什么就吃什么。他们唯一允许自己花钱的地方就是买彩票。

田邀请我去他的公寓看看。楼房本身还很新，有个池塘，精心修剪的矮树，还有仿照桂林著名的喀斯特地貌设计的石林。当我们穿过院子时，我听到了中产阶级最具代表性的声音：电子游戏的哔哔声和弹得不能入耳的约翰·汤普森钢琴曲。

虽然田秦耿为了引来凤凰，把自己的未来都赌在了筑巢上，但这个巢穴却空空如也，让人心痛。除了一些固定的配置是从原来的房主处（一对要离婚的雅皮士夫妇）低价买来的外，房子里陈设简陋，阴冷萧条。他母亲为了让房子看起来更温馨些，在房里放了些十字绣图画和手工枕头。她还在田的卧室里放了一只一米高的毛绒玩具兔子和盆栽竹子。只是兔子外面的塑料包装膜上已满是灰尘，竹子也渐渐枯萎，因为田从来想不起给它浇水。

田虽然已经有了爱巢，但在寻找伴侣这件事上却并不怎么上心。问题是，他不是很清楚要如何着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宁海不像北京或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一样有健身房、夜总会和丰富的单身生活。人们仍然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去河边洗衣服，追求伴侣也仍然是按照旧时的方式，靠熟人介绍。占卜算八字仍然很重要。田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到了女朋友，却为避开马年而推迟了婚礼。田解释说，算命先生认为马年是动荡之年，不宜结婚，建议他们等到更宜嫁娶的羊年。当然，结婚后小两口还必须注意不能太快怀孕，因为人们认为羊宝宝太过消极被动，日后恐怕难以成功。

这种现代与传统的碰撞让田有些招架不住。他宁愿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打电子游戏。他的亲戚们倚熟卖熟地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字：宅男。这个词是从日语里的“御宅族”演变来的。

在我认识田几个月之前，在叔叔的安排下，他赴了人生的唯一一次约会。对于相亲对象，他只知道她二十几岁，和他一样是工厂职工。捉襟见肘地省出钱来后，田约她在一个咖啡馆见面。虽然他不喜欢咖啡因，但在那只要花 20 元就可以无限续杯。他们的谈话内容很浮泛。他很失望，抱怨她“五官不协调”。他说他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实际上，因为没有姐妹，又在全是男性的环境中工作，他不知道该如何跟任何同龄女性交谈。

我问他想娶什么样的人为妻。

沉默许久后，他试探性地说道：“她必须性格好。”

什么意思？我追问道。

“她必须要听我父母的话。”停了一会。“也要听我的话。”

每周末，田的母亲都会从乡下老家坐公交车到城里来，帮儿子做饭打扫房间。趁着来回擦地板和切西红柿的空隙，母亲就会暗示他：“你不觉得到时候了吗？”或者是“妈还不老，还能帮你带孩子。”（得知他母亲在一个制作马鞭的工厂里工作，我被逗乐了。）

田结婚这件事是势在必行，这不光只是为了满足他父母的期待。他盘算着，父母只能再挣十年的工资。他需要找到一个伴侣，在父母退休后能帮他一起还房贷。当然，这对未来的田太太来说并不是很公平。田家指望着她帮忙还房贷，但又不太可能在房产证上写上她的名字。

当我问到他以后会不会在房产证上添上未来妻子的名字时，他坚定地说：“当然不会，这房子是我父母和我一起买的。”

根据社会学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的计算，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只有 30% 的婚后房产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但是出资的女性数量却超过 70%。当婚姻出现问题，必须要上法庭划分婚姻资产时，问题就变得很棘手。2011 年，中国对婚姻法做出了一项新的解释，规定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婚姻财产就属于谁——通常几乎都是属于丈夫。由于中国近年来很多财富创造都是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增值，因此，在这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财富积累中，女性被排除在外。洪理达估计，房地产市场约价值 27 万亿美元。

与大城市相比，宁海这样的小城市谈恋爱的选择实在太少。高科技的选择就是交友网站，比如世纪佳缘和百合网；而低科技的做法就是父母代表单身子女在公园里贴交友广告。第二个办法从退休父母们聚在一起抱怨孩子没有对象时就开始了，已经流行了十多年。家长们很快就开始交换信息，这也就促生了中国公园里所谓的婚姻市场。

我第一次偶然发现一个婚姻市场是在 2006 年。当时，北京玉渊潭公园正樱花盛开，我发现公园有个角落里聚集着一群人，便好奇地走了过去，看到了很多手写的广告，有的铺在地上，有的则夹在树木之间的绳子上。



我和一个给自己儿子打广告的男人聊了起来。他儿子二十几岁，是个以仿绘名画为生的画家。这位父亲甚至还带来了儿子画作的照片。“看，他很有才吧？”他指着儿子画的一副梵高的《鸢尾花》说道。和公园里大多数被父母打广告的人一样，这个儿子并不知道他父亲正在为他的终身抛头露面。“他要是知道我正在跟你介绍他，会很害羞的，”这位父亲说道。我赶紧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他的脸沉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收起了儿子的照片。我问他，现在就开始操心儿子单身与否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他叹了口气。他知道在中国挤上婚车已经难了。

多年来走过这些婚姻市场后，我发现这些广告里有个趋势：广告里的男性大都是二十几岁，没上过大学，而女性则年纪更大些，学历也比较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女性 20 岁，男性 22 岁）造成男性从内心里期望寻找比自己年轻的（通常还得是社会地位比自己低些的）女性，还因为中国门当户对的文化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女要高嫁，男要低娶。自然而然，这让婚姻市场的挤迫更加严重。门当户对这一观念对于像新和平村的那些农村光棍来说显然很不利，但同时也限制了高学历女性的选择，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玩笑：“中国有三种性别：男性、女性和女博士。”

我怀疑这些婚姻市场的广告有多少能造就最终的秦晋之好，不过这些广告的确体现了中国父母在子女的择偶过程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社会学家孙沛东在其著作《谁来娶我的女儿？》中指出，在上海人民公园的婚姻集市上，65 条广告只让 3 对男女成了配偶。尽管失败率如此之高，孙还是认为婚姻集市的存在满足了一项重要的需求：它为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得以分担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脆弱的家庭结构给父母带来的焦虑。

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现代化的约会方式，这些方式是由单身者主动参与的，而不是由他们的父母一手包办。2013 年，我参加了一场由世纪佳缘主办的大型相亲会。世纪佳缘是纳斯达克的上市企业（股票代码“DATE”），是中国最大的婚恋交友机构之一，注册用户超过 1.1 亿。这场长达 3 小时的相亲会针对的是白领工作者，费用是 100 块人民币，约有 100 个人注册了此次相亲会。这让我松了口气，因为类似的相亲会中有的参加人数多达上万人。

由于我显然属于年纪较大的一类，又是个外国人，于是我的调查员爽和我想出了一套说辞：我会向别人介绍说我是她的表姐，是海外华侨，目前在北京工作，是陪她来相亲的。

幸亏我们有备而来，因为登记处要求我们生成身份信息。没人能够掩饰自己的年龄，因为我们身上都贴着标有自己出生年代的标签。爽的大红标签上写着“90后”。我的当然是“70后”。在中国的交友圈，70后被归为3S（剩女）——单身（Single）、七十年代出生（Seventies）、被剩下的（Stuck）。这标签就好像霍桑笔下的红字。我问组织者他们发出了多少“70后”的标签，“不多。”有个人狐疑地打量着我，不屑地说道。

接着，我们被带进一个舞厅，里面的椅子被排成了一组组正方形，每组十个人。舞厅的一角摆放着一些茶点：水果、软饮、甜饼干，没有酒。我悄悄地靠近了其中一组，打量着其他参与者：一个女人用头发遮挡住了显眼的“70后”标签，脚上穿着塑料的洞洞鞋；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头也不抬地盯着手机。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些粉色的小纸条，用来写自己的详细资料：姓名、爱好、QQ号码。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我们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就可以交换纸条。每个人在动手写信息之前都会先偷偷地扫一眼周围的人。

司仪跳到舞台上时，每个人都松了口气，但好景不长。“大家都站起来！转向你的搭档！给你的搭档做做按摩吧！”我小心翼翼地给一个二十多岁的瘦弱男生揉了揉肩膀，然后又转过身去让他揉我的肩膀。一不小心，我发现自己把他熨得十分平整的衬衫弄皱了。“对，就这样！使劲！”司仪高声呼喊，我们也听话地捶着对方的肩膀。

司仪让我们每组想一句浪漫的口号，然后再一起喊出来。喊得最大声或着口号最有创意的（我不是很确定规则到底是哪个）小组将赢得比赛。我们组想出的口号是“永恒爱情勇士”，听起来就没有士气。轮到我们喊的时候，大家都喊得跟刚出生的小猫一样有气无力。难为组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暂且叫他老张吧）还自告奋勇充任组长，拼命地给大家打气。“大家一起来！”他尖声喊道，“永恒！爱情！勇士！”

我们再一次有气无力地嚎叫。

接下来是自我介绍环节。每个人都严肃得有些可怕。所有的女性都反复强调自己想要“找个真心诚意的人”。所有的男性都列举自己的成就：学历、工作、汽车，以及是否具有那至关重要的北京户口。没人假装他们只是为了娱乐、交朋友或者找个能一起在沙滩上散步的人才来到这里。他们的愿望很赤裸——找一个想结婚的伴侣——这俨然已无任何浪漫可言。以组长自居的老张，介绍自己的时候只是说他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他不像其他男性那样，连自己的工资、公寓大小都和盘托出，却扬着眉毛说：“这么说吧，结婚的条件我都有。”穿着洞洞鞋的女人说自己是医生，平时太忙了，很难认识什么人。她是我们组里所有女性中唯一一个说自己不介意和更年轻的男士交往的人。

轮到我时，我赶忙把之前编好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我只是来这儿陪我表妹的。老张严肃地盯着我说：“是，但我问你，你是真心诚意的吗？”

接下来，我们都被要求换到下一组，然后重复同样的事情：按摩、想口号、喊口号、自我介绍。

在我们摇摇晃晃地离开会场后，我问爽她有什么想法。她翻了个白眼，不屑地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学校。净是些幼稚的游戏。”

这些正儿八经的相亲活动让包括爽在内的很多人兴趣全无。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26岁的艾德瑞（Alex Edmunds）觉出商机，创办了一个叫“凑凑吧”的公司。该公司将其举办的交友活动称为“交友联谊活动”，包括远足、羽毛球和晚餐等。艾德瑞的客户中有很多科技公司，比如通用电气（GE）、IBM、微软（Microsoft）、搜狐和百度等。这些公司每次都通过各自的“单身俱乐部”为这些活动提供高达三万至四万元人民币的赞助。

“没人想参加相亲会，相亲会都很扫兴。我们把这种活动叫做交友联谊，但显然这些活动是为有相亲意向的人举办的，”艾德瑞说。

这些公司并不是在无私地为人牵线搭桥，而是在以此种方式减少员工的流失（已婚人士较不倾向于跳槽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并提供一种日益宝贵的公司福

利。这些单身俱乐部不仅吸引着员工本身；还吸引和安慰着他们的父母，特别是那些其独生子女在外工作的父母。比如，百度每年都会给员工的家人寄去其俱乐部活动的简报。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父母们会给公司寄回手写的纸条，要求公司举办“更多的单身活动”。

在任何文化中，追寻爱情都要花费工夫，内中也往往不乏辛苦是一件辛苦而艰难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于父母过高的期望加剧了子女内心的压力，加之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谈恋爱在中国似乎更加艰难。就在不久之前，大多数中国人找伴侣还是依靠媒人，或是仅在极为有限的生活圈子里寻找，这样会相对容易些。而如今，约会的选择多了，但同时焦虑感也大了。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人口减少，且家族网迅速缩小，但核心家庭的基本轮廓仍然存在。在西方逐渐出现的新型家庭——同性恋家庭、跨种族家庭、无子女家庭、单亲家庭、未婚家庭和继亲家庭，在中国仍然很罕见，部分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阻碍了某些家庭类型的形成。例如，中国几乎没有未婚妈妈，因为少了一纸结婚证，这些妈妈几乎无法给孩子争取到出生证明和户口。

当然，这种婚姻焦虑被部分放大并故意夸张了。零售商发现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把每年的“光棍节”（11月11日）打造成了购物节。光棍节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在11月11日这天给自己买了些小礼物，算是对自己单身状态的安慰。而今，光棍节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上购物节，净销售额达几十亿元，甚至超过了美国的“网络星期一”。2012年，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甚至将“双十一”这一词汇注册为商标，并表示如果哪家媒体播放了竞争对手含有“双十一”字样的广告，就会针对其提起诉讼。这就好像亚马逊要把“情人节”三个字注册成商标一样。

共产党对婚姻焦虑（尤其是女性婚姻焦虑）的加剧也有一定的责任。由于男女比例失衡，你可能会认为女性应该会拥有更多的权利，并被视为相对的稀缺品，但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女性很早就开始感受到婚姻焦虑，因为她们觉得女性一旦到了近三十的年纪，就嫁不出去了。而在西方，快三十岁的女性会认为自己的条件还不错。

2007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起的一项由政府支持的活动助长了这种焦虑。讽刺的是，妇联这个共产党的下属机构本来肩负着提升女权的任务。这项活动称为“剩女运动”，它发明了“剩女”一词，把25岁以上的女性比作是剩饭剩菜。而对中国最亟需帮助的单身男性，却没人举行类似的活动来帮助他们。

洪理达认为，剩女运动旨在规劝高学历的女性不要太晚结婚生子，因为共产党正是需要这群人来繁育“优质”的孩子。

独生子女政策的规定目标之一是减少人口数量，以提高人口素质。生育计划者常使用的一个标语就是“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显然，中国政府对这样的计划进度并不满意。2007年，中国国务院宣布，中国面临十分严重的所谓人口素质低下的问题，这将使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提高人口素质又一次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不久之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就发起了剩女运动。

中国并非是唯一一个鼓动知识女性结婚生子的国家。许多亚洲国家面对不断下滑的出生率，也出现了类似的针对女权运动的强烈抵制回击，在日本，也有与中国的“剩女”相仿的词汇，比如“寄生虫”和“圣诞节蛋糕”（“过了25就变质了”）。

1994年，岛国新加坡的开国元首李光耀总理就十分后悔不该给女性平等的权利，因为这使得女性在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下反而不受欢迎。“我们以为可以开放整个系统，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像西方一样，”他说，“但我们忘记了文化是不会一夜之间改变的。所以你自己还是家里的老大。你不会想娶一个比你聪明、又挣得比你多的老婆。”

这种回潮引发了人们对解放前时期和女性主义运动之前时期的怀旧。“剩女”运动发起后的一年，一大批鼓吹女性顺从男性的成人教育工作坊便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这些工作坊被称为“女德课程”或儒学讲堂，很多与地方政府、学校和教育基金会有合作，宗旨是向中国人传授圣哲孔夫子所奉行的“传统价值观”。（这些儒学孔子讲堂和孔子学院不可混同，孔子学院是教育部向海外宣传中国文化的臂膀。）

我的一个调查员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讲堂，并记录了整个过程。该活动由河北省传统文化研究会（主管单位是该省的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每月举行一次，每次为时一天，费用约为 200 元人民币。（该研究会的很多领导都是政府高级官员。）

丁璇老师站在孔子和习近平的画像旁边，对着满教室的学生说道：“丈夫对于妻子就是天。妻子应该学习敬天。”在长达 3 小时的授课过程中，丁反复强调，女性需要退居次位，声称“强势的女人会有别的麻烦，乳房和身体其他部位会生癌。既然你不想再做女人了，老天爷就会来帮倒忙。”

丁呼吁所有女性都应该以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为榜样。彭可以说是中国自宋美龄以来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作为一名民歌手，她的知名度在许多年间一直高于她的政治家丈夫。夫妻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不同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追求各自的事业。但根据丁的说法，这并不是彭成为中国女性典范的原因。“她会做面条、会烙大饼，可以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买蔬菜，”这样，习近平才得以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成为世界著名的圣君”。

现代中国竟存在着如此复古的思想，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对于社会上那些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感到越来越被孤立的人来说，这些讲堂却很有吸引力。这些讲堂吸引来的女性通常都有家庭问题，比如丈夫出轨。而男性之所以被吸引前来（这些讲堂似乎令男女两性都感兴趣），则是因为面对越来越沉重的社会和人口压力，这些讲堂所传递的信息增强了他们日渐低下的自尊心。2014 年 9 月，在一次有超过 3 万人参加的在线投票调查中，51% 的人说这些课程是有价值的。

中国的山东、河北、山西、广东和河南都设有儒学讲堂。有些讲堂是免费或受资助的；其他的则可能为期一周，费用上千元。有些讲堂的内容可能不会如此具有煽动性和歧视性。例如，我听说有女性讲堂主要提供家庭咨询或者教女性一些家政技能，比如针线活。

至少还有一家儒学讲堂的语调与河北的课堂相似。在东莞这个有大量年轻女工的制造业重镇，有一家女性讲堂奉行这样的理念：“被丈夫打不要还手”以及

“绝不离婚”。2014年9月，该讲堂由于无照经营以及“违背社会道德”被政府部门关闭。

### 三

从独生子女政策中受益颇多的唯一一个群体是中国城市女性。如果你是1980年后出生于中国大城市的女性，那么，你活到童年之后、营养充足、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那些出生于19世纪或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女性。

人类学家冯文（Vanessa Fong）指出，没有兄弟与之争夺父母资源的独生女尤其是中国实用主义策略“姑娘当儿子养”的受益者。因此，中国目前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达到历史新高。2010年，中国硕士研究生中有一半是女性。盖洛普咨询公司指出，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位居亚洲前列，70%的中国女性已受雇从业或是正在求职，而印度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则仅为25%。

但是，在城市女性进步的同时，却有大量农村女婴在出生时就被遗弃或者杀死。想到这些，我们很难认为独生子女政策的确促进了中国女权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估计，杀婴及性别屠杀造成亚洲减少约1亿女性人口，其中大约有一半本应是中国女性。

照目前的性别比例失衡状况来看，女性无疑比男性更宝贵，却未必更受重视。除了一股正在抬头的造成反对女权的回潮呼声日益高涨外，女性稀缺还导致女性日益被商品化。过去十年，中国卖淫和性贩卖人数呈上升趋势，但由于执法不严、透明度低，因此具体数字并不明确。2007年，美国国务院估计，中国国内每年至少有1至2万受害者遭到贩卖，贩卖者每年从中牟利70多亿美元，这比贩毒或贩卖武器所赚的钱还多。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可能给中国的一部分女性带来了好处，但却给越南、柬埔寨、缅甸和朝鲜等邻国的女性造成了危害。近年来在这些国家，为中国男性贩卖、绑架女性的情况有增无减。很多女性被强迫或诱骗卖到中国做新娘。与新和平村

的逃跑新娘不同，这些女性大都无法逃跑，或是在逃跑后面临更悲惨的际遇。中国法律倾向于把性贩卖的受害者当成违法者来对待，因此这些受害者很难得到庇护所与支援。一些受害者，比如朝鲜女性，如果被抓到的话，会被驱逐出境，面临拘留或死亡的命运。根据人权组织“杜日哈纳协会”（人权组织二合一教会（Durihana Association）的说法，中国约有 5 至 10 万的朝鲜女性难民被以每个 1500 美元的价格贩卖。

有关中国女性的日益被商品化，我所目睹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可能就是参观东莞的性爱娃娃工厂了（那所极端的儒学讲堂被官方关闭，也发生在东莞）。那儿至少有一个制造商想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既然中国女人不够，何不造些假的女人呢？

2009 年，工厂厂长何先生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关闭了原有的生产办公家具的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商业机遇。做什么高价值的产品能够供不应求呢？他们的答案是：性爱娃娃。不是廉价的充气娃娃，而是真人大小、具有不锈钢骨架、覆盖着柔韧的聚氯乙烯肉体的娃娃。这些娃娃做得栩栩如生，每个售价超过三万元人民币。

2009 年至 2010 年，何和他的伙伴用不同的原型做实验。他们在广州的大学城设了一个实验室，找大学生做受试者。在看到题为“假娃娃，真爱爱”的小广告后，冯文广是其中一个做出回应的人。

工业设计专业的冯十分好奇，想一探究竟。他并非只是想偷尝禁果。“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他说道。他思量着，毕竟中国男性已经多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假女人或许能变成真买卖。

测试地点在离他学校（广东工业大学）不远的一条阴暗狭窄的巷子里，找到这里还费了他一点功夫。店面门口遮着一块红布，店里在放家喻户晓的《爱情游戏》这首歌。拉开红布帘之前，他在店门口犹豫着，紧张而不安。他想，要想走在别人前面，就要勇敢尝试新事物。

就这样，冯加入了一个奇怪的单身男性俱乐部。八个本科生给自己取名为卡哇伊（日语“可爱”的意思）俱乐部，开始定期聚餐、唱卡拉 OK，还会为何先



生实地测试性爱娃娃。何将他的公司名为新中易（Hitdoll）有限公司。（宣传语：追逐完美者，中国顶级仿真娃娃）

一开始，这有点像是《金发女孩和三只熊》<sup>8</sup>的改版：冯和其他测试者抱怨一米五高的娃娃太僵硬、太冰冷，或者太不逼真了。仿真娃娃（Hitdoll）的制造者们试验了不同的材料（硅胶、橡胶）、乳房大小（C 到 EE 罩杯）、毛发（假发、真发）和种族类型（黑人、黄种人、白种人）。“提出这些反馈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最终的使用者，”冯说。此种仿真娃娃价格昂贵，瞄准的消费群体是那些有钱且很可能是已婚的男人。

冯说，卡哇伊俱乐部的成员们“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需要这些东西。我们确信自己能找到真正的女人。”说这话的时候，他带着 24 岁年轻人飞扬的自信。毕业后，他甚至加入这个公司担任设计师。

2011 年，何的工厂开始投入生产。3 年后，我参观他们的工厂时，他们每月能卖出 10 至 12 件，国内和国际市场销量各占一半左右。公司的业务规模很难扩大。别的且不说，身高一米五的娃娃运输比较困难，必须装在棺材似的木箱子里。且这些娃娃不能折叠或藏在床头柜里。“这些娃娃就是用来取代真实女人的，”何说。

枕边游戏是广州一家高端性玩具专卖店，该公司的总经理程女士告诉我，一个顾客在购买了 Hitdoll 娃娃几天之后便打电话给她，询问是否有办法可以把娃娃叠起来。顾客解释说，他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特别讨厌那只娃娃。“最后，他不得不认真地和母亲谈了谈，说：‘你看，我是个单身男人，肯定会有需求。难道你想让我去找小姐吗？’这之后，”程女士认真地说，“他母亲才同意他把娃娃留下。”

2014 年，冯帮忙设计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国内市场的中低端性爱娃娃，价位也更易于接受，只要一万八千元人民币。娃娃的五官特征有所简省：睫毛和眉毛都是画的，而不是用真发做的，形体的触感比较僵硬，柔韧性也更差些。在昏暗

---

<sup>8</sup> 《金发女孩和三只熊》：詹姆斯·马歇尔创作的儿童故事。讲的是一个金发女孩误入三只熊的家里，引发混乱场面的故事

的灯光下，这些娃娃看起来与真人诡异地相似，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是模仿某些东亚情色片明星设计的。有些高端模型中受男性欢迎的特征被保留了下来。

“乳头非常硬，”何边说边用力拽了拽娃娃的乳头。“正常的乳头，”他说道，“是受不了人这么用力拽的。”

Hitdoll 娃娃所代表的特殊需求市场当然是十分狭小的。但我相信，这只是中国由于女性稀缺所带来的大趋势的一部分。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对女性和女权主义的敌意日益增长。

尽管性别比例失衡所造成的压力能够逐渐减少对女儿的歧视，但这种反对女性和女权的趋势仍不太可能消失。中国性别比例失衡虽然仍然很严重，但自从 2004 年达到峰值（121:100）后，便开始缓慢回落。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中国的性别比例会逐渐恢复正常水平，正如其他父权制社会如韩国所发生的一样。目前，中国只想要儿子的人似乎的确越来越少。2013 年，浙江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想要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13% 的人想要儿子，21% 的人更想要女儿。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 2003 年计生委发起的关爱女孩行动，其目的就是提高人们对女孩的重视程度。但是，中国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值得记住的是，独生子女政策凸显了中国长久以来对女性的恶性歧视。取消该政策本身并不会解决国家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这是当我离开新中易公司，来到祖先居住过的村庄时体会到的。

多年以来，尽管一直在中国工作，我却一直拒绝探访方家祖先居住过的村子——离东莞只有两小时车程的自力村。

我的反感源于自己的性别。我的祖父方文娴彼时来到战前的马来亚，发家致富。他生有十八个儿子，我父亲是第十六个。尽管祖父过世后日本人入侵，方家家财尽散，但对家族的血统仍深感自豪。当我母亲嫁入方家，连生五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时，方家人都一致认为，父亲应该娶个更好的老婆。

长久以来，幼小的我都无法理解这件事给父母的婚姻带来的巨大压力，或是给母亲带来的重担，尤其是在春节这种大的家族聚会上。每到那些时候，我都很

开心，因为可以和堂兄弟们一起到处疯跑。我们假装自己是强盗，挥舞着武器，天真地以为自己表演的是凌空一跃和连环腿。在这些游戏中，我像个小子一样吵闹顽劣，也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姑娘。但有时候，我的祖母（阿嬷）会打断我们的游戏，轻声细语地把她那段时间最偏爱的孙子（永远是我那些堂兄弟的其中一个）唤到身边，好给他喂颗糖吃，或者帮他擦擦汗。

我和我的姐妹们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待遇，还得小心翼翼地和阿嬷保持距离。我那身材瘦小、皮肤惨白的阿嬷，偶尔喜欢伸出手来狠狠地拧我们的肚子，这待遇是她只留给我们这些女孩的。

我父亲从来没有从没膝下无儿的痛苦中复原，把气都撒在了孩子身上，不是殴打就是勃然大怒。这种愤怒可能要了他的命，57岁时，他中风倒下，再也没有起来过。

所以，我并不是很渴望寻根。在方家眼中，女性只是暂时的家庭成员，日后就会成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然而，长年累月，我还是从去过老家的堂兄弟口中听说了更多关于自力村的事，勾起了兴趣。原来，自力村风景迷人，数以千计的塔楼点缀着中国南方平坦的绿野。它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址。

这些塔楼叫碉楼，造型新颖奇特，令人称绝。其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人在世界各个遥远角落工作时所见到的建筑：摩尔式拱、科林斯式圆柱、拜占庭式圆顶和锯齿形城墙。昔日的这些宏伟碉楼看起来本该十分花哨，像是暴发户的手笔，但在现实中，它们却显得出奇地浪漫，让人想起托尔金或格林笔下的童话世界。

后来我得知，祖父也建了一栋雕楼，叫云幻楼。正是这一点让我最终下定了决心。参观过性爱娃娃工厂后，我有些身心疲惫。还有什么比来一次云幻楼的巡礼朝圣之旅更好的呢？

祖父的碉楼楼型细高，四四方方，顶楼是开放的露天平台，视野极为开阔，四周围着科林斯式圆柱。它看起来美丽而平和，但阳台的围栏上有小小的箱状缝隙，是供步枪射击用的，我这才想起这座碉楼是建来自卫用的。对于那些在海外发了家的归国华侨来说，这些碉楼象征着他们的财富与地位，同时也见证了他们

所生活过的动荡年代。建立这些碉楼是为了防御当时附近的众多土匪流寇，也就是当时最躁动不安的光棍们。层层碉楼，代表着高耸的恐惧。祖父面对当时的动荡倍感伤怀，挥笔写下一首诗，刻在碉楼上：

云龙凤虎际会常怀怎奈装置莫愁 只赢得湖海生涯空山岁月

幻影坛花身世如梦何妨豪情自放 不负此阳春烟景大块文章

离开祖父的碉楼后，我和自力村的一些村民聊了聊，发现我在村子里仍有一些亲戚，包括一个堂兄。我们在他家坐了下来，他给我看了家族的照片。我漫不经心地问他：“祖父有多少个女儿啊？”

方家只计算儿子，我父亲是祖父的第十六个儿子，却不是第十六个出生的孩子。我一直都不清楚我到底有几个姑姑。

“一个，”他立刻说道。

“真的吗？我记得至少有两三个姑姑。”

他和其他亲戚讨论了一下。他们知道祖父的第一任妻子生了个女儿，这个妻子后来留在村里，成了碉楼的女主人。她裹着小脚，拒绝远行海外。第二任妻子和祖父一起在马来亚生活，祖父的孩子主要都是由她所生。她去世后，祖父又娶了第三任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她当时比祖父的一些女儿还年轻。祖母在祖父晚年时又给他生了四个儿子。

过了一会儿，我堂兄回来了。“我们只知道一个。其他的都没算在内。因为她们出生在海外。”

一切都如我所料。自力村的小型家族博物馆详细记载了出生在遥远异国的方家男子，连我那远在马来亚的父亲也被记录在内，但对女性却只字未提。这是个良好的提醒：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前，性别歧视就是中国的一颗毒瘤。

但我发现方家对女性的记录还是有所选择。在自力村的博物馆里，方家族谱可追溯到14世纪初的中国北方。根据族中历史学者的说法，方家的祖先是位大

将军，娶了皇帝的女儿，后来南下抗击蒙古人。而这位女性，最终被记入了方家的族谱。

## 七 好死不如偷生

研究死亡就像凝视池中的倒影。池中之水让我们得以反观自己最终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既然如此，这也是一个比往都更加合适的契机，去叩问：我们究竟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阿兰·克利希尔 《死亡的社会史》

两个人是不够的，这才是问题。他一直以为两个人的家庭不多不少刚刚好，也一直觉得自己不愿生活在三人、四人或五人的家庭里。可是现在他才看明白为何两个人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你还不至于无依无靠。

——尼克·霍恩比 《关于一个男孩》

—

七月的一个清晨，在春城昆明，马克如往常一样，早餐吃了鸡蛋和蜂蜜水。8点25分，他准时开始了第一轮查床。

马克在日记里写道：工作还没开始，突然“就出现了一阵骚动。一位护士告诉我们有三个病人情况很不好。”

三十分钟后，三位病人都已被宣布死亡。

上班一个小时后，死亡名单上又多了一位病人。

马克安慰着一位哭泣的病人，这位病人“哭得泪水横流。”

为免大家认为马克是一位糟糕透顶或极为不幸的大夫，请允许我说明一下：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临终关怀医院——昆明第三人民医院姑息治疗科的主任。马克并不治愈病人，他的工作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最后的日子不会那么难熬。对本是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来说，这份工作并非易事。

马克多年来做了大量的临床观察记录，是姑息治疗方面的佩皮斯。我猜，这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以此作为自己的心理治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人如何面对死亡这件事令他着迷。他的日记内容古怪而讽刺，有时还有内心的煎忧。

在多年的实践中，马克对中国人口的衰老和死亡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偏爱的理论。一是中国近年出现的物质主义浪潮让死亡更加艰难，二是无后老人的死亡最为痛苦。这倒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有积蓄，有养老金。但是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如此稀少，就会失去创造力，”马克说，“失去希望。”

这最后一点虽然在意料之中，但在中国却体现得最为明显。正是这一点，让我最终找到了他。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人数量庞大本来不足为奇。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突出之处，并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人衰老的速度更快，而是指中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国的退休人口数量正在迅速赶超其工作人口的数量。

目前，中国的工作人口对退休人口比例是 5:1，这一数字让经济计划者们欣喜。大量生产力高且纳税的工作人员支付着退休人口的开销。但是在二十几年后，中国这一吸引人的 5:1 比例就将变为 1.6:1，而这一数字在经济学上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这意味着税收资金缩减、消费减少，以及生产力的全面降低。这一过渡（老龄人口增加，青年人口减少）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因为相比于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平均寿命更长，且生育子女的数量更少。

但即使是这样，在西方，这种向老龄化社会的过渡也经历了 50 年时间。西方各国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为人口的老龄化储备经济和社会资本（很多人可能认为即便是这些准备也依然不够充分）。而在中国，老龄化过渡却将发生于一代人之间，而储备却是空虚的。

老龄化过渡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结果：人口寿命延长、出生人口减少。这第一件事与独生子女政策毫无关联，而这第二件事则与之息息相关。由于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渡将如海啸一般，其速度将造成巨大的冲击。

到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每年将新增 1000 万老龄人口，同时每年将失去 700 万成年劳动力。中国领取养老金的大军将制造更大的缺口：2013 年，养老金的缺口便已达到 18.3 万亿，占 GDP 的 30% 以上，且这一缺口还将继续扩大。中国 31 个省份中有一半的省份无法支付养老金开支，不得不靠中央政府救援纾困（此处不合适）。

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所有可能的负面后果中，这一后果是我们能够亲眼目睹的。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性别失衡是否会导致国家较为好战，或使国内较为动荡；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小皇帝一代是否会变成较悲观、唯我、缺乏冒险精神的国民；我们甚至也不能确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会在何种程度上阻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但我们确知的是，在没有自然灾害、瘟疫和战争的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大军会逐渐老去。这意味着到 2050 年，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

《揭秘老龄化》的作者费晓闻（Fishman）写道：“如果中国的老年人自成一国，那么他们将是紧随印度和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 二

我母亲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摆放了三个瓷制的神像。

这三位神仙是福、禄、寿。它们没有观音、佛陀和先人牌位那么重要，因此也不能像它们一样摆在五尺高的红木神龛之上。

我小的时候，神龛高高地凌驾于我头顶，满是鲜花、香火和水果供品。我总会把这种丰足与体罚联系在一起，因为每每我犯错被罚之后，都会被罚跪于神龛前，手捂着被拧痛的耳朵。

自然，我变得憎恶这一切：香火、祖先，甚至是观音似笑非笑的面容。福禄寿看起来则更顺眼一些，小小的人像大约只有我前臂（一个小孩从指尖到手肘的距离）那么高。三尊面容和蔼的神像各自坐落在木柜顶端，有自己的小神台。对它们，我是不需跪的，家人也从不以鲜花礼之。不过这三尊神像依然伫立在那里，昭示着俗世人生所能渴望的一切。

福与禄都是长袍飘然、面有黑髯的绅士，难分彼此。寿星则容易辨识，是一位光头且额头圆突突的老者。如果给寿星盖上一顶红色绒线帽，就会像中国化的和善可亲的圣诞老人了。

纵观今日的中国，在福禄寿三者中，最没有神通的恐怕就是寿了。

毕竟，除了个别不幸的人之外，中国人已经普遍达到了长寿。中国人均寿命是 74 岁，这与二战时期的人均 39 岁相比，是巨大的飞跃。

最变动不居的福，依然广受人们追捧。禄也有同样的吸引力，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老年军团仍然缺乏社会安全保障。没有禄，没人想要寿，但是中国几乎一定会不禄而寿。

如今，中国会“先寿后禄”已经成了一句老话。经济学家、学者、政客和普通老百姓都给出过这样忧伤的预言，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屈从。似乎没人对不禄而寿的死法有太多怨怼。就像中国人说的，怨怼有何用，不过是对牛弹琴、白费功夫。这一现实让人觉得不可逆转、无法避免。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也许的确让五亿农民脱离了贫困，但却仍然让一亿八千五百万的退休人员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领着



不够 6 块钱的退休金。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但其富裕程度却仍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人均 GDP 却只有韩国的六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

当然，有些人在中国的银发潮中看到了商机。摩托罗拉的一位高管王燕妮就提出要创立一个中国版的 AARP（美国退休者协会）或 SAGA 集团。（英国保险公司，致力于为 50 岁以上老人提供生活服务）。这一公司将为富裕的中产阶级退休人员提供各种生活方式服务，包括跳舞、旅游、电脑课等。她还设想要引入现代育儿课程，特别针对那些要带孩子的祖父母。

王撰写的商业提案赢得了罗兰贝格奖，这是英士国际商学院颁发给最具企业头脑的学员的奖项。

她把自己的智慧结晶称为“青松”。“之所以取名青松，是因为我觉得‘松’字在汉语中跟放松的松同音。我不想取传统的、听起来很沮丧的名字，比如‘夕阳红’之类的。”王说。

王当时三十几岁，但是看起来干净清爽、面色光泽如蜜，显得很年轻。她从容淡定，讲起话来掷地有声，让人觉得她一定从小就一直是班长，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是人生的赢家。实际上，她确实如此：成长在关爱备至的大家庭中，学习经济学，找到了合适的结婚伴侣，是摩托罗拉一位前途无限的高管，后又进入商学院学习。她在英士国际商学院的教授们之所以授予她罗兰贝格奖，并不是因为她的商业计划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以她的能力，她一定会付诸执行。

2013 年，我在王燕妮办公室旁边的一家素食餐馆见到了她。彼时，王燕妮的人生目标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项还未完成：生孩子和发展“青松”公司。

王燕妮建立青松公司的最初理念似乎是基于一个合理的前提。在中国，从退休到病终中间的年龄差也许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大的。男性退休年龄为 60 岁，女性退休年龄则早至 50 岁，这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要早得多，着实惊人。

王认为，这一大批的退休人员会需要一些事情来消磨大把的闲暇时光，她希望填补这一空白。2004 年，她启动了青松公司，对公司会员每年收取 1 万人民币的会员费。她预计，到 2008 年，公司的营业额将达到 60 亿人民币。

但是青松公司却彻底失败了。两年后，公司仅有 2000 名会员，这期间，王还几次大幅削减会员费。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项目，但是都不愿意花钱。青松最后成了‘锦上添花’的事情，但却不是必需的。”王说。

和其他关注中国广大退休人员市场的企业家一样，王认识到了令人灰心的事实：市场很大，但是中国的退休人员都不愿意花钱。和那些经历了战后繁荣、愿

意尽情享受晚年的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在抗日战争后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危机，资源更有限，而思想也从根本上不同。王说，“他们希望能省下钱来留给子孙。”

于是，她回到了最初的设想上，问自己：“中国老人到底想要什么？”

答案惊人地简单，且很有可能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中国老人希望住在家里，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独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孩子们（他们中很多人都在为父母的主要开支负责）也希望父母能住在家里，因为在中国儒家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中，将父母送进养老院仍然会惹人非议。

家庭医疗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老百姓自己的事，而在其他国家，这通常是由政府服务机构和保险公司共同出资的。中国的保险公司目前正在推出一些养老项目，但针对对象都是四五十岁的群体，因此这些产品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中国目前需要家庭医疗的群体都是 65 岁以上的人群，总体上还是自费治疗。

2010 年，王燕妮再次启动了青松公司，提供家庭康护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进行家庭电话回访、监控用药和监督物理康复训练，每次上门护理的费用从 100 块到 800 块不等，与西方相比，这几乎少得令人发笑。与西方的家庭医疗护工不同，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和理疗师，有时甚至是医生，他们仅负责治疗，不做饭或打扫。

青松的业务迅速增长。2009 年，青松康护已有两万名会员。成立两年后，会员人数就翻了不止一番，达到了五万人。到 2015 年，这一数字涨到了 17 万，而青松也将业务扩展到了上海。王燕妮说，青松在 2009 年濒临破产，目前已处于盈利状态。她的目标是把青松做成全国加盟的公司。

但是青松的成功不是压倒一切的。在单笔交易收费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王燕妮的成功靠得是交易量的庞大。要掌控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工作人员，需要良好的管理技巧，才能保证服务水平的稳定。而有利的方面是，青松在基础设施方面需要的投资很少，所以王燕妮得以迅速扩展公司的业务。

“这并不是高深的事，”她笑着说。但是，虽然王燕妮十分自谦，她却雄心勃勃。她正在游说政府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希望将青松的服务扩展到城乡结合地区。她希望青松最终能够服务 500 万老龄居民。“整个世界都在老去。我希望中国能够为如何优雅地面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些解决方案。”王说。

这些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还未可知，因为青松的模式——相对便宜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以及高密度的人口——似乎只适用于中国。这一点，我在随同青松的护士进行上门服务的过程中得以略知一二。

夏日的一天，我在朝阳门地铁站见到了高护士。为了控制成本，青松的护士在上门赴约时都使用公共交通或者自行车出行。在面积庞大、交通堵塞的北京城，这并非易事，要仔细做一番打算。

高护士 25 岁，肤色黝黑，是土生土长的江西农村人。她在青松工作已经三年了。我们来到了附近一幢没有电梯的五层小楼。病人（这里暂且称为陈）是个七十三岁的政府退休干部，身患早期帕金森症和二型糖尿病。

在进入公寓之前，高护士套上了印有青松商标的薄荷色外套，戴上了绿色的护士帽。她还穿上了塑料鞋套，也递给了我一双。

陈和他妻子住在空间充裕的单卧公寓里，有个洒满阳光的阳台。他们 12 岁的孙儿正在客厅打游戏。陈讲话很慢，但颇爱聊天。高护士一边给他量血压，一边跟他谈起他的女儿们。他们说现在城市里的父母都更愿意要女孩了。陈向我谈起他现居新加坡的侄女——虽然有份好工作，也有自己的公寓，但却迟迟不婚，让她妈妈担心。

显然高护士的临床风度很好，她一边帮陈做手部锻炼，一边愉快地交谈着。陈坐在轮椅上，高护士帮他按摩上半身。后来，他们又转移到床上，高护士为他做了一系列腿部和手部抬升练习。他喘着粗气，整套训练结束时已经大汗淋漓。高护士鼓励他：“再努力些，您能行！”

这样养老似乎并不是件坏事。陈的妻子依然健朗，可以帮忙照顾他。他们的儿孙都住在附近。虽然爬楼梯不太方便，但房子位于北京的市中心，离医院、商场和地铁都很近。更重要的是，整个公寓都是陈退休前的单位分配的，所以邻居们互相都认识，几乎是个城中的村落。每个人都熟知彼此。高护士进楼的时候，附近有个邻居跟她打招呼：“又来按摩了呀？”

我们坐上公交车去下一位客户的家。路上，高护士给我介绍了她工作的情况。之前，她在一家医院工作，每天要看护数百个病人。“当时很辛苦。我当护士是因为想帮人，但日子长了，病人们就只是一个个身体而已了。”（中国的大医院随处要排长队，雇人排队也成了常态。）

现在，高护士每天最多只看六个病人。很多人都是老客户，比如陈，就已经在高护士这里治疗 8 个月了。她得以熟悉病人的家庭，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在看到病人治疗有效果的时候，自然也有些许欣慰。这些病人请她参加自己孙子孙女的婚礼，春节时也会给她包红包。在这里，高护士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值夜班、长假加班了。她说，她已经无法想象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上。“我喜欢能够经常看见我的客户，我能看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说到这里，高护士满脸的欣喜。

跟随高护士的这几次初探似乎印证了我对中国城市退休生活的整体感觉。工作日的时候，如果你在早上 10 点到 12 点间到任何一个公园去逛逛，都会觉得中国城市的退休生活其实是件不错的事。如此低龄的强制退休带来的是大把的闲暇时光，因此公园里满是一些怡情养性的退休人员，他们跳舞、打太极、舞剑、放风筝，还在人行道上以清水和毛笔练习书法——这是我最喜欢的活动，字迹干后了无痕。

有个朋友的父亲有次带我去看他公园里表演柔力球——一种在退休人员中很受喜爱的游戏，结合了太极和曲棍球的原则。他挥起一把有橡胶软面的球拍，把有重量的球抛给自己的同伴，同伴接住球后在空中做出各种复杂的带球翻绕动作，然后再把球抛回去。柔力球与其说是一项球类运动，更不如说是舞蹈。它是1990年代由一位大学教授发明的，目前在海内外拥有数十万练习者。

跳广场舞的退休人员如此众多，以至于地方政府都设法限制他们的大型音响发出的噪音。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广场舞大妈”（当地媒体给出的称呼），受到噪音干扰的居民们曾经出言谩骂，朝她们扔水球，甚至有时候扔粪便，但大妈们依然不为所动。“大妈广场舞”已经成了一种体育竞技。在离朝鲜半岛不远的中国佳木斯，当地人自创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带着印有米老鼠图案的白手套表演各种手脚配合的动作，这一风格在全中国的老年人啦啦队竞赛中被广泛模仿。

公园和宜家商场的餐厅也成了单身老人常常出没的地点。在北京的天坛公园，家长们不仅在为自己的孩子发广告找对象，他们自己现在也加入了找对象的行列。滕德恩是老年寻偶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给我看了他每周日都要带到公园去的一大摞交友广告。只要花5块钱，60到85岁之间的老年会员们就能刊登自己的单身交友广告。里面通常会说明年龄、血型（据说能以之判断性格）、属相，还有是否有至关重要的北京户口。

这种对户口所在地的重视在年轻的单身群体中很常见。但我没有想到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也同样重要。毕竟，他们的子女都已成年。当然，我思虑得不够周全：医疗福利是和户口状况捆绑在一起的，城镇户口的居民享受的医疗报销范围要比农村居民大。

做媒的滕老先生有副急脾气，是离婚人士，他也在为自己寻找新的老伴。他唯一的女儿现在住在美国，他说，现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再婚已经越来越被社会认可。“谁愿意孤独终老呢？”

这副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画面是中国老龄化最广为人知、也最迷人的一个侧面。但是，老龄化在中国还有另一个很容易隐匿的侧面。在我跟随青松公司的高护士进行的一次探访中，我们见到了一位80多岁的独居女性。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早期老年痴呆。高护士所有的客户几乎都是自费治疗，唯有这个女人每周一次的治疗都是当地政府支付。

我们一进楼，就听见嗡嗡的电视声。高护士使劲敲着门，喊着：“奶奶，奶奶，是我，小高！”

没人应答。

高护士摸出自己的手机，给她打了个电话，悄声告诉我说：“她耳朵有点聋。”终于，门开了。一位面无血色的老妇人从黑暗中露出了脸，漠不关心地看了看我。她转过身，挪回了电视机前。接下来的时间里，她的眼睛从未从电视上移开。

电视上正在播一个泰国电视剧。高护士说，这是老奶奶最喜欢的。流产、昏迷后苏醒的病人、破产，这些情节在荧幕上迅速铺陈开来。高护士用力揉着老人的胳膊和双腿，不断地和老人说着话，但最终还是渐渐沉默下来。她询问老人吃了什么、每天都有什么习惯、是不是按时锻炼、有没有按时排便，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剧集中间插播的广告针对的都是更年轻的群体：奶粉、糖果、手机、汽车。老年群体对中国营销者而言似乎是已经死去的，令人忧伤。我没有看到成人尿布的广告，但是中国的确正在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成人尿布市场。

公寓在一楼，就像一个洞穴。电视就像篝火，火光掩映在女人一动不动的脸上。空气中都是陈旧的烟草气，墙壁污黑，水渍斑斑。没有艺术品，只有一本两年前的日历和一帧镶了框的影楼照。相片上的蓝天是假的，人脸也是修饰过的。两个中年女人和一个男人都梳着整洁的头发，露出不深不浅的笑容。我以为这一定是她的家人，但高护士悄悄告诉我不要问。“他们不来看他。”她说。

厨房的饭桌上还有剩下的饭菜、饼干和橙子。橙皮整齐地切成了四瓣，饼干包装袋被折成了小得不能再小的方块，每一道折痕都像用熨斗烫过一样平整锋利。我仿佛看到这个女人坐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折叠着饼干盒，消磨着无数小时的时光。

家访只有一小时，却像永恒一样漫长。从楼里出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人，被久违的阳光晃得睁不开眼。

就连开朗的高护士也显得神色黯淡。

“你觉得她会不会这一周只见到了你一个人？”我鼓起勇气问。

“不会。不过我是唯一一个跟她有肢体接触的人。”她伤感地说。

### 三

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在其所著的《最好的告别》（Being Mortal）一书中谈及了美国的临终关怀。他说，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愿意住进护理机构，是因为不愿因此丧失尊严和控制权。尽管我们在像《黄金女郎》那样的情景剧中看到的老年生活显得明快而独立，尽管退休社区中有太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能够帮助你生活，但是葛文德的结论是：“你会不会在养老院度过余生，和你有几个孩子有直接的关系。”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

对中国家庭结构的打击是共产党造成的最大破坏之一。毛泽东意识到，只有让人民把家庭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后，革命才有可能成功。在 50 多年时间里，共产主义不断铲除着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社会的根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励年轻人

造父母的反，压制祖先崇拜。而 1980 年共产党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则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面对不断攀升的离婚率和即将到来的退休人员大爆炸，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必须重建当初国家曾企图摧毁的家庭秩序。199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要求子女赡养年迈父母的法律。2013 年，北京进一步立法，要求老年父母的子女必须经常回家看望。这样的法律执行起来很困难，但立法行为本身发出了一条明确的信号：国家做不到的，家庭必须做到。

不幸的是，有些后果是难以弥补的。拿养老院来说。在葛文德所在的美国，生孩子也许能够让你不用进养老院。而在中国，没有孩子却可能让你进不了养老院。这对失独父母来说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很多养老院都拒绝接受失独父母，因为这些人没有儿女来批准养老院对老人进行治疗，也没有人能为日后的费用做担保。这种歧视似乎已经延及身后之事：一些失独父母抱怨说，连墓地都不肯卖地给他们，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已故的孩子要用的，而理由就是担心日后没有人承担墓地保养的费用。

中国目前有 100 万失独父母，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加。他们向北京提出了一系列请求，包括更高的补偿款、优先领养权和能够体现其在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丧葬方面需求的方案。他们不无道理地争辩，既然北京通过对超生人员罚款而获利，那么就应对那些遵守政策却因独子夭折而失去经济依靠的家庭进行补偿。这一论点的智慧是所罗门王式的，其逻辑则让人心碎。

作为回应，北京小幅提高了补偿款的数量，但对其他要求却没有多加理会。（失独补偿计划自 2007 年开始实施，开始相对较晚。目前，失独父母每月能获得 100-300 人民币的补偿款。）

例如，失独父母曾要求建立能够满足其特殊需求的养老院。其中一个理由在于家属探望日。“看到其他人和家人在一起……实在是受不了，”一个失独家长说道。

2014 年，广州的一位立法者提出提案，要求利用社会抚养费为失独父母建立养老院，但是这一倡议却石沉大海。官方回复说，社会抚养费已经被用于现有的政府开销。

#### 四

媒人滕老先生和高护士这样的人让我对中国城市的老龄化多少有了些了解，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严格来说，是故事的 60%。其他住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所面临的现实显然更让人沮丧，因为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从各方面来衡量，中国农村的老龄人口受教育程度都更低，经济条件也更差。另外，他们更容易失去家庭的支持，因为中国目前的这种年龄隔离——老者困于农村、壮劳力居于城市的状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在农村，老年人被虐待的故事时有所闻。农民陈守田的故事就是个例子，他把百岁的老母养在猪圈里，自己住着六间卧室的房子，却跟当地电视台说，他母亲更愿意住在煤渣搭建的单间里，跟老母猪共一个屋檐。还有 94 岁的张喆芳——她以虐待为由，破天荒地将儿女告上法庭。村民称她被锁在小黑屋里，被拧掐、被掌掴，并被逼清倒自己的粪便。她的故事之所以让人心碎，是因为在中国农村，这样的故事已是司空见惯：张患有营养不良、早婚，她的子女也都是高龄老人，处境和她一样艰难，只能靠子女的慷慨艰难度日。

既然如此，在中国整体自杀率迅速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案件却仍日益增多，或许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大多数城镇居民都有养老保险，但农村居民中却只有 25% 有养老保险。很多人必须一直干活到干不动为止。医疗资源稀少，也很不完善。这一点，年逾花甲的赤脚医生肖鹤壁最是了解。赤脚医生出现于中国上世纪 70 年代。他们是一群受过部分专业训练的农村医生，为降低初生婴儿死亡率和防止传染病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中国得以成为最先消灭天花和小儿麻痹的国家之一。但是，1980 年代中国启动市场改革之后，很多公共医疗项目的资金来源被撤销，赤脚医生们就在此列。医疗费用迅速攀升，许多乡村医生都洗手不干了。赤脚医生已经所剩无几，肖鹤壁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她打算一直奋斗到最后一刻。

肖的理由很直白：尽管她在社区里工作已经四十余年，但她不符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如果自己不干了，这四川深山的小地方很难再找到人接替她。

“在我之后，就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来干了。”她说。

我在磐石镇肖鹤壁的诊所里见到了她。诊所旁边是一座矿山，矿山上是摇摇欲坠的悬崖峭壁，下面就是稻田。过去四十年里，肖摸黑在这些陡峭的山崖上来回跋涉，夜间出诊费还不到六块钱。

白天的时候，肖通常都在诊所里。我见到她的那天，她穿着一件带银线的花衬衫，脚上是擦得雪亮的皮鞋，正在给一位流感病人挂吊瓶。诊所的墙上挂着两位中国医圣的画像：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和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

但是肖却几乎不和中药打交道。她药房的一角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柜子，空空如也，布满灰尘。柜子上有百余个小抽屉，都是过去用来储藏草药的。肖说，对于现代需求来说，中草药过于复杂，价格昂贵，见效也太慢。因此，她给病人开的都是玻璃柜里的药：维生素 C 注射液、扑热息痛、盘尼西林和阿莫西林。刚进来的一个新病人就是用的消炎药，她摇着草帽，跟肖抱怨着天气太热。

“这里太热了！至少装个电扇嘛！”病人说道。

肖坐在躺椅的边缘上，闲适地问正在打吊瓶的病人：“你哪里不舒服？”

流感病人睁开眼睛咕哝道：“感冒了。”

肖给第二个病人开了两天的去痛片，把每粒药都整齐地包在白纸里。女病人给了她一张五块钱的人民币，肖找了钱。

过去，赤脚医生最风光的时候，肖给人接生过孩子，正过骨，打过疫苗。但是她已经十多年没给人打过疫苗了，而她现在接生的也只是牲畜了。她的病人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得的病也都是典型的老年病——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痴呆。对于这些疾病，肖并没有受过相关的医疗培训，也不知该如何用药。

2008年，肖的一个亲戚患上癌症，住进了医院。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却没有像医生预计的那样马上死亡。当家里再也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时，他就回家了。每天，肖医生都要爬陡峭的山路去看他两次，她一手撑着油纸伞，一手举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夏季雨水冲刷后泥泞无比的小径上。她一直给病人输液，药液里混合了止痛药和抗生素。为了给病人补水，她还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肖自豪地说，这个病人一直都还活着。

农村居民近几年已被纳入医疗保障，但是报销比例仍然很低。中国的全面医保虽然迟迟未能实现，但其进步已经十分迅速。医保制度于2008年开始推行，同年，针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开始推行。在新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下，磐石镇的居民每年上交70元左右的保险费用。不过，很多磐石居民还是抱怨说，医保的报销比例较低，自费部分偏高。

过去20年里，由于社会主义基础设施逐渐废除，医疗体制已经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且以盈利为目的。相比之下，中国如今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如今，磐石镇的居民都已加入大病补偿保险，只是保险是与他们的户口捆绑在一起的，所以老年人如果想搬到遥远的城市里和儿女一起生活，就很难继续保留自己的医疗保险。另外，对于年迈而贫穷、又住在偏远地区的老人来说，连简单的行动问题都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比如，医生一次最多给你开一到两周的止痛药，所以磐石镇生病的老人们常常要频繁往返于附近的大城市达州。肖说，去达州路上要两个小时，不仅路费昂贵，而且车马劳顿。

肖的诊所每天早上5点就准时开门，夜幕降临后，她开始到病人家里出诊。午夜是她用来写文书的时间，凌晨两点，她才上床休息，就睡在诊所的厢房里。她的三个子女都想让她退休，或者至少工作的时间不要那么严苛。“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她坐在桌子上，很实际地说道。她晃着腿，让自己闪亮的皮鞋引人注目，好像在说：“哦？我‘赤脚’么？”

你可能会认为，像孝顺这种关乎老年人安全的核心观念，在农村居民中应该更强烈，因为他们应该更为传统。但是人类学家阎云翔却说，孝顺的观念本质上已经瓦解了。



阎在中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子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按照他的解释，父母权力的根基是恩情观念——因为父母给了孩子生命，所以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之恩是永远报答不完的。由于村落亲属系统和诸如祖先崇拜之类的宗教仪式，父母的地位也很高。而共产主义和 1980 年代的物质主义基本上已经将这些信仰蚕食殆尽，这也就有了阎所说的“父母身份的去神秘化”。

“人类繁殖是神圣的观点，年轻的村民们已经不再接受了，”他写道。

也许当今父母权力遭到侵蚀的最重大原因是经济性的。继承祖业的前景，总是能够有力地保护老人们不受虐待。但是土地改革和集体化意味着农村老人在死后几乎没有可以留给子女的财富了。

肖说，在磐石，帮忙照顾孙子孙女的老人是最有安全感的。“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有用。他们知道只要自己还能帮忙看孩子，儿女们就会继续给家里寄钱，”她说道。她还听说过有些老人被子女叫到城里帮忙看孩子。“他们过得都很不开心。谁也不认识，城市里环境又脏，”她说，“现在我们的孩子都掌权了；我们什么都不敢说，就怕惹他们生气。过去可不同，你活一天，孩子就得听你一天。”

突然，门铃响了。一个年轻的男孩跑进了诊所里。

“婆婆，婆婆，把柜子开开，”男孩气喘吁吁地说道。

肖打开了一个上着锁的抽屉。

我正猜想这孩子为何这么着急。是被划伤了？还是闹肚子？

男孩在抽屉里摸索了半天，拿出了一根棒棒糖。他递给肖一张皱巴巴的票子。别的孩子也跟了进来，肖开始忙着收钱。我注意到，和装药的柜子不同，装糖的橱子是锁着的。

“呀，你干这么多事情，又能治病又开糖果店呀，”我惊叹道。我本来是想夸赞她，但是她却尴尬地移开了目光。

“我治病人。”她轻轻地说。

## 五

为什么我会将中国老龄化的画面看得如此暗淡呢？毕竟，除了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中国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减轻老龄化过渡的负面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提高退休年龄、改革目前负担过重的养老金体制。这些措施中有一些已经开始实施，或很快就会实施了。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正在迅速成长。2011年，农村养老金计划只覆盖了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到2013年，覆盖范围便已过半，2015年达到四分之三。中国在2009年才开始认真推行医疗改革，但医疗保险体制却快速进步；过去五年，医保的报销比例迅速提高，自负费用明显减少。

尽管如此，前景却仍不容乐观。有两件事可以使衰老不至于太过艰难：一是在你不能继续工作时，能够用金钱换来舒适的生活、支付医疗费用和购买生活必需品；二是家庭，或是家庭的替代品，能够给予感情支持和关怀。这两个资源在当今的中国农村都不可靠。

要让中国的老人有个安稳愉快的晚年，中国的经济必须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满足老年人服务和养老金的需求。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人口的老龄化将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将这种环境比作“加速的自行车，不能停下，否则就会摔倒。”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使得经济增长更加重要，却也更难实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中国三十余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劳动人口的增长每年平均使GDP增长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而到2030年，劳动人口的缩水每年将导致GDP增长率降低0.7个百分点。

而在家庭方面，中国做得太少，也做得太迟。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已经放开为二胎政策，但是婴儿需要时间成长，才能成为劳动力。即便采取了这一重大转变，也无法解决未来20年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大量削减了中国老年人看护者的数量，这种削减不仅是数量上的，还是质量上的。中国目前女性数量偏少，引申开来，也就意味着儿媳妇的数量减少，而中国的儿媳，才是真正负责照顾老人的人。

## 六

昆明也许是中国最适合生活与终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中国南部，接近越南和缅甸，但由于位于海拔两千米的小高原上，因此气候远不像东南亚那样闷热潮湿，更像美国的塔霍湖，冬暖夏凉。这样的高度也使昆明得以远离困扰中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的雾霾污染。在我去过的中国主要城市中，昆明是唯一一个蓝天常在的城市。

马克所在的第三人民医院姑息治疗部因其建立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而著名。这家中国最著名的临终关怀院，1986年初建时只有六张床、两个医生、一个护士。现在它有70个床位，2015年大楼扩建后，床位数量还将翻两番不止。即使以中国标准来衡量，这一数字也颇为惊人。在中国，一家医院能有十张用作临终关怀的病床就很不错了。

然而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临终关怀医院，也只是矮子当中的高个儿。在经济学人智库所创建的临终关怀品质排名中，中国几乎在每一项指标——品质、经济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中，都排名很靠后。

这个临终关怀医院的建筑隐蔽在一家综合性医院中，不起眼，是很方便的伪装。在崇敬福禄的文化中，谈论死亡很不吉利。这导致中国人对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物都万分厌恶：比如，数字4就是中国人的大忌讳，因为“4”与“死”谐音。各地临终关怀医院附近的居民们对医院激烈抗议，不乏事例。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松堂关怀医院附近的居民就在半夜砸碎了医院的窗户，将近百名垂死的病人驱赶到了大街上。

马克身材纤瘦却充满活力，是回族人。（回族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为穆斯林。昆明因为坐落在古丝绸之路，因此有大量的回族居民。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严格遵守穆斯林的风俗——考虑到中国政府近年对穆斯林斋月封斋一类的行为不予鼓励，也许还不如这样。）马克原本是个神经科医生，但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太多了，很难出人头地。”在预见到开拓临终关怀这一领域所包含的机遇后，马克便转行了。声名鹊起后，马克打算公开出版他的日记，将其命名为《在天堂的门口》。

在马克的医院里，有一个房间最接近这扇想象中的门，这就是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位于整栋楼人流密集的位置上，被题名为“蓬莱山”——蓬莱山在中国神学中的地位大约等同于西方的奥林匹斯山。这一传说中的神山上住着不死神仙，无疾无苦，酒食无穷，桃花盛开。

但是，关怀医院的这个蓬莱山却没有仙气。只有一处壁龛，上面供奉着一个几乎可以代表任何宗教的无法辨识的神像。在神龛的两侧，有一副悲哀的对联：

明月清风何其在上？

桃花落水去无踪。

我透过窗凝视，看到了一具身着白衣的尸体。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逝者是一位穆斯林，死后按照回族丧葬习俗，要以白布裹身。在其他时机，“蓬莱山”也可能被用来做道教法事或佛教超度。

这个房间的存在其实并无理由。医院本身已经有一个停尸间，家属可以在那里认领遗体。马克说，“蓬莱山”满足了一种需要。“有时候，我们这里一天就会死一个人，一切都太突然，家属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们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是有很多不同的丧葬习俗，能够让生者安心。”

当然，“蓬莱山”之所以存在，还有个更实际的原因：当地的一家殡仪馆租用了这个房间，成为临终关怀部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中国大多数医院的科室——肿瘤科、儿科及其他，都是营利性实体，其部分收入依赖于所开的处方数量。医务

人员的奖金就是基于此项收入，奖金数额往往能达到或超过他们的基本工资。而对于关怀医院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方面的收入很有限。毕竟，面对身患绝症的病人，也开不出什么能治病的药物。一位行政人员说，他们之所以招揽不到医务人员，这是原因之一。“蓬莱山”能够帮助他们补充资金。

但是，“蓬莱山”还有另一重影响。死亡不再是一个被埋藏起来、不见天日的话题，而终于有了一席之地。

我在和马克以及其他医生和病人的交谈中发现，老人对关乎自己的医疗决定往往做不了主。医生通常会将病人的病况告诉家属，然后让家属自己决定是否告诉病人。如果病人家属希望隐藏或保留某些细节，医生通常会遵从家属的意愿，即使有时候他们并不愿如此。“我们只说善意的谎言，”一位医生告诉我说。

病人的子女能够（并且很多时候也的确会）诱导医生对病人施以其不愿接受或不需要的无效的医疗程序和手术。常住英国的公共健康学者陈红在其对中国癌症患者临终关怀的研究中发现，医生在治疗中“太有侵略性”，采取的措施往往会延长患者的痛苦。

“我曾经有一位直肠癌的病人，”马克有一次告诉我说，“他知道自己大便中有血。他女儿不让我们告诉他他得了癌症。她宁愿父亲不知情，让我们告诉她父亲这只是一般的痔疮。

“过了几个月，病人并没有觉得自己有所好转，还是发现自己大便中有血。老人家很不高兴，觉得我给他进行的治疗是无效的，拒绝再配合治疗。”

在马克的劝说下，女儿终于同意让他将真实的病况告诉给病人。马克说，他当时尽量说得婉转。

“我试图和病人谈谈，想看他是否能够承受这一事实。我跟他说：‘你看，你已经 70 岁了，在这个年龄，很多人都会生病，比如癌症。我之前可能误诊了。你有可能得了癌症。这一点你想过没有？’他回答说：‘没事。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昆明。两个孩子都有工作，有家庭，也都很开心。我对生死已经很通达了。’”

“我不相信他真的通达了。所以第二天，我到他的房间里跟他说我要给他再检查一次。等到第三天，我才告诉他他确实得了癌症。我以为他可能接受得了。但是半小时之后，他就昏迷了。十五天之后才醒来。又过了一个星期就去世了。”

我问马克这一切是否真像他说的那样富于戏剧性。马克坚持说就是这样。他说，发生这样的事，他感到有些惭愧。

“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的工作失败的。”他说。

中国存在这种家属代替病人做主的特殊现象，有几个原因。经济原因是其一：医生听从病人成年子女的意愿，因为账单是他们来付的。中国这一代老人与他们的孩子相比较为贫穷，没能像孩子们一样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而更为忧伤的解释是，到老人临终，平时见不到的孝心才发作起来。“一切都是为了面子”，北京一所医院的一位行政人员说，“孩子必须要表现出自己真的尽力了。所以他们要求医生竭尽所能，即使这意味着进行诸多不必要且痛苦的治疗。”

马克有另一个理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实验创造了一种物质主义文化。“在当今中国，我们都变成了物质主义的信徒；不是我，但其他人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死亡教育。物质主义者只相信自己能够看到的，否认肉眼看不到的。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马克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中国文化的确避讳谈论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我们没有四楼，没有十四楼，有时候为了表示对西方迷信的认可，也没有十三楼。坐电梯的时候，这会让人十分困惑。我们不喜欢旧衣古着，不喜欢白花，不喜欢送钟，不喜欢一切与死亡和霉运有关的东西。用马克的话说，这些做法都妨碍了我们得到“死亡教育”。在我们家里，一提到死就会被一句简练的“啐！”制止，粤语中也就是闭嘴的意思。

但我觉得，这种憎恶已经超越了物质主义文化，其根源在于中国对死后之事的信仰体系。粗略地说，大多数中国汉族人的信仰都是道教、佛教和儒教的混合，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的成分。大致而言，这就造成了人们对死后的世界有一种这样的视景：你仍然需要用到钱和各种物质舒适品，仍然会遇到官僚制度和等级制度，仍然会踏上一个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重生的循环。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不同，中国的宗教中并没有永远安息这一让人感到安慰的观念。

在北京，要一窥道教眼中的死后世界，最好的去处之一就是东岳庙。800余年来，东岳庙一直岿然不动，即便它周围的胡同都已经在摩天大楼的攻击下瓦解了。

东岳庙有很多殿堂，每个殿里都有描绘地府场面的熟石膏雕塑。每个殿都代表着地府的一个司署，共同构成了一副官僚体制继续存在的严酷画面。在那里，死去的人将以其生前所为而受到审判，还要取悦无数超自然的神明。

在冥间，不仅有负责签名的勾生死司，还有负责签署文件的督签押司；有根据生前之事决定个人命运的生死勾勒推勘司，还有负责罚没财产的掠剩财务司、负责审查错误控诉的督察司、负责控制盗窃的贼盗司和负责保护环境的飞禽司。谁能试想保护自然在地府也是件重要的事情呢？还有我最喜欢的十五种恶死司。（唯一让我困惑的是，我不知道死后之死有什么意义。）而每种恶死法，都被以红漆和石膏描绘，极尽血腥之能事。

冥间被描述得如此让人生畏，难怪中国人谈死色变，拼了命也要活久一点。就像中国一句老话所说的：好死不如偷生。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把他的遗体隆重之停放在阳台上，棺材用干冰包裹。吊客的第一站就是接待前台。在那里，亲人们抱着一本厚重的册子，写下吊客所贡献的“白金”数量——用白信封包起来的、资助葬礼的礼金。我们这些逝者的女眷们，头上都带着用白色麻布和别针夹成的帽子，烧些纸钱，让父亲在阴间能有钱过得舒适些。

每年清明节和重阳节，我们都会去安置父亲骨灰的地方祭奠他。我们在那里烧纸钱，弄出更多的灰来。冥币都是能在宗教用品店买到的，一沓沓纸币上面当真都印着“地府银行”和“法币”的字样，当然，上面还印着道教天堂之主——玉皇大帝的图像。

除了祭奠祖先的节日外，我们还庆祝七月中元节。每当这鬼月到来时，我们不光会为自家亲人，还会为所有魂灵都献上祭品。人们相信，在鬼月，地狱之门大开，所有鬼魂都能在人间游荡觅食。这些不幸的鬼魂，已经无人再去祭奠了。

因此鬼月充斥着迷信。没人愿意在鬼月结婚或者开张生意。我小的时候，十分喜欢在鬼月前的几周和母亲去各个宗教用品店闲逛，因为那里总会有各种纸糊的房子、汽车和人物，看起来和玩具一模一样。我总是很想去触摸和摆弄这些玩意儿，但从不被允许，因为这会招来厄运。

给死人用的祭品也是与时俱进的：我曾经见过纸做的LV手袋、纸做的iPhone，当然，还有地府的万能附属品——纸质的美国运通黑金信用卡。2006年，中国民政部部长甚至不辞劳苦地禁止了“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的燃烧，其中就包括纸制的伟哥、豪华别墅和卡拉OK女服务员。

这一切都表明，虽然大多数宗教和文化体系都强调说，万事万物皆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是中国人还是与众不同地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带走的，只要你有后人，且越多越好。如果你死而无后，那就是断子绝孙。这可是对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之一，因为这意味着你将永生都是一个饿鬼。

## 七

昆明的临终关怀医院里有种味道，总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集体宿舍生活：猪骨汤味混合着泡面味，还有厕所里偶尔飘出的一缕尿味，夹杂着烟味。

病人是两个人住一间。因为没有淋浴，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只能擦身，或者如果手脚还灵活的话，就回家洗澡。病床之间的过道很狭窄，只够一个人侧身挤过去。

为了弥补房间空间的狭小，楼层里有很多大的集中休息区，摆放着筏状的木头椅子和沙发，沙发上的塑料膜已有所剥落。装过食品的小罐头被洗净了标签，当作烟灰缸使用。住院者和访客在这里盘桓、抽烟、缝补，或是打电话聊天。

在其中一间休息室，我看到了正在安静地在鞋底上绣花的李嘉艺。李的母亲因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病情转重，过去七个月一直住在这里。

嘉艺三十五岁，乌黑的长发如云般泻下，安详的脸脂粉不施。她身旁是五岁的女儿清溪一个迷人的小机灵鬼，笑起来还露着小豁牙。她发辫上戴着一顶小巧的皇冠。母女俩是这里最年轻的常客。

嘉艺已有四个月的身孕，肚子上的第二个孩子是在最近“单独”政策改革之后怀上的。当时，独生子女政策刚放宽，夫妻中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

“有时，我的朋友会问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生二胎呢？’但是我觉得照顾老人确实压力很大。单凭社区的支持是不够的。邻居们都不像我小时候那样互帮互助了。这孩子，”她说着，轻轻朝自己爱叽喳的女儿指了指，“以后自己一个人会很不容易。”

嘉艺的母亲八年前被诊断为患有帕金森症。帕金森症是一种无法治疗的神经系统综合症，中国目前患者的总数为世界患病总人口的40%以上，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近60%。患病人数如此之多，而中国却还没来得及给它一个本土化的名称，只是将其音译为“帕金森”。

最初病情尚可控制。嘉艺的父母帮她看孩子，每天傍晚都去幼儿园接清溪，帮忙做晚饭。孩子学会了在姥姥平衡能力变差之后握着姥姥的手支撑她。后来，嘉艺的母亲开始摔倒。他们住在一栋七层楼房的三楼，没有电梯。为了安全，母亲开始整日卧床，听申曲、看电视剧。

2013年冬天，嘉艺的母亲双腿已经无法再移动，上厕所已经需要别人抬着她去，她长了褥疮。嘉艺七十八岁的老父亲已经无法再面对这一切。他们看了几家养老院和医院，最后来到了昆明第三人民医院，因为这里开销最少。每个月费用大约18,000元，90%都是医保可以报销的。而其他选择，比如私立养老院等，每月花费都要四五万，且医保不能报销。而且，每个地方都要排上几个月的队才能住进去。

嘉艺手上飞针走线，说道：“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很多人父母也都生病了，却没有这样的地方，或者不知道有这种地方。”

嘉艺是在父母单位的家属大院里长大的，在她的记忆中，那是一种田园般的环境。她知道那样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在我们谈起她生二胎的原因时，她频繁地提到，城市化和现代化破坏了原来邻里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家庭规模的迅速缩小，嘉艺也颇有怨言。她父母家里都各有六个兄弟姐妹，丈夫国宝家有五个孩子。

需要说明的是，中文对家庭关系的定义都很明确，有无数个代指不同血缘关系的词语。比如，“uncle”从不只是“uncle”：如果他是你父亲的哥哥，那就应该称为伯父；如果他是你父亲的弟弟，那就是叔叔；如果是妈妈的哥哥就叫舅舅。对于嘉艺还未出世的第二个孩子来说，清溪也永远不只是“sister”，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词。清溪永远都是姐姐，而不是妹妹。她的身份已经是固定的了。

中文对个人在家庭长幼次序中固定位置的强调，说明了中国对长幼和家庭结构的重视。但是，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正在逐渐瓦解。等到清溪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不少这些称呼和关系就要成为尘封的历史了。

周末的时候，我再次见到了嘉艺。她给母亲带了一些鸡蛋羹。医院里的饭大都是汤和粥，她觉得不够营养。她用勺子盛着嫩黄鲜滑的蛋羹，送到母亲毫无反应的口中。

她母亲极瘦小的身躯在一床床厚厚的毯子下面，双眼呆滞地徘徊在原来曾经放过电视的地方。母亲刚住进来的时候，嘉艺给她在床尾装了一台电视，让她能够继续看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可是不久之后，嘉艺的母亲对外界的刺激就没有了反应。

“那就看不了电视了。”嘉艺耸了耸肩说。

那天，嘉艺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只能依稀看出腹部微隆。

她说，母亲病的这几年对她来说很艰难。“我父亲岁数太大了，就只靠我一个人，”嘉艺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和我一样。她的弟弟或者妹妹会比我们活得都久，这可能会是她在世间最长久的亲情。”

过去几年里，由于要在家和医院之间经常往返，还要照顾孩子，嘉艺已经力不从心。她开始掉头发，开始冲清溪发脾气。最后，她决定辞职。靠着自己的积蓄和丈夫的工资，她盘算着自己两年内不工作应该无妨。之后怎么办？她耸耸肩，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嘉艺还是相信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必要的。“人口数量大，社会福利很难推行。”接着，她又补充了几乎每个中国人在被我问及计划生育政策时都会提到的话：人太多。

嘉艺的态度对于很多不在中国的人来说可能都显得很奇怪，但是事实上，很多中国城市居民都支持计划生育政策，这一点，如果你曾在中国生活过，曾经在拥挤的地铁上和无数人一起抢过座位，曾经为了上重点学校而削尖了脑袋，也许才更容易明白。



然而，当我问到嘉艺是否支持计生委干部采取的一些方法，比如强制流产的时候，她本能地用手护住了小腹。“当然不支持，”她说，“强迫永远都是不对的，那些人太坏了。”

嘉艺读高中时班上有 30 个人。她说，只有四五个人后来生了二胎。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当了公务员。如果违反生育政策，很可能会丢饭碗。

“现在，我觉得我很多朋友都羡慕我。”她说道。

清溪爬到她的大腿上，开始轻轻地咬妈妈的胳膊。

嘉艺温柔地和孩子嬉闹着，曼声婉转地说：“谁来照顾妈妈呀？你会照顾妈妈吗？”

清溪英勇地趴在那未出世的小宝宝身上，点了点头。

## 八 红线断了

中国保证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不管这一过程可能有多么漫长和费力，在程序的最后，我们一定会有个孩子。没人可以夺走她。

——杰夫·甘米奇，《中国幽灵》

—

如果你从中国收养了一个孩子，你如何寻找孩子的根呢？

布赖恩·史岱（Brian Stuy）认为他知道答案。五十几岁的史岱有着浓密的白发，像个表演者一样娴于把握时机。一个周日的早晨，史岱问候着一小群陆续进入米尼苏达州圣保罗教堂的家长们。“你们是美国收养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他说，“大多数家庭并不在乎，所以谢谢你们至少来了。”

史岱在收养群体中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并不喜欢这个前摩门教徒对中国收养体系内部腐败的讨伐。对于很多相信自己做了善事的父母来说，史岱这一无法充耳不闻的声明让他很不讨喜。“当心布赖恩·史岱，”一个我认识的收养了一名中国孩子的记者说，“招上他会引火烧身的。”

有些人指责史岱虚伪。他收养了三个中国女儿，为何现在又来批评这个项目？其他人指责他从自己的指控中受益，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如此。自 2002 年起，史岱和其生于中国的妻子兰共同经营的小型机构“调研中国”（Research-China）便专门致力于被收养的中国儿童的背景调查。

史岱扫了一眼房间，宣布他将公布一系列他认为涉入儿童贩卖的孤儿院的名称。“我已经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在名单上看到自己领养孩子的孤儿院，”他警告说，“但这不是对你们个人的指摘。”

屏幕上闪过一页页名字。坐在我旁边的海瑟·波尔咬住了嘴唇。她女儿来自的福利院在名单上。她怔了一会儿接受这消息，耸了耸肩，然后悲伤地说：“有什么办法呢？”

中国的收养热潮，是如大多数人所信的那样，是一场挽救了数千被遗弃儿童（大多是女孩），使其远离贫困和福利院生活的无私行动，还是实际上由政府认可甚至支持的跨国婴儿买卖？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约有 12 万儿童被国际家庭收养。

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一副产品，是它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一面，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对种族、家庭和国际收养伦理的态度。

在收养业界，对健康幼龄儿童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中国收养被认为是黄金标准，或者说一度被认为如此。中国几乎拥有养父母所寻求的一切：大量的健康幼儿，收养流程由政府运作，流程简化，且相对包容广泛。中国的海外收养计划最初开始时，单身人士、退休人士乃至同性伴侣都是符合条件的收养人，这在其他地方十分罕见。

独生子女政策为整个收养流程注入了道德价值：外界认为这些女孩是父母不想要的、主动遗弃的。中国的孤儿院人满为患，条件也很糟糕。收养儿童的家长相信，中国是一系列可供考虑的选择中最合乎伦理的选择。与从危地马拉或埃塞俄比亚收养不同，从中国收养孩子不会被指责为买婴，或是剥削孩子贫困的生父母。

自中国政府 1992 年开放孤儿院的跨国收养后，收养人数的增长令人目眩。到 2005 年顶峰时期，美国人每年要收养将近 8000 名中国儿童。即使是现在，可收养婴儿的供给大幅度减少，中国也依然是世界最大的领养儿童来源国，2014 年有超过 2000 名儿童被美国人领养。这一数量是居于第二位的领养儿童来源国埃塞俄比亚的近三倍。

这种喜气洋洋的局面在 2005 年陡然改变——当年有六家湖南的孤儿院（部分西方收养机构最大的供给者）被指控进行婴儿买卖。中国官方起初否认这些报告，但最终因工人段月能及其家人贩卖 85 名婴儿而将他们监禁。段的母亲（一位孤儿院护工）称，起初她每找到一个弃婴，就会获得几十块钱的补贴。但是，对弃婴的需求迅速攀升，因为每完成一个跨国领养，孤儿院就能获得三千美金，这还不算那些感激的父母给孤儿院的捐款。

“孤儿院要求获得更多婴儿，开出了每个婴儿 700 元的价格，后来涨到 1500 元，到 2005 年涨到了 3000 元，”段母说。段家用奶粉箱走私婴儿，每次走私四个，都是从一千公里以外的广东坐火车运到湖南。

在刑满释放之后，段告诉《Marketplace》的记者司各特·佟（Scott Tong）说，他的贩卖活动范围比此前媒体报道的要大得多。

他给佟看了记录，记录表明他曾贩卖过 1000 多名婴儿。段说，这些孤儿院给每个被贩卖的婴儿都在外国收养文件上造假。“我看到过的文件中，至少有一个孩子被美国家庭收养，”佟告诉我。

中国官方说湖南的事件只是个例，但是 2009 年，又一个丑闻曝光。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次，广东计生委干部被曝曾抓走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超生儿童并将其卖给孤儿院。2011 年，新闻杂志《财新》报道了一个相似的案件。根据该杂志报道，这些被贩卖儿童中有一些最终被美国和荷兰家庭收养。

其他发生在贵州省和陕西省的儿童贩卖案件也给整个收养流程增添了一些疑问。

没有可靠的方式可以计算这种违法行为的范围有多广。在这一流程中受益最多的各方，从中国政府到各个领养中介机构，再到领养的父母，都坚称这些案件只是个例。

总部位于美国圣路易斯的收养机构“儿童希望”的中国收养程序负责人梅洛迪·张（Melody Zhang）承认，中国的收养系统的确有缺陷，但她指出，这一系统挽救了很多本来会在中国的福利院中夭折的孩子。张说：“真的，刚开始的时候福利院条件特别差。”放开中国的国际领养市场也带来了更多的西方支持，显著改善了孤儿院的条件。例如，位于伯克利的半边天基金会十五年间为中国孤儿院投入了 5600 多万美金，用于改善孤儿院环境。

但是，并非所有领养机构的负责人都这么乐观。2009 年，荷兰最大的收养机构“世界儿童组织”的负责人伊娜·哈特（Ina Hut）为抗议湖南的丑闻辞职。湖南的故事让她十分不安，要求中国和荷兰政府给出回应，但最终未果。2007 年，她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

伊娜离开时确信，购买婴儿的做法“范围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广得多。”领养业内的线人告诉她，助产士收钱负责帮忙寻找超生的婴儿，并在他们出生前就把他们订下来。另外，孤儿院对被收养儿童其实了解很多，只是他们不会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中国收养中心或者领养父母。她说，中国官方曾私下告诉她，在湖南的贩卖丑闻中，有至少两名儿童最终被荷兰家庭收养。但是，伊娜无法让荷兰政府或北京政府继续进行调查。“在政府看来，一切都已经一了百了了。”

伊娜不像是个斗士。她一头金发，言语温婉，古铜色的脸上笑纹如阳光绽放。她以前是个成功的软件企业家，又在一所大学做过行政人员，2012 年才加入世界儿童组织。那之前不久，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夭折，这段痛苦的经历让她决定“下一步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她说。

伊娜说，她最初打算领养，但是，在亲身见识了领养的内部运作后，她把自己的名字从待领养名单上勾销。“当我看到幕后时，我很震惊。我渐渐发现，很多领养是以父母而不是孩子的利益为中心的。每个人都有权要孩子，但你无权支配孩子。是孩子有权得到父母。”

伊娜公开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并为自己的坦诚付出了代价。自 2009 年辞职后，她五年内一直没有再工作。她认为，雇主都被她检举者的名声吓跑了。最终，2014 年，她被任命为一家帮助拐卖受害人的荷兰非营利性组织 CoMensha 的总干事。

在领养业界，国内领养理论上是有优先权的。黑格领养公约把它列入最佳操作加以推崇，并将其称为调适原则。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之一。独生子女政策对这一原则是一种嘲讽。为了防止人们把自己的超生子女伪装为收养子女，中国的收养法明确歧视本土的收养父母。对他们来说，收养孩子的门槛要高很多。例如，1992 年，外国收养人的最低年龄是 30 岁，而国内收养人则为 35 岁。另外，被

收养儿童也算在父母的生育指标之内，意味着很多收养了孩子的中国人不能再生育自己的孩子。

像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大卫·斯莫林一样的伦理研究者说，黑格领养公约所支持的一些理想化观点经常被违反。汉普郡学院亚洲研究处主任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说的则更直白。

约翰逊和我讨论着中国儿童贩卖的问题时，忽然突兀地说：“什么是买家？从中国收养过孩子的都是买家，”她这样说也包括了自已。约翰逊 20 世纪 90 年代时从中国收养了一个女儿，当时，她对中国的领养情况还所知甚少，以为国内领养无法解决孤儿院里越来越人满为患的情况。自那之后，她慢慢发现，很多国内的收养行为都被不公正地认定为儿童贩卖，因为在不规范的系统中，欲收养的父母必须给中间人一笔费用才能成事。相比之下，西方的养父母，比如她自己，尽管是通过政府规范的系统收养，但需要出的费用更高。“为什么我们就被认为是‘收养人’，而他们却被诋毁为‘买家’？”她质问道。（尽管中国民政部收养事务中心管理中国以外的收养事务，但是似乎却没有相同的机构来处理国内收养。很多我曾经采访过的中国养父母都说，他们的领养主要是通过私下的关系和网络实现的。）

约翰逊目前是这一系统的严厉批评者，她认为，中国对国内收养的歧视强化了“中国女孩不受重视”这一迷思。她坚持，很多待收养的女孩本来可以在国内找到幸福的家庭。

我所接触过的对跨国领养持最严厉批评态度的人中，几乎所有都是跨国领养人，是他们口中那个漏洞重重的系统的受益者。史岱承认了这种矛盾的情况：“上了贼船才能知道别人是贼。”他说，“我认为 95% 的养父母都不愿知道真相，就算他们知道了，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毕竟，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 二

史岱生于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1995 年他 36 岁，生活在犹他州一个叫李海的小镇。1984 年的电影《浑身是劲》(*Footloose*) 所描绘的保守的、禁止舞蹈的小镇，正是拍摄于李海。和许多年轻的摩门教徒一样，他在德国执行了两年海外任务。从杨百翰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他从事了一系列办公室工作，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备受打击。“我不喜欢当作轮子上的一个齿轮，一生都只有工作，直到最后告老还乡。第二天，生意没了你还是照常运转，”他说，“少了你和没少一样。”

史岱已经准备好迎接生活中新的目标和使命，这时，恰好他当时的妻子吉宁从教堂回来，建议他们领养一个中国孤儿。当时，社会上到处都流传着中国由于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而满是被遗弃女婴的故事。那之前两年，BBC 播出了备受争议的纪

录片《濒死的房间》，片中详细记述了中国孤儿院不人道且残忍的做法。其后的一份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将中国的孤儿院描述为不过是婴儿被送去等死的地方。

作为人口零增长运动的坚定信仰者，史岱欣然接受了妻子的建议。1977年，他们从中国带回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女婴，给她取名为Meikina。“Mei”是取中文“美”之意，而Kina是夏威夷语中“来自中国”之意。三年后，一群养父母为之前收养Meikina的孤儿院筹集了一笔用于购置新冰箱的资金，史岱主动要求要把这笔钱送到中国去。

在中国的时候，史岱遇到了孤儿院记录在册的捡到Meikina的两个女人之一。据史岱说，这个女人向他十分详细地描述了那段经历。

“一天早上，她正走在上班的路上，听见喧闹的人群中有一个婴儿在哭泣。她走上前去查探了一番，发现一个纸箱，里面装着一个幼小的、出生仅两日的女婴。在她的描述中，婴儿穿着‘农村的衣服’，旁边放着一个空奶瓶，还有部分现金和一张写有孩子生日的红纸。”

史岱发现的这些详尽的细节让他激动万分。对他来说，这意味着Meikina是被生母遗弃在路边的，生母还为她留了些钱和衣物。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民政局附近Meikina被发现的地方，试图在脑海中还原当时的场景：哭泣的婴儿，那感到难以置信的路人，躲在暗处默默窥视的悲痛的母亲。他说，这是一段“神奇”的经历，在给收养小组里的其他家长的信件中，史岱充满激情地提起这段经历。

很多中国被领养儿童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来历都只得到了只言片语。史岱的经历激发了很多人共有的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渴望。有几个家长回信给他，向他寻求帮助。约有30个家庭每家出了135美元的费用，以便史岱可以回到中国。这就是史岱的公司“调研中国”的来历。

回头想想Meikina被发现的故事，史岱笑了。“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对此深信不疑。”

十年后，兰·史岱找到了另一位记录在案的捡到Meikina的女人。兰说，女人不情愿地承认，整件事都是她编造的。“她充满歉意。她说她只是同意写上自己的名字帮助收养。她其实没有发现过什么孩子。”她说。

这是史岱常常提到的觉醒时刻。在圣保罗，他讽刺地对听众说道：“我意识到她可能是孤儿院找来的托儿。他们说不定告诉她：‘让这个男人感觉好点，’他说完停了一下。听众都笑了。“她也是的确是这么做的。十年里，我都感觉棒极了。”

2000年，在领养第二个孩子的手续过程中，史岱和吉宁的婚姻破裂了。史岱说，他脱离摩门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他以单身父亲的身份坚持领养了第二个孩子，并给她取名为Meigon。

和大多数美国收养人一样，史岱此行的第一站是广州。广州沙面岛是美国领事馆受理领养签证的地方。沙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沙堤岛屿，坐落着气派堂堂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里是外国人的聚居区。

后来，沙面岛获得了一个不同的名声——它成了美国人领养的始发站。沙面的五星级白天鹅宾馆，镶满玻璃，风景壮阔，鸟瞰着泥泞的珠江，被戏称为白鹤宾馆。宾馆接待的领养家庭如此之多，干脆把整整三层客房都专门指定为收养家庭专用，并给每个来居住的家庭都赠送了一个限量版美泰儿娃娃——“回家芭比”，一个抱着中国宝宝的金发主妇。（日前，这些芭比在 eBay 上要价高达 300 美金）。

新爸爸史岱带着 Meigon 来到了沙面岛上无数小门店中一家卖 T 恤和丝绸服装的店里，许多衣服都是粉色的。在那里，他遇见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兰。

兰是个肤色黝黑的女人，面容精致，手指纤长而优雅。她卖一些小玩意儿，也给那些即将成为美国公民的小宝宝画钢笔画像。史岱委托她给自己的一个女儿画一副画像，兰花了几个月才完成。在这期间，他们开始用邮件互相联系。

同年晚些时候，史岱再次回到了广州，他想见见兰，也想查找更多关于 Meigon 的信息。在领养 Meigon 的过程中，史岱在交各种费用和捐款时注意到他收到了一张 420 元的缴费单，上面写着“弃婴公告”。

他发现，凡是要送交跨国领养的儿童，孤儿院必须为其在报纸上刊登此类弃婴公告。在回广州的路上，他试图寻找更多线索。在走访了许多家区域性的报纸后，他和兰发现了一家刊登此类公告的小报，报社有整整一个房间的旧报纸库存，史岱最终找到了 Meigon 的弃婴公告。广告上列名了 Meigon 被发现的地点，还有最重要的，一张他此前从未见过的 Meigon 四个月大时的照片。

这些公告成了“调研中国”的生意。史岱和兰于 2004 年结为夫妻，之后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内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购买此类报纸。他们把这些广告卖给美国和欧洲的家庭，中间赚取一大笔费用，每条广告售价高达 75 美元。“最初的几年我们获利颇丰，”他说。夫妇俩又收养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Meilon。

到 2004 年，“调研中国”的业务已经逐渐拓展，根据客户要求为其提供不同孤儿院的报告和分析。史岱夫妇在制作这些材料时，仍是依赖于此前搜集到的公告，利用公告上列出的信息——弃婴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发现地点等来得出结论，揭示模式。

在圣保罗，史岱提供了他调研结果的一个样本，其中含有大量的图表和表格。史岱认为，正常的、不涉及婴儿买卖的中国孤儿院收到的弃婴，在年龄、性别、健康程度和被发现地点上都有很大不同。

对湖南六家涉及婴儿买卖的孤儿院的数据追溯分析表明，这些孤儿院的数据都有不正常特征：他们都声称找到的弃婴大多为女婴，大都年龄很小，且发现的地点只有固定的几个。前两个特点意味着这是市场需求，而不是随机的发现。后一个

特点表明孤儿院的负责人懒得充分掩盖自己的罪证。根据史岱的说法，在五年的时间里，这六家孤儿院声称，在 2202 名弃婴中，只有 17 名男婴。其中，长宁的一家孤儿院说，曾在两个地点先后发现过近 40% 的弃婴。通过对这些弃婴公告的研究，史岱相信，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孤儿院都有买婴行为。这对任何领养父母来说都不是个好消息。

史岱在回应一个在场听众的提问时说，就连有残疾的儿童都不能完全脱离干系。一个穿着棕色衬衫的女人正准备领养一名中国残疾儿童。这些孩子总该是父母不想要的、被遗弃的吧？她问道。史岱犹豫地说：“我不能说残疾儿童就没事了。我们发现这里面的花招多得很。”

根据他的数字，中国的孤儿院称，2000 至 2005 年间，孤儿院几乎没有捡到有残疾的弃婴。而如今，他们几乎占了所有弃婴数量的一半。2005 年是中国领养的拐点，此年湖南孤儿院丑闻被曝出后，可收养儿童的数量迅速下降。

“这是否意味着 2005 年之前，有残疾的儿童只是更早就夭折了呢？”史岱问道，“还是说 2005 年之后，孤儿院意识到这些儿童也是可以收养的，所以转而在这上面投资？”

接着，他补充了他的回答，让这位提问的女士多少有些如获大赦。残疾儿童在中国被认为是不祥的，他们几乎没有未来。他说，即使这些孩子是被买来的，他也很难去谴责收养这些孩子的行为。

史岱的说法很难验证。我不认识其他正在独立分析中国孤儿院人口数据的人。史岱的数据大多来自那些刊登在报纸上的“弃婴公告”，而这些数据很可能是不完整的。他的数据并未包括孤儿院里那些未进入涉外领养项目的儿童，他们没有弃婴公告。史岱承认了这些缺陷。“我很希望有其他人独立调查这件事。我只是起了个头。但是，中国国内曝出的一次又一次贩卖婴儿的丑闻不断验证了我们的评估。”

法学教授大卫·斯莫林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人们梦想中的那个合乎道德的、拥有无数健康幼龄儿童和大龄儿童的领养来源国了，”史岱的调查“是美梦破碎后让人胆寒的剖析。即使没人相信史岱的说法，这些数字和故事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 三

领养了中国儿童的西方家庭担心这些孩子将如何适应白人占多数的生活环境。他们的女儿们知道自己因为性别原因被抛弃，将会如何面对这件事？这一切会不会制造疏离和隔阂？

家长们向第一批亚洲被收养儿童寻求答案。自 20 世纪六十年代起，约有 20 万韩国儿童（同样大多为女孩）被美国家庭收养。一些被收养的韩国儿童表现出强烈



的愤怒，原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很少或几乎没有接触过与自己故土有关的文化知识。他们对收养他们的家庭使用“色盲”的方式来养育他们充满了怨言，这让他们在遭遇种族歧视时措手不及。

1966年，《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朱丽亚·明·盖尔之谜》的文章，提示了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所面临的问题。文中描述了一位被白人父母收养的24岁台湾女孩朱丽亚·明·盖尔。尽管收养她的白人父母是会讲中文的学者，但朱丽亚长大后却几乎不会讲普通话，并对自己的白人兄弟姐妹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在她眼中，自己就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白人。“我想我过去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变成白人，”文中引用朱丽亚的话说道。

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试图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加入中国元素，以此来给孩子打预防针，帮他们更好地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是一种文化“创可贴”。“中国儿童家庭”组织（FCC）成为了在全美拥有一千多个分会的强大实体。每年，美国国内的FCC都会围绕中国文化事件计划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庆祝活动、中秋节、汉语课等。

当然，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迫切希望提升国家软实力也对此有所帮助。很多此类活动都是由孔子学院赞助的（这是中国教育部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臂膀）。北京精明地看准了这一公共外交的机遇，也开始为被收养儿童及其家庭赞助一些“回家”之旅。

这样做收效如何呢？被收养儿童中几乎没人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总是会有些不自在。有些专家说，主要的益处是心理上的，可以让被收养的孩子们安心，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同之处是能够被包容和接纳的。

并不是所有的被收养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善意。“别人都说，‘你真幸运，两种文化都对你敞开大门。’但我们中很多人感觉恰恰相反，觉得自己是游离于两种文化之外，”被收养的格蕾斯·牛顿说道，“我感觉我全身上下都刻着文化的缺口。”

很多我曾采访过的被收养人都表达过自己矛盾的感受。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制度的受益者——这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他们充满爱而富足的家。但是，很多人同时也希望别人能够认可自己在被收养过程中承受的损失，这一欲求可能会引来与养父母之间的冲突。

格蕾斯最初意识到这些恼人的问题，是因为大学期间上了一门跨国领养的课程。她母亲说，她希望格蕾斯上了这门课之后，不会“觉得我们是‘白人帝国主义殖民者。’”这话说的是玩笑，但又不是。”

在听到有关儿童拐骗和贩卖的内容后，格蕾斯总会哭着给母亲打电话。这在母女间制造了裂缝。“我父母收养我，本来是觉得这是件好事，是道德的。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格蕾斯说。在课程快结束时，她和母亲言归于好，但“母亲看到我想法的变化，看到我质疑让我们一家人走到一起的这一制度，心里很不是滋味。”

课程快结束时，格蕾斯说，她母亲“意识到了我对收养行为的谴责不是针对他们的。”

格蕾斯与其他被收养人发出了相同的感慨，她说：“当你心爱的人死去时，虽然很痛苦，但你能够留住关于她 / 他的记忆。领养则不同，你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因为大多数被收养人的生父母都在茫茫人海中，无处可寻。你总是会去想：他们会想起我吗？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我的生活原本会是什么样的？”

和韩国的被领养儿童一样，中国被领养儿童在长大后可能会有更多人探寻自己的身世。也许，他们甚至会像韩国被收养儿童一样成为一股政治或社会力量——韩国被领养人成功劝说韩国政府为其提供了双重公民身份，并公开了尘封的收养记录。

目前，中国被收养人中只有小部分人有兴趣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到二十岁，还面临着读高中、读大学、谈恋爱的问题。（专家说，被收养人的寻根意愿通常在两个时期达到高峰：一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二是自己做父母之后。）区别是，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强大的新工具：DNA 检测。这是一把威力无穷的双刃剑，有潜力在中国十几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帮助他们找到亲生父母。

我曾跟随史岱夫妇亲眼见过一些有意思的可能。史岱夫妇在圣保罗期间，曾遇见过一个女人。（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或故事的更多细节，因此我暂且称她为简）。几周前，简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写信的人说自己是代人写信，被代笔人说自己是简的养女的生父，为了躲避超生的惩罚，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福利院。我见到了这封信，信中写道：“我的叔叔和他的妻子过去 14 年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女儿。”他们从一个“政府里认识的人”那儿得到了简的地址。

简将一份 DNA 检测样本寄回了中国。究竟要不要告诉女儿，简痛苦万分。最后，她决定缄口不言，因为女儿正在经历青春期，情绪波动很大，对了解自己在中国的来历“没有任何兴趣”。简编造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以庆祝世界 DNA 日的名义取得了全家包括女儿在内所有人的 DNA，女儿对此丝毫未起疑心。“谁能想到世界上还真有这个节日呢？”她笑着说。后来，检测结果证明两组 DNA 并不匹配。

两年前，史岱夫妇开始使用 DNA 检测寻找生父母。首先，他们找到一个“热点”，也就是报道有儿童贩卖行为的孤儿院。史岱夫妇会联系一些零零散散的曾在该孤儿院收养过孩子的父母。如果他们能把这些人凑成一个小队，就会在当地进行调研，采访养父母及该区域的孤儿院工作人员，收集 DNA 样本。养父母们起初支付 275 美元的费用，如果史岱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母，再交 200 美元。史岱夫妇说，他们已进行了五到六次此类调查，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十二对亲生父母。兰说，据她所知，只有三四个收养家庭主动联系了这些生父母。其他人估计都收存起这条未知祸福的信息，静观将来。

目前，史岱夫妇正在创建一个小型的 DNA 样本库，将收集到的中国人的 DNA 样本寄到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大型 DNA 研究所。“我们过去只是从这些父母处收集 DNA 检测样本，如果最后检测出他们不是孩子的生父母，检测就白白浪费了，”史岱说，“后来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不把这些样本存起来呢？说不定某时某刻，美国有个姑娘也在寻找自己的父母。也许她能找到和自己相配的 DNA。“每个样本的花费不到 100 美元，样本采集和检测的费用都是史岱夫妇用捐款支付的。

虽然越来越多针对中国领养系统不规范性的质疑的确让史岱夫妇的生意从中受益，但他们似乎赚得并不多。记录显示，“调研中国”的博客目前约有一千名订阅用户，每人交 20 美元年费。公司同时还提供一些小型服务，比如兰的素描画、DVD、孤儿院照片和翻译服务等。除了兰以外，调研中国没有全职工作人员。史岱自己去年又回到了全职工作状态，这样家人才有更好的保险覆盖。“我已经厌倦了每天摇旗呐喊的日子，”史岱说。

#### 四

2011 年，调查性杂志《财新》报道了湖南计生委干部绑架独生子女政策超生儿童的故事。这些儿童最终进入了邵阳市孤儿院，其中部分被海外收养人领养。四年后，我见到了其中一些被偷走儿童的父母。

这些诱拐行为都有某些相似之处。所有父母当时都在外地，把孩子交给祖父母照看，自己在遥远的城里日夜辛勤工作。所有被抓走孩子的出生登记都不合法。他们大都是政策外超生的婴儿，或是非婚生，这让他们成了理所当然的目标。确实，在中国法律下，这些孩子被抓走算不算是犯罪都不好说。自然，涉事的干部都没有面临刑事指控，尽管有的人被降职或调离。我采访过的中国其他地区的计生委干部说，他们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追究责任。

杨立兵的孩子是个叫玲的胖胖的姑娘。她是杨的私生女。2004 年，杨 40 岁，带着陈志美——他还未满二十的怀了孕的女朋友回了家。他们不能结婚，因为陈还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陈母的反也是一个原因。“她抱怨说，他比我还大一岁呢！”杨回忆说，他眼神疲惫，颧骨高耸，两腮峭壁一般深陷。

玲出生后，他们把她留给杨的父母照看，两人去南方工业城市找工作了。在离开前，他们凑足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中的杨坐在春日盛开的殷红鲜花前，仿佛年轻了二十岁。坐在他腿上的宝宝玲像一个米其林轮胎的小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连胳膊都难以贴身放下。她脚上穿着颜色花哨的手工鞋：粉色、黄色、蓝色、棕色。一旁的母亲穿着夹袄，小心地护着她。

这是一家人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全家福。在父母不在的时间里，干部们抓走了孩子。他们说服了玲不识字的爷爷奶奶在一张同意把孩子送去领养的文件上按了手印。后来，干部们说杨签了同意放弃自己女儿的文件。杨设法证明了他当时人

在中国南方，根本不可能签了这些文件。但是覆水难收。玲消失在邵阳孤儿院里。“他们告诉我，‘别再想她了。我们批准你再生一个，’”杨说。

当布莱恩·史岱读到这个故事时，他给自己认识的养父母们发了一条消息，请那些从邵阳收养过孩子的父母们回复他。一对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夫妇回复了他。在了解了他们收养的时间和环境、又比对了他们发来的照片后，史岱坚信伊利诺伊州的这个女孩就是玲。她身上有一枚和玲身上相似的胎记。

他开始用邮件和电话与伊利诺伊州的父母对话，可想而知，这对父母十分震惊。史岱说，起初，这位养母十分配合。但是当史岱提出做DNA检测的时候，这对惶恐的夫妇切断了联系。

史岱拒绝透露这对养父母的身份，但是同意代我转发一封信件给他们。我在信中写道，我将到中国见到可能是他们养女亲生父母的人，如果他们有什么话，我可以代为转达。但他们没有回复。

2009年，兰·史岱见到了杨。她给他看了伊利诺伊那个女孩的照片，还收集了杨的DNA样本。“我特别开心。她看起来跟我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只是长大了些。”杨说。照片里四岁的女孩在他看来似乎是住在“大别墅”里，杨说，“在美国肯定人人都住得这么好吧。”他一边说，一边娴熟地从牙缝里吐出些烟草渣。

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和陈生了一个儿子，成杰，但是三年后，陈就离开了他。“她受不了这种穷日子，也不信我还能把闺女再找回来。”

我问他如果他发现这个女孩就是自己的孩子，并且也能证实的话，他会怎么样做。

“我会把她要回来，”他马上说。

“但她已经十岁了。她适应不了中国的生活，也不会讲中文。”我提示道。

“那我希望她至少一年能来看我一次。或者我能去看她。我希望她能学点中文，这样我好能跟她说话。”他说。

我试图设想这样一个场面：杨操着一口浓重的口音，嘴里吐着烟叶，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从来没有管过孩子。成杰被爷爷奶奶带大，杨轻描淡写地描述着儿子的成长经历，听起来却似乎很辛酸：放学后要做大量农活，父亲常常不在身边，而且多年来也都没有稳定的工作。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有着一屋子芭比娃娃的10岁美国女孩，如何能融进这幅画面里。

我在邵阳遇见过的所有父母中，似乎没人算得上是理想的父母。他们几乎见不到孩子，因为自己不得不在遥远的城市打工。中国的户籍制度制造了“本地”与“外来”的社会等级，没有城市户口，他们没法带自己的孩子进城，因为孩子在城里没法上学，也没有医疗保险。

当袁明山告诉我他的第三个孩子被从奶奶那里抓走的时候，我很气愤。计生委干部在袁的母亲带孩子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扣押了她。他们说她“太老了”，没办法照顾一个婴儿，让她签一份放弃孩子的文件。袁的母亲不答应，“他们就让她两手平举做飞机翅膀。他们威胁说，只要她把胳膊放下来就会打她，”袁说。最终，老母亲答应了。

“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她还没有名字，他说。她当时不止一岁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六个月后，他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的确如此，他说，六个月之后。当时已是 2003 年，而大多数农民工还都没有手机。

他一听说这件事，就匆匆赶回了家，想把女儿要回来。他被告知要交 16000 元超生罚款。袁不肯。后来，他又外出打工了。计生委干部继续骚扰他的家人。他父亲担心计生委会抢走自己其他的孙子孙女，求他至少交一部分罚款。袁不情愿地交了 5000 块钱，计生委终于不再来骚扰他们。

我觉得很矛盾。一方面，想到这些人的孩子就这么轻易地被拂去，却没有任何追索权，我就怒火中烧。我痛恨恃强凌弱的人，而这些计生干部似乎是农村最大的恶棍。

但另一方面，我曾经采访过众多的养父母，亲眼见过在地球另一端生活的被收养儿童，我不禁怀疑，这些被收养儿童没能留在父母身边，对他们来说是否是件好事。

的确，这也是一些养父母所用的理由。我曾采访过一位美国中西部新闻制作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收养了两个中国女儿。她承认，女儿们的身世至今是个谜。但是两年前，在一次难得的圣诞装饰活动中，“我看着两个女儿，不禁想到，‘如果我没有领养她们，此刻她们也许正在某个工厂里生产这些装饰品，而不是站在这里悬挂它们。’”

领养一个孩子几乎就像皈依一种宗教，它有它独特的一套信仰、结构和信念。中国儿童收养团体中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红线的传说。寓言里说，孩子出生时，会有隐形的红线把它和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故事对养父母很有吸引力，它给了养父母一种宿命感和必然性。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我读过很多养父母对领养过程充满宗教色彩的描述。这需要一种笃信。在卡琳·伊文斯（Karin Evans）的著作《迷失的中国女儿》中，她引用了一位叫卡罗尔·索普（Carole Sopp）的养母的话：“如果我开始质疑他们（中国官方）跟我说的

话，我就更是在证明她的过去都是假的，都是我们所不知的，那样更会割裂我们的未来。”

杰夫·甘米奇（Jeff Gammage）是《费城问询报》的一位较真的记者。他说，他相信当初自己与自己养女之间的配对绝非偶然。在他的著作《中国幽灵》中，这位白人记者估计，当时有个不认识的中国官员看出他的长相和后来他领养的女孩有些相似。“如果你拿着金玉的照片放在我三四岁时候的照片旁边——她是小光头，我是平头，你会发现我们俩长得几乎一样。嘴唇一样，脸一样，耳朵也一样。”

然而，说某些领养是命中注定的，等于说有些孩子注定要被遗弃。

在格蕾斯·牛顿的博客文章《红线断了》一文中，她一针见血地评道：“领养注定论同时也是说，孩子的生母注定要被迫放弃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注定要失去他们的原生家庭，失去他们的祖国、文化，失去他们所熟悉的一切。”

凡事总要有个度。而这个度，就是：偷别人的孩子是错的。

杨立兵的故事有了一个诡异的转折。她当时的女朋友陈后来告诉兰·史岱说，杨并不是她女儿的生父。当时她怀孕了，跟着杨躲到村子里寻求庇护。

杨在我们采访他时就知道这些，但只字未提。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故意隐瞒实情。“她是我女儿，”杨坚持说，“她生下来之前，我就一直在照顾她们母女俩。就算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我也是她爸。”

2013年，史岱夫妇把陈的DNA样本寄回了美国的数据库。他们没有伊利诺伊那个女孩的DNA样本，因此这一切都只是预备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女孩也许要追寻自己的身世的时候。“真相就在那里，等待着她，”史岱说。

在我看来，这些DNA样本就像许多未引爆的炸弹，随时都可以粉碎生活、故事和信仰。

## 九 跨境婴儿

有钱人生财，没钱人生娃儿，  
这都是最肯定的事儿呀。

——理查德·A·怀宁、雷蒙德·B·艾根、

伽斯·卡恩共同创作的歌曲 《咱们不是很开心吗》

—

在接受了取卵之后，我在一阵急迫的尿意中醒来。

护士不允许。“四十分钟之内不许站立。”

我试图安静地躺着，想些能帮助受孕的事情。我想象出几十个饱满的卵细胞，像青蛙卵和鱼子酱一样，缓缓地被抽出，充满了各种可能。我本该觉得体内空虚而又充满希望，但我却只知道膀胱灼热不已，多年的如厕训练马上就要毁于一旦。

“求你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恳求道。护士极不情愿地拿来了一个尿壶。她把肾型的尿壶高举着，索要道：“二十块钱。”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她，又看了看身上的病服，她以为我能把剩下的钱放哪儿？但是中国的医疗就是这样，先给钱，才有人管你，而且明显连三美金左右的尿壶都是如此。

在此之前，我每次去医院、每次做扫描和打针都是先付款，而且只收现金。中国最大面额的纸币只有 100 元，当时相当于 15 美金。我拿着破旧的手提袋背着砖块大小的一摞摞现金到处跑，像蹩脚犯罪电影里面偷偷摸摸背着钱袋的坏人一样。

当然，这还不是最荒谬的地方。眼下的我正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地方接受生育治疗。别人都是离开中国去生更多的孩子；没人跑到世界上人最多的国家来试图贡献一份子。

在小产九个月后，我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接受试管受精。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同意接受如此有侵入性的治疗，更别说是在中国，要面对诸多随之而来的问题。但是流产改变了一切。我不再对做母亲有任何不确定或矛盾的心态。我想要孩子，又患有不孕症，既然身在中国，我就得在中国寻求治疗。（由于对中国领养有所了解，我对领养这一选择很是谨慎，再说领养需等待的时间当时已经排到五年。试图怀孕似乎仍是更简单的选择。）

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治疗不孕不育症的选择却少得令人吃惊。我住在北京，那里最著名的治疗中心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988年，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在那出生，这比世界第一个成功出生的试管婴儿晚了十年。但是等待做手术的人很多。自1983年至今，中国的不孕不育率增长为原来的3倍，达到10%，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持平。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大量患者，而治疗机构数量不足，无法满足需要。

私家家恩医院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医院由一个曾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医生创立，看起来平平无奇，是位于学府林立的北京海淀区的一栋小白楼。正门入口当眼处有个收款台，前面设有障碍，看起来就像我过去在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加油站常常看到的防弹柜台。洗手间是传统的蹲位式，要想取尿样时不溅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洗手间里焚了香以掩盖氨气的臭味。但是车道上有许多黑色奥迪——中国高级干部和精英青睐的座驾。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中国寻求生育治疗有其独特的问题。我来到家恩医院时，携带了一大堆文件：我的工作签证、护照、我上司的介绍信，还有最重要的一——我的结婚证。我和丈夫是在他的故乡马里兰州结的婚，我们的结婚证看起来特别正规，上面还盖着金色的印章。我怀疑我可能能在当地的打印店弄一份差不多的，毕竟中国人也看不出真假。但这是程序的一部分：你无法以未婚单身女性的身份接受试管受精治疗。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先进的生殖技术是严格留给已婚夫妇用的。

独生子女政策也让家恩医院的客户都变了味：有些女性和我一样，二三十岁的时候都专注于职业生涯，如今眼看生育年龄快要结束了。但我遇见的很多女性则更为年轻，不存在因为年龄大而不孕的问题。她们是为了绕开独生子女政策而专门来试图生双胞胎或三胞胎的。一胎多子同样也算一胎，这给那些想要多生孩子，但又不愿赔上自己的人留了一个空子。我跟一位天津的高中老师交谈，她说，如果她想要的两个孩子是分两胎生的话，她会丢饭碗。当时她正怀着双胞胎，热烈地期盼着他们会是一对吉祥的龙凤胎。

我在家恩的很多时间似乎都是在收银台度过的，把一叠叠现金推到收银台里面。有些数额似乎低得有些荒谬。挂号费（只要你不是要挂刘家恩本人的号）只要20块人民币，和我后来急需的尿壶费用一样。

在尿壶事件之后，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麻药还未退去。（我匆匆喊来了我的丈夫，交了那20块钱。）房间里还有另外两对刚刚取完卵正在休息的夫妇。



一个女人是活动策划人。她丈夫给中国电视界的老大 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音乐。

睡意正浓的我听见他正在讲述自己曾在美国看过的一部纪录片，片子是关于毛泽东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当时，毛号召人们把自己的农田变成后院的炼钢炉，以此将整个国家迅速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2000 多万人被饿死，但是中国知道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人并不多。

“人们在吃婴儿，” CCTV 制片人十分夸张地说。屋子里一片寂静。我感到大家都半信半疑。他接着说道：“真的。我在探索频道看见的！”

我缓缓入梦，朦胧中想到了食人族，家庭，还有那些吞噬婴儿的国度的命运。

## 二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中国，掌握生育魔法的医生们成了君王。中国有正式执照的、能够提供试管受精术和其他生育治疗的诊所数量从 2001 年的仅五家激增到了二百多家，而没有执照的更是数不胜数。促进大量排卵的生育药物克罗米酚销量爆增，网上售价已经跌至一盒 10 元人民币。

过去十年间，中国双胞胎的数量增长为原来的两倍多，平均每 89 个新生儿中就有一对双胞胎。这一数字仍然低于美国水平——约 30 个新生儿中就有一对双胞胎。根据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的一个经济学者团队的研究，美国双胞胎出生率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女性晚育导致的，而中国双胞胎生育率的增加则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这意味着很多女性是故意用“双胞胎”来绕开独生子女政策，不论是使用治疗不孕的药物还是把非双胞胎谎报为双胞胎。

例如，2000 年，云南的干部在三百多个村子里发现了七百对这样的“假双胞胎”。研究人员发现，超生罚款更高的省份有双胞胎的概率比罚款低的省份要高很多。根据一项新闻报道，在上海，至少有一项调查结果估计，每 50 个新生儿中就有一对双胞胎。

2010 年，广州有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不仅挑战了人类生育的极限，也挑战了计生委容忍的底线——她一个月内拥有了 8 个孩子。她接受了不孕治疗，使用了两位代孕母亲，同时自己足月分娩了几个胎儿。媒体戏称她是八胞胎母亲。当地新闻报道说，这位母亲在生育治疗、代孕和医疗费上花费了近 100 万人民币，请了 11 位保姆。当一家人去影楼拍照的时候，照片被影楼传到了网上，消息不胫而走。最初，公众起初觉得难以置信。

“天哪，生了 8 个孩子……在这个计划生育、人人都只生一个的时代，这反差是在太大了，” CCTV 一位评论员说，“听起来不像是新闻，更像是童话。”

为了避开媒体视线，这家人躲了起来。两年后，广东计生委说针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已经结束，这对夫妇将受到严罚，具体罚款数字不明。

代孕在中国是灰色地带。卫生部禁止其下属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任何代孕手术。当然，这就给了代孕中介机构一个繁荣发展而不受管束的机会。

中国究竟有多少代孕中介机构，官方并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广受尊敬的报纸《南方周末》的报道，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约有 25000 名儿童是代孕母亲所生。目前，代孕母亲能获得的补偿款为 20000 元至 40000 元不等，大约是美国代孕费用的十分之一。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对生殖服务业的控制性监管缺失，结果，这个制造婴儿的市场就像蛮荒时代的美国西部一样无法无天。中国的一些代孕机构明目张胆地提供了保证生男孩的服务，这就意味着代孕母亲要堕掉所怀的女婴。当地新闻报道引用了一个中介的话说，有个客户为了要个儿子换了五个代孕妈妈。“这很让人难堪。每次我们发现代孕母亲怀的是女孩，就得再给他换一位。”

代孕母亲和生父母们也很容易遭到计生委查处。2009 年，三位住在广州一个合租公寓里的代孕妈妈被计生委的领导拖走，实施了流产。“我当时一直在哭，‘我不想做这个’，”一位叫小红的年轻女性对路透社说道，当时她怀的双胞胎已有四个月大，“但是他们还是把我拖进去，给肚子上打了一针。”

日益进步的生殖医疗不仅让富裕的中国人有了规避独生子女政策的机会，也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在别的国家，“有钱人生财，没钱人生娃儿”也许司空见惯，但在中国，有钱人更容易两全其美：不仅多钱，而且多生。财力优厚或者有人脉的家庭越来越愿意也能够用交罚款或其他巧妙的方式来规避独生子女政策，其中就包括在国内接受生育治疗。中国的穷人不是不能生超过一个孩子，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却在结构上使得位于经济天平最两端的人获得了最大的弹性：最穷的人因为住在偏远农村，政策上更容易受到豁免，而最富的人，这些法规于他们是越来越鞭长莫及了。中国的中产阶级才是最受这些政策影响的人；而中国的穷人则是那些最受政策野蛮蹂躏的人。

八胞胎事件之后，新浪微博上一个用户评论道：“只要你有钱，法律算什么呢？”另一个新浪用户说：“中国的法律都是有钱人的法律。有钱人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因为他们交得起罚款。”这一评论里还粘贴了工厂女工冯建梅的图片。（冯被迫接受了孕晚期引产。）也许此时的中国最贴切的象征，就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女仆的故事》中所描绘的反乌托邦世界。故事是一则未来寓言，背景设于一个使人联想到哈佛大学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因污染而面临不育的威胁。女人成了商品，纳妾的习俗被复兴，以此来培育更多的孩子。

中国正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这与不孕不育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只是科学家还不完全清楚是如何影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影响的是谁。例如，2013 年，政府智囊团中国科学院宣布开始一项为期五年的针对空气污染和女性不孕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其他科学家们争论说，污染危机影响的是男性而非女性。2013

年，报纸上宣布上海正面临“精子危机”，其主要精子库中的精子只有三分之一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几项已经出版的研究也指出了环境状况的恶化与中国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关联。

这里面的数学很简单。6000 多万女性未能出生、在婴儿时期被杀死或被送人，还有另外 4000 万患有不孕症，容易怀孕的女性在中国越来越成为稀有商品，正如阿特伍德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这一点不仅显现在代孕妈妈上，更显现在中国复兴的情妇文化上。这种风俗在共产党统治之初衰落，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又逐渐复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官员的隐喻：有情妇，而且超生。而这些女性不仅是因为其美貌而倍受青睐，更是因为她们的青春所附带的繁殖力。这些故事在腐败官员被曝光时往往不被提及。湖南省德山区前城市建设局副局长钟璧峰被其情人曝光。他的情人在湖南的官方网站红网上写道，钟非常想要儿子，因此通过婚介所与她相识，并承诺如果她给自己生育一子，将支付其 50 万人民币的报酬，如果她怀的是女孩，则需堕胎，并支付她 10 万元作为补偿。“2014 年 2 月，我到他家里找他时，遭到他妻子的殴打，”她写道。钟被开除党籍。

郴州市前副市长雷渊利有九个情人，因挪用公款豢养情人、为私生子设立信托基金而被捕。雷因挪用公款和受贿被判死缓，后改为 20 年有期徒刑。

这些生殖实验并不仅限于中国，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孩子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美国出生的。

### 三

2010 年，上海人蒋先生和她的妻子（在此根据他们的要求称她为詹妮弗）通过美国代孕妈妈生下一名女儿。接着又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三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公民在本土出生便可自动获得国籍的国家之一。但蒋先生说，这并不是他们选择这种不同寻常的受孕方式的原因。对于蒋先生这样富裕的人来说，想获得外国国籍有更容易的办法。“这样的话要很多年。”蒋先生说。美国出生的儿童只有在 21 岁之后才能赞助父母获得美国绿卡。另外，美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民即使生活在其他国家也需要交税的国家之一。“加拿大护照可以省很多税。说实话，美国国籍现在对中国人来说不值那么多钱。”

对他们来说，美国（或者说得再具体一些，加州）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一流的生殖服务和对代孕所生儿童生父母的强大法律保护，这些都是中国所没有的。

蒋和詹妮弗结婚时都是不折不扣的雅皮士。两人都在跨国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薪酬高，需要经常出差。两个人都来自小型家庭。36 岁的蒋先生生于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前一点，还有个姐姐。詹妮弗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里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两家家庭都催促他们早生孩子，给了他们很大压力，但是 2008 年，詹妮弗被诊断出子宫偏小，这意味着她几乎肯定无法把孩子怀到足月生产。

“我当时有点失望，但当时我还没准备好做父亲，”蒋先生说。“但是我的妻子很沮丧。她觉得这是她的问题，觉得这一切都怪她。”

我在上海见到蒋先生的时候，他的漫漫生子之路早已过去多年。他穿着入时的紧身红毛衣和皮裤，手上带着一块又大又沉、外表昂贵的手表，就是那种据说即使是深海潜水或攀登阿尔卑斯山都能正常使用的手表。不过忙得不可开交的蒋先生既没时间也没心思去做这些事情。

蒋先生现在经营自己的生殖咨询业务——第一咨询。中国客户在美国寻找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亲和试管受精服务的市场迅速扩大，蒋先生正是这些客户的中间人。当然，这一切都要从他自己的经历说起。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很平静地分析着，直言不讳。

蒋先生夫妇在中国尝试过很多次代孕。两年里，他们花了近 20 万人民币却一无所获。其中一个代孕母亲直接消失了，一声不响地跑回了老家。另外两个没有怀上胎儿。蒋先生最初想过：“只要有钱就能有孩子，既然有了这个可以回旋的方法，一切就都很简单。但是在中国，我们努力了很久，发现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和美国的试管受精服务有很大差别。中国的生殖服务机构人太多，医生和病患的关系很冷淡，且基础设施很原始，有时并不卫生。（“你得在男厕所里面自慰，”蒋说。）

他开始探索一些海外的选择。除了美国外，他考虑过乌克兰、印度和泰国曼谷。在美国，据他计算，包括试管受精、代孕、接生在内的一系列服务总共要大约 12 万美元，花费大约是印度的三倍。但是像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能为生父母的权利提供十分可靠的法律保护。印度和泰国到处充斥着代孕母亲所生婴儿没有国籍、身份不合法的恐怖故事。蒋也排除了乌克兰，“他们对外国人收费是本国人的两到三倍，就跟三十年前的中国一样。”

就是美国了。这是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我们感情上和经济上都无法再承受失败了。我们宁愿挑最好的地方，选择最有经验的解决方式和流程。”蒋先生的父母甚至还因为他妻子的生育问题悄悄建议他考虑离婚。他没有向她提起这件事，他说，但是“她能感觉到。”

一家美国中介向蒋先生推荐了三个代孕母亲人选。尽管其中有两个代孕母亲住在南加州，离蒋先生选择的圣莫妮卡医院更近些，但他还是选择了要坐短程飞机才能到达的住在旧金山湾区一带的阿曼达·克莱沃克斯基。蒋先生之所以选中她，是因为她是白人，又是警官的妻子，这些都让他觉得很稳定。“我记得冒充警官是重罪，”他说，“文化上讲，我更信任白人家庭。”

听到蒋先生如此公开地剖析自己的决策，我觉得有些奇怪。我想，美国人可能也会作出类似的决定，但却不太可能公开表示自己更喜欢白人代孕者。在中国，汉族人口太多，以致于人们对于种族歧视之嫌毫不敏感。贝弗利山庄一家代孕机

构的经营者丽莎·齐雅（Lisa Chiya）说道：“其他客户对人口特征并不怎么在意，但中国人在意教育和种族。他们要求代孕者要有大学文凭，得要是白人或者拉丁裔，但是不要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总会说，‘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要黑人代孕。’”

这种歧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其中一部分是来源于文化中对浅肤色的偏好。对中国人来说，一白遮百丑。对于一个正努力从种地的农民变成办公室白领的民族来说，皮肤白意味着成功。一个非裔美国朋友有一次曾经愤然从北京一家美容店夺门而出，因为他们努力向她推销美白治疗。店长就是不明白这位顾客为什么会生气。对她来说，人人都想当白富美。

还好蒋先生夫妇在寻找代孕母亲时自身没有遭遇到类似的种族歧视。还有三对夫妻也被推荐给阿曼达供她考虑，只有蒋先生夫妇是中国人。他们最吸引她，她说。“我想就是他们说到想要自己的孩子时的样子吧，还有他们多次失败的尝试。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搏。这打动了我。”

阿曼达是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尝试代孕的，她的朋友曾经代孕过两次。阿曼达生自己儿子的时候很容易，也很享受怀孕的过程，那时她儿子还只有两三岁。

“我想人们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怎么能放得开呢？’我告诉他们你要记住孩子在基因学上并不是你的，长得也不会像你。对我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

2009 年圣诞节前后，蒋先生夫妇飞往阿曼达位于郊区的家中，距旧金山约两个小时车程。阿曼达带他们参观了自己家，并向大家坦诚地介绍说他们就是自己要帮助代孕的夫妻。“她人真的很好，”蒋先生说。

阿曼达巩固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让蒋先生感到安心。“她家里环境很好，所以我想她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钱。”他说，“当然了，钱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蒋先生将支付约 3 万美金给阿曼达作为代孕费，这是标准的市场价。考虑到她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这个价钱并不算多，而且我采访过的很多代孕母亲都说，经济原因只是他们这么做的一部分动机。有时候，经济鼓励还有可能会减小。阿曼达和她丈夫以为，她怀孕期间的医疗费用能够靠丈夫工作所提供的保险支付。但是保险公司后来却收取了阿曼达一半的孕检费用，大约 1.5 万美金，并说明公司对有偿怀孕不承担全部费用。阿曼达的一个朋友也收到了类似的保险缴费单。有些生育咨询机构现在建议代孕母亲们按照《美国平价医疗法案》进行投保，因为该法案并未明确排除代孕母亲的医疗费补偿，不过这一点可能会发生变化。

此行之后，蒋先生夫妇开始接受生育治疗。2010 年 4 月，他们在圣莫妮卡进行了取卵和受精卵植入流程。4 月中旬时，阿曼达怀孕了。两周后，他们获知此胎只是单胎，这让夫妇俩略有些失望——“我有点希望是双胞胎，因为我不想再做一次了。”蒋说。又过了两周，传来了再次让他们失望的消息：扫描显示胎儿是

女儿。蒋的父亲一直希望是个男孩，好能延续香火。“我跟自己说，看来要再做一次了，”他说。

随着孕期的发展，这三个奔波于几大洲的人之间情谊日深。春季，冰岛的一座火山爆发，詹妮弗当时在瑞士工作，因此连续几周被困。她又孤单又低落，急切地想知道阿曼达是否怀孕了。孕期初始，阿曼达开车出了一点小事故。蒋说：“我看到邮件的时候，手心不停冒汗。我当时很冲动，想打电话要求她不要开车。但是我意识到这很愚蠢。没人坐公交车出行。她是个家庭主妇，我怎么能不让她开车呢？”他开始学着信任阿曼达。

秋天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横生枝节出现了问题。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大幅缩减预算，阿曼达的丈夫被裁员了。蒋先生当时在法国工作，主动提出飞到旧金山陪伴阿曼达。她失去了保险，因此蒋先生按照《统一综合预算调解法案》（COBRA）支付了她的费用。该法案价格昂贵，每月的保险费有 600 多美金（约合 4000 人民币），可以让新失业的人员继续享受医疗保险。此时，阿曼达怀孕已有五个月。

孩子于 2010 年 12 月出世。在一周的阴雨连绵之后，那一天晴空万里。詹妮弗在阿曼达分娩时一直握着她的手，生产过程很顺利，很快就结束了。“我记得我用了三次力。”阿曼达说。

所有人都热泪盈眶：蒋先生夫妇，阿曼达，她的母亲，“连护士眼睛都湿润了，”阿曼达说。

一年之后，蒋先生夫妇开始考虑再生一个孩子。“看看中国如今的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分享，他们特别无聊，被老人宠得不成样子。”蒋先生说。他们还有几个储存好的冷冻胚胎。他们再次找到了阿曼达，她同意了。

这一次情况不同了。阿曼达的儿子已经懂事了，会问一些问题。“我告诉他，‘妈妈要给别人生一个宝宝。’”阿曼达说。结果，她要生的是双胞胎。双胞胎后来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蒋先生的保险那时还未生效。没有保险，他每天都要为重症监护室里的双胞胎支付约 1 万美金的费用，医院最后给他的缴费单高达 28 万美金，不过蒋先生最终和医院协商把费用降到了 22 万美金，现金现付。现在，蒋先生建议他要生双胞胎的客户购买早产保险。保险费很高，5 万美金，但是他说这钱花的值得。

这些费用的确很高，但是美国的生育咨询机构告诉我说，对中国客户来说，这很常见。“我对中国客户开价，他们从不还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客户就不会这样，”《捐卵内部指南》的作者之一温迪·威尔森·米勒对我说。（她也经营一家捐卵机构。）

两家人每周都会用 Skype 或邮件沟通一次。“我在他们的家庭中很重要，像一个住在远方的姐姐一样，”阿曼达说。

2012 年年末，蒋先生辞职创立了第一咨询。“我之前的工作一年五十二周有三十二周都得出差。现在有了三个孩子，我要重新平衡一下生活和工作。”他把他的客户分成四类：患有不孕不育的；单身男女需要借助第三方生育的；同性恋（“这没有那么少见，我想这个国家至少有 5000 至 6000 万备受歧视的同性恋者”）还有想躲避独生子女政策的人——这类人现在没有了。

这最后一类人包括那些如果超生就可能失去工作的人，比如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高官。“这部分人很少，不到 10%。大多数客户都是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占了全部业务的 75% 左右。”

蒋先生说，最近他给一些客户做了咨询，得知想代孕的父亲是一位很害怕暴露身份的政府高官。最终客户退出了。“基本上，人们找我是为了建设家庭。他们很想要孩子，归根结底就是这样。他们真的非常想要孩子。”

#### 四

蒋先生的客户是大批赴美生子的人的其中一部分。相比于十年前开始的美国人赴中国领养的浪潮，这是个惊人的反转。虽然没有可靠数字能够指明这一现象的规模有多大，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赴美生子的人数近年来一直在急速上升。位于华盛顿的移民研究中心估计，美国每年约有四万所谓的生育游客，但是没有按照国籍对这一数字进行分解。几则新闻报道引用一家分娩管理组织的估计数字说，2012 年至少有一万名中国“定锚婴儿”在美国出生。该组织是一个知名度不高的网络平台，致力于对中国妇女在美生子的月子中心进行监控和排名。

这些月子中心的建立是为了迎合中国人产后“坐月子”的传统。有些人认为，坐月子对母婴将来的健康十分重要。最近几年，这类机构在南加州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服务的都是在美国生子的中国人。产妇在这里住上六周，通常打包价是 3 万美元或更高。但是，在极端分子日益高涨的要求修订第十四修正案的呼声中，这些月子中心也成为了反移民运动简单而集中的目标。（第十四修正案向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提供公民身份。）自 2010 年起，月子中心数量开始增长，华尔街日报说，2013 年一起有联邦调查员介入的大型行动“很可能最终构成有史以来针对繁荣的‘定锚婴儿’行业最大的刑事案件。”

因此，坐月子这一产业很可能转向地下或被消灭。接下来将崛起的可能就是迎合中国市场的生殖服务，该行业的高端客户消费可达 12 万至 15 万美金。一些人使用生育服务可能并不是因为不孕不育，而是利用生殖技术来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这通常意味着选择胎儿性别和数量（双胞胎更受欢迎），并且筛除遗传性疾病。在需要使用捐卵人并将其基因将遗传给下一代的情况下，中国父母也会试图选择诸如智力、身高、长相、血型甚至双眼皮在内的特征。

“每个人都想要聪明的孩子，但是不管大家嘴上说什么，每种文化几乎都会在美貌与聪明之间选择前者，”威尔森说。“但是中国人几乎都想要高个子，至少

1.68 米以上。他们会询问眼皮；他们想看孩子的照片，来判断捐卵人是否做过眼皮整形手术。”

卵子提供机构说，因为东亚裔捐卵者的数量不多，所以其价位通常很高，但是近年来中国父母的介入导致东亚卵子一卵难求。通常，捐卵者能够获得约 6000 美元的补偿款，但是东亚裔捐卵者获得的补偿是这一数字的二到三倍。“每得到一个华裔捐卵者，我都能让她捐十轮。”威尔森说。（专家建议每个捐卵者捐卵不应超过六轮，以免造成健康风险。）

威尔森·米勒的东亚捐卵人几乎全都是持美国学生签证的大学生，但是依然供不应求。这愈加导致了一种奇怪的循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捐卵人都飞到美国帮助制造宝宝，然后宝宝再被带回中国。

当我采访蒋先生的时候，他正准备着手与一位台湾捐赠者做这样的交易。台湾捐赠者备受青睐，因为他们可以免签进入美国。不过最近，美国对中国护照持有者放宽了签证政策，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我们得找到办法满足需求，”米勒说，“我们的华裔捐赠者数量不够”。

中国人并不是唯一使用这些所谓婴儿设计技巧的人，但却可能是各国人当中热情最高的。他们的数量和经济实力将会对这一正在发展的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繁殖看成一种促进社会进步和刺激社会流动的工具，在生育这件事上进行辛苦的选择已经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已经习惯了控制生育的数量和性别，有些人甚至通过捐卵人选择智力、身高和长相。这离“婴儿设计”已经不远。在 2012 年中国长沙市的一项调查中，四百名受调查者被问及对何种基因筛选更感兴趣。5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对与健康相关的基因筛选有兴趣，23%的人选择“优生学”，也就是筛选更聪明的孩子。

如果基因筛选智力真的成为现实，会如何呢？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在进行了。2013 年，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探索人类智能基因基础的工程。这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还远未可知。很多科学家指出，人的智力太过复杂，不可能孤立属于某一单纯的基因组成部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此项目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也汇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包括行为基因学家罗伯特·普洛明和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家史蒂夫·许也许这个小组最令人感兴趣的成员就是项目带头人赵柏闻——一位初中就辍学的少年天才，15 岁就曾与人合著过一份黄瓜基因序列的研究论文。赵相信：“人们应该能够自由操控自己孩子的智商。这是他们的选择。”

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团队认为，在他们有生之年，接受试管受精手术的人可能能够选择智力基因标志更高的胚胎，从而使父母能够在产前使孩子的智商提高 20 分的幅度。



尽管这还只是预测，但却让我忧心。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中国的不平等。如果你有钱，你就能够生更多的孩子，少受惩罚。如果这些孩子还更聪明，更不容易生病，个子也更高呢？那么中国就会更加接近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人口是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和分类的。阿尔法（Alpha）为王，而像厄普西隆（Epsilon）一样的劳动人民则智力不全，天生就被设计得永远不会有超越阶级的野心。

1995年，中国通过了国家母婴保健法，禁止“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夫妇进行生育。所列疾病种类包括智障、心理疾病和癫痫。这些夫妇被要求进行强制性婚前医疗检查。这一举措引起了极大争议，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优生学的谴责。

事实上，该国家立法的措辞被认为还是比较委婉的。有些省份的规定更为露骨。1988年，甘肃省通过地方规定，禁止“弱智、白痴和呆子进行繁殖”。2002年，甘肃废止了该法规。国家母婴保健法也在2003年婚前医疗检查悄然中止后被废除。

## 五

当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现婴儿短缺时，会发生什么呢？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大量老龄人口出现，劳动力短缺，女性数量不足。这一切似乎都可以通过生育率上升来纾解，但是生育率却迟迟未见上升，也许永远也不会了。

在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后，共产党终于开始采取措施终结这一政策，但却沮丧地发现，很多中产阶级中国人不愿意生超过一个孩子。

如我们所见，2013年，中国通过“单独”政策允许更多夫妻生育二胎（“单独”政策规定，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但是实际申请二胎的人数远低于政府最悲观的预估。符合条件的夫妻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申请了二胎许可。即使调查显示很多夫妻有生育二胎的意愿，很多人却都说实际上他们生不起，压力太大，也太影响自己的个人目标。很多人也把生育看成社会阶层流动的策略：通过生一个孩子，他们可以把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样孩子就会更成功。“生两个孩子反而被看成是自私，不是好父母，”人口学者马小红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

在这个意义上，独生子女政策可以被看作是巨大的成功，因为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一个年轻的朋友曾说过：“多年以来，政府一直在教育人民，计划生育政策是最好的家庭形式。它意味着财富、幸福和不甚拥挤的社会。我认为这种宣传很成功。独生子女政策也的确提升了很多家庭的生活水准。对成长于独生子女家庭的我来说，只生一个孩子似乎很自然。”

也许独生子女政策有效的证据在于它已经过时了：人口学者马小红针对中国父母为何只生一胎的调查显示，60%的父母说独生子女政策与他们的决策并无关系。

哈佛大学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认为，中国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与官员采用的物理强迫手段关系并不大，反而是中国社会认为控制生育可以促成向社会上层流动的这一观点起了更大作用。在繁殖方面，“中国代表着经济理性主义一个极端的例子，”苏珊写道。

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独裁者穆斯塔法·蒙德争论说，当儿童由实验室所孵化时，世界会运行得更好。“世界现在是稳定的。人们很幸福，他们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且永远不会觊觎自己得不到的。他们富有、安全、从不生病、不怕死亡；他们万幸地对激情和衰老一无所知；他们不受父母的困扰。”

在对人类冲动性的赞美歌中，男主人公野蛮人轻蔑地回答道：“但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意。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

不久后，中国的问题就会成为其他主要东亚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人口缩减。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政策上从反对生育转为提倡生育的国家目前为止都发现，要想把生产婴儿的开关打开，远比关上它难得多。

到2025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摘下这顶帽子将会让中国万分欣喜。2020至2030年间的某个时间点上，中国的绝对人口将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回落。根据学者陈友华预测，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将降低到1950年水平，约为5亿。

也许共产党能够逆转这一潮流。毕竟，它发动了当代史上最为成功的生育控制运动。但我怀疑，这即便不是不可为之事，也会万分艰难。将生育看成是纯粹数字运算的思维定势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理。最终，也许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最大破坏就是，它强迫人们对为人父母这件事进行理性的、也许是过于理性的思考。这一面对未知的纵身一跃，将是一种无限的力量，激励着我们去探求和理解生存与爱的意义。

## 尾声

我在中国接受的试管受精手术失败了。我没有怀孕。

简单说来，试管受精术就是把最优质的卵子和精子在实验室中结合。理论上讲，这把怀孕搞得有点像投篮，也像让竞走运动员骑自行车。但是，接下来的一步——把胚胎植入体内、等待是否能够正常怀孕，就是科学依然望尘莫及的领域了。

有时候胚胎能够着床，有时候不能。我没有“着床成功”，没有擦出火花，至于为什么不能，医生和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我毅然决定辞去工作，离开中国。我曾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工作，同时也能当妈妈，但是这已是不可能。我的内心深处有将信将疑的恐惧：每天不停地赶稿子的生活方式和北京严重的污染是我不孕的罪魁祸首。我必须停下来，学会让自己歇着。

2009年年末，我们离开了中国不靠海的首都，来到了威尼斯海滩。这两地相去天壤。北京的雾霾不见了，太平洋海滨滚滚而来的雾气取而代之；我看到的不再是如潮水般奔走在路上的黑发姑娘，而是金发姑娘和牙买加人，他们缓慢穿行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里，散发着大麻的味道。

我想念北京。尽管有千万种不便，北京依然让人兴奋不已。它可以动若脱兔，也可以静如处子。我渴望在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骑车兜风，渴望看到露天理发师们在垂柳摇曳的树影里给人理发。住在北京，一切都能够让你动容。每一个蓝天的日子都是一种恩赐。它让你精神紧绷，也让你分外敏锐。而如今，我却被棉花般柔软的云朵拥在怀里。

过去的生活仍然没有淡去。我会在十字路口僵住，对停下来给我让路的汽车感到无所适从。体检时，医生在我肺里听到了锣音，告诉我不要再抽烟了。（我不抽烟，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又可以直接喝自来水了，水里的氟化物帮我洗去了牙齿上因为数年都喝瓶装水而沉积的牙渍。

我开始和一些想在家里进行水中分娩、不相信麻疹疫苗的女性们一起上产前瑜伽课。当我告诉我的母婴小组的朋友们，我要靠药物，而且是“很多的药物”来进行生育时，他们一边优雅地拉伸着，一边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我不再条件反射般地看新闻，试图让自己进入一种佛祖冥想般的淡然境界。我又开始了试管受精治疗。

我喜欢觉得自己高尚地避开了那些高科技的、计算精确的选择：筛选遗传疾病、选择性别、选择胎儿数量——这些念头让我如坐针毡。事实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我怀孕的道路如此艰难，脑海里从未想过还要对孩子挑挑拣拣些什么。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双胞胎或者要男孩——然而，我怀了一对双胞胎男孩。

2010年，我的双胞胎儿子出生了。先出来的是永贤，一分钟后出来的是定贤。

医生把定贤从我体内接出来的时候，舞台感十足的他高举着小小的手臂，摆出了一个优雅的芭蕾舞步。这成了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纪念照。他们看起来就像脱了毛的小鸡，模样儿很俊。

我坐了月子，也有洗澡，还去外面散步。我沉浸在一种对孩子无限崇拜的喜悦中。我看着定贤和永贤一天天胖起来，大腿上的肉肥嘟嘟的，让我总是想去捏一捏。那些坐在挂扇下面的漫长的午后，被两个沉睡的宝宝环绕的时光，将永远留在我脑海里，成为我此生最祥和宁静的记忆。

回首人生拐过的这道弯，我几乎认不出现在的自己了。再也不用飞赴到新闻现场，再也不用因为突发的事件而心跳加速。我必须扎下根来，我必须交出自己，我必须忘我地生活。

作为家里的老幺，我在生孩子之前很久就有了侄儿侄女。对家人来说，我是那个让人激动的姑姑，是那个去异国他乡给他们带来与众不同的纪念品的姑姑，是那个在油井泄漏时下海潜水、涉入不该涉足之地的姑姑。一个侄子有次告诉我说：

“美姑，不要生孩子。生了孩子你就会变得无趣的。”如今我有了孩子，的确是变无趣了。P·J·奥洛克是怎么说的？“别想做让-保罗·贝尔蒙多<sup>9</sup>，目标该是两个娃儿和一套房子。”

孩子睡觉前，我会给他们讲故事。有些是中国民间故事，像后羿射日，或是嫦娥奔月。还有些是格林或者安徒生童话。对永贤和定贤来说，最爱听的故事常常是那些最血腥的故事。每当我说道“然后，他就杀了他”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兴奋地想象，即使他们还太小，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片魔幻的土地上，有母亲逃走，继母登场，孩子被放逐，还有永远吃不饱的饿狼在嚎叫。

有一天我会给他们讲故事：从前，有个国家一贫如洗，皇帝下令说，每家都只能生一个孩子。我会讲起这片土地是如何被一种巨大的悲伤所笼罩，讲起人们是怎样送走自己的骨肉，或者偷走别人的至亲，或者寻求魔法师的帮助让自己唯一的宝贝孩子成为最强健、最聪明的人。我会讲到这个国度的婴儿是如何越来越少，变成一个满是老人的国度。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局。

---

<sup>9</sup> Jean-Paul Belmondo 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著名男演员，曾出演 Jean-Luc Godard 的经典电影《精疲力尽》（*Breathless*）等，以叛逆的形象著称。

我就这样躺在熟睡的孩子身边，他们平稳而有节奏的呼吸声成了世间最安静，也最吓人的声音。